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当代语言学丛书》
编委名单

主　编：黄国文　秦秀白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初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朱永生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东英　（香港理工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杨永林　（清华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顾曰国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当代语言学丛书》总　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组织策划了《现代语言学丛书》，并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心理语言学》(桂诗春著)。迄今这套丛书已出版14部著作。此丛书的主编、编委和作者都是我国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现代语言学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为推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年后的199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当代语言学丛书》，邀请黄国文教授和秦秀白教授任丛书主编，并成立了由12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对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有很高的造诣。

近两年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引进了"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39本和"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6本。这些著作在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考虑《当代语言学丛书》的组稿原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处理好"引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阅读和钻研引进的原版书需要一定的英语基础；对于那些英语水平不太高的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习者来说，仍有必要用汉语为他们"引进"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引进，而是与国际学者对话，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相关的学术领域接轨。我们需要创新，也必须创新。因此我们希望《当代语言学丛书》的作者在引进和评论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能结合我国社会、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立足创新，勇于创新。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高等学校的语言、翻译、文化等领域的教师

和研究生以及研习相关专业的广大读者。我们相信，汉语界的同人和读者也能从我们的这套丛书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某些东西。

我们希望更多的新一代学者能加入我们丛书作者的行列，共同为提高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水平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策划和组织这套丛书。我国语言学研究者将永远铭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在普及和繁荣我国语言教学与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也将与出版社一起为推动我国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当代语言学丛书》编委会

2000 年 2 月

前　言

“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也叫“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在英国兴起的有关语篇分析方法的学科。它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批评语言学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方法论主要建立在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上，但也不排斥其他语言理论中有关的概念与方法。它在分析中特别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因此往往被忽视的思想观念上，以便人们对它们进行重新审视。

批评语言学一出现便迅速得到西方语言学界的重视。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它在英国、美国、荷兰、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国方兴未艾，形成语篇分析的研究热潮。近年来批评语言学也引起了我国语言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迄今尚无对批评语言学进行比较有系统的研究的专著。这就是笔者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本书分为十二章，第一到第六章主要介绍、评析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语言观和理论源泉等。批评理论的重点在于实践。在第七到第十一章里，我们力图把批评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对具体语篇的分析，以便验证其实用性和有效性。第十二章对批评语言学发展至今存在的问题和它所遭受的批评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和评论。总之，本书既有广泛的理论探讨又有大量的实例分析，理论与应用相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笔者相信本书对我国的英语语篇的研究和教学将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留学期间开始涉足批评语言学，启蒙老师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 Henry G. Widdowson 教授，当时他为我们开设了一门课，叫做“语言、文化与意识形态”（Language, Culture and Ideology）。1994年回国以后笔者开始有系统地将这一语篇分析方法介绍给国内语言学界，并以研究生为对象开设了“批评语言学”课程。在此期间，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国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了解和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在国内一些同仁的建议下笔者开始产生了把数年的研究成果疏理成书的想法。批评语言学是一种新兴的语篇分析方法，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多。因此，本书虽然包括了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但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见，更因笔者水平所限，其中难免有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和不成熟之处，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笔者获得了许多专家和师长的鼓励与帮助，这其中首先包括 Henry G. Widdowson 教授、陆国强教授、朱永生教授、胡壮麟教授和张杰教授，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特别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郑友苗女士在编辑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谨致谢意。

辛　斌

2005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语言和意识形态 ………………………………………… 8

2.1　意识形态：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 8
2.2　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特征 ………………………………… 10
2.3　意识形态的语言性……………………………………… 13
2.4　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 15
2.5　结语 …………………………………………………… 18

第三章　语言和权力 ……………………………………………… 20

3.1　权力 …………………………………………………… 21
3.2　语篇里的权力关系 ……………………………………… 24
3.3　语篇里的权力斗争 ……………………………………… 29
3.4　语篇秩序与权力 ………………………………………… 31
3.5　语篇的非政治化和权力的习惯化 ……………………… 34
3.6　结语 …………………………………………………… 36

第四章　语篇、常识和意识形态 ………………………………… 37

4.1　意义的合法化和习惯化 ………………………………… 37
4.2　常识的语篇功能 ………………………………………… 42
4.3　常识的意识形态功能 …………………………………… 46
4.4　语境与意识形态意义 …………………………………… 49
4.5　如何凸显语篇中的常识 ………………………………… 52
4.6　结语 …………………………………………………… 53

第五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1) ………………………… 54

5.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语言学 ………………………… 54
5.2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般方法 ………………………… 57
5.3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 ………………………… 60
5.4　结语 ………………………… 64

第六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2) ………………………… 65

6.1　分类 ………………………… 65
6.2　及物性 ………………………… 71
6.3　情态 ………………………… 74
6.4　转换 ………………………… 79
6.5　结语 ………………………… 81

第七章　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 83

7.1　新闻报道的选择性 ………………………… 84
7.2　英语新闻语篇的制作 ………………………… 87
7.3　英语新闻语篇的分析方法 ………………………… 90
7.4　两篇英语新闻的对比分析 ………………………… 92
　7.4.1　语料 ………………………… 92
　7.4.2　分类 ………………………… 96
　7.4.3　转换 ………………………… 97
　7.4.4　情态 ………………………… 99
7.5　结语 ………………………… 101

第八章　英语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 ………………………… 103

8.1　转述引语及其分析方法 ………………………… 103
8.2　语料 ………………………… 108
8.3　消息来源 ………………………… 111
8.4　转述形式 ………………………… 114

8.5 转述动词 …… 121
8.6 结语 …… 124

第九章 语篇的互文性分析 …… 125

9.1 互文性的分类 …… 126
9.2 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 128
9.3 体裁 …… 131
9.4 体裁互文性 …… 133
9.5 结语 …… 139

第十章 主体位置、阅读位置和体裁互文性 …… 140

10.1 阅读位置和主体位置 …… 140
10.2 体裁互文性与主体位置的转换 …… 143
10.3 结语 …… 151

第十一章 “话语殖民”、“话语霸权”和体裁互文性 …… 152

11.1 社会意识形态与体裁互文性 …… 152
11.2 “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 …… 156
11.3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 158
11.4 公共语篇、私人话语和体裁互文性 …… 160
11.5 结语 …… 163

第十二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 …… 165

12.1 语篇分析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解释的权威性来自何处? …… 165
12.2 关于混合型语篇(mixed texts)的描写有什么主张? …… 167
12.3 语篇、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 168
12.4 语料是如何筛选的? 是否具有代表性? …… 170

12.5 与其他语言和认知的建构理论有何关联？…………… 171
12.6 结语…………………………………………………… 172

主要参考文献 ………………………………………… 174

汉英、英汉术语对照表 ……………………………… 192

第一章 绪论

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启蒙文化。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假定，"科学团体的那种客观性、批判性和经验主义至上的文化将会使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完全脱离其所具有的社会特性（例如阶级、性别和国籍），而获得一种只对真理发生兴趣的理性的心智。这种立场与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知识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并一直受到各派科学评论家的严厉质疑。"（塞德曼，2001：13）"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就是在这种质疑中诞生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当代西方人文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反唯科学主义和反唯理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尤其是德语世界，开始就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科学的主题和基本方法等方面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许多社会理论家，例如阿多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等认为，实证主义把科学或科学知识视为纯粹客观的东西，忽视了它与人类对技术控制的兴趣之间的联系。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1971，1973）提出一个批评社会科学（包括批评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它与人类的兴趣密切相关。哈贝马斯指出，人类具有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兴趣"（the technical interest）、"实践的兴趣"（the practical interest）和"解放的兴趣"（the emancipatory interest）。这些兴趣分别来自于劳动、言语交际和权力（即支配和限制的关系），而劳动、言语交际和权力也是以下列三种科学为发展的基本条件：经验分析科学（包

括各门自然科学)、阐释学(包括各门文化科学)和批评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目标是获取人类控制外部生存条件必需的技术知识，因此它与人类的技术兴趣相关。文化科学的主要目标是取得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这种相互理解和协调不仅是自然科学获取技术知识的先决条件，它们对于人们克服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各种误解和隔阂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科学与人类的实践兴趣相关，因为人们想在社会中成功地发挥作用，他们之间就必须消除误解，保持交流。

解放的兴趣是指人类把自身从各种自我强加的限制、暴力和导致歪曲交流的各种条件之下解放出来的兴趣。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通过人的意志和意识加以创造，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非理性的东西，例如支配、压制和对个人行为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既然人类的自我理解容易受到往往是隐蔽的各种条件和限制的制约，人们就有必要不断地通过反省来克服或消除这些条件和限制："反省使人们意识到自我修养和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当前的实践和人们对世界的观念；反省导致顿悟，因为它使此前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得到认识；分析性的洞察介入生活"。(Habermas，1973：22—23)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对获得自身解放的兴趣构成了以促成反省为目标的批评科学的主要动机，而批评科学又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所有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科学。科学家必须进行反省，他们必须考虑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他们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是在真空或象牙塔里进行的，它受到各种兴趣(包括科学家自己的兴趣)的影响，因而有其自身的准则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科学家视为自然界的观察者和解释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社会的成员，每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么，"每一门把客观意义包括在其研究对象领域中的科学都不得不考虑到解释者的参与角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解释者不必赋予他所观察到的事物以意义；但他必须阐明所观察到的结果的特定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交流过程中的上下文而被理解。理论知识要拥有客观性需要一个独立的在价值观上属于中性的环境，而正是这些意义影响着这种环境"。(Habermas，1990：28)

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上述关于认知兴趣的理论属于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历史的理论，即批评科学必须考虑到言语交际和社会交往的历史生活环境；它必须认识到它所分析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环境并非是天赋的而是来自于生活，因而必须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加以理解。当一位批评家在解读某一语篇时，“如果解读者目前碰到的困难在该语篇被生成的时候并不存在或者并不那么难以解决，那么他就必须阐明作者当时假定的其受话人所共享的知识。……如果解读者自己意识不到作者在必要时可能提出的理由，他就不可能理解一个语篇的语义内容。”(Habermas，1990：30)第三个层次是实际的分析，即分析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以便识别其中潜伏的危机、支撑这些危机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些能够参与解放过程的社会群体。

对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的批判和抵制见诸于许多20世纪西方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例如，巴赫拉德(Bachelard)在区分普通知识和科学知识时指出：“关键的是，反映相对于感知，它处于优先地位。……人类通过科学技术获得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甚至也不是自然现象的自然结果。”(Bachelard，摘自 Hak & Helsloot，1995：5)在巴赫拉德看来，实验证据是人为创造的：“现象必须经过工具的筛选、过滤、纯化、成形；的确可以说是工具首先生产了现象，而工具只不过是物化了的理论。由此产生的现象整体上带有理论的烙印。”(同上)柏瑟(Pêcheux)在一篇以“Herbert”为笔名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尚未完成与意识形态的必要的认识论决裂，所以它产出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因此，他认为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是科学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社会政治实践的目标主要是以保持整个社会结构不变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Herbert，1966)在另一篇文章中，柏瑟区分了意识形态的两种形式：来源于技术的“经验意识形态”(empirical ideology)和来源于政治的“思辨意识形态”(speculative ideology)。柏瑟使用语言学术语对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形式的不同作用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经验形式指的是词义与现实的关系，而思辨形式指的

是词义之间在话语的总体形式下的相互连接。借用语言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经验形式突出的是一种语义功能——能指和所指的符合，而其思辨形式突出的是一种句法功能——所指相互之间的联系。"(Herbert，摘自 Hak & Helsloot，1995：9—10)意识形态过程必须被理解为语义作用和句法作用的结合。柏瑟认为，社会科学只通过经验的手段研究话语，对思辨形式的意识形态却视而不见。

自 20 世纪以来，哲学家、文论家和语言学家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把语言视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和个人生活的干预作用。塞尔顿(Seldon)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能够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妄称语言是一种自然透明的媒介，读者能够通过它理解一个可靠的和统一的'真理'或者'现实'。"(1985：74)柏瑟也反对把语言只看作人们相互交换信息或者交流意义的一种工具，因为语言工具论视信息和意义为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柏瑟认为，这种语言观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在人文科学中的作用是掩盖或模糊各人文学科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把它们置于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Herbert，1968)。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语言在其运作中把"能指"(signifier)置于高于"所指"(signified)的权威地位。他是这样描述能指、所指和说话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能指在决定某些作用中具有主动功能，在这些作用中能被表达的事物通过变成所指而似乎从属其符号。能指的这种主动功能现在变成了人性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不仅仅是人在说话，而且是它在人的内心和人说话；人性由一些结构构成，其中包括语言结构，在语言结构中人变成了它的材料；因此，在人的内心中存在着言语的联系，这是观念心理学所不能理解的。"(1977：284)拉康在这里强调了说话主体的被动性，间接地否定了语言是一种透明媒介的观点：是语言通过主体说话而不是主体通过语言说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是语言在说话，而不是人在说话。"(霍克斯，1987：164)

要理解拉康和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运行就像下棋的比喻(Saussure，1983：87—89)和伽达默尔(Gadamer)的"语言游戏"概念。伽达默尔把艺术理解中的语言性

或对话规则比作游戏规则：游戏的特点在于，它具有一套不以游戏者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独立的规则体系，游戏人只有适应并遵守这套规则体系才能从事并享受游戏。因此，"游戏的主体并不是游戏者，游戏是通过游戏的实践者才得到表现的"。在艺术理解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者或读者，而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理解的语言性就在于艺术的内在语言秩序对于主体构成的关系。艺术的语言秩序是真正的主体。（王一川：205）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干预作用和对其使用者的世界观所能施加的影响：在许多语言中动物被分类成"宠物"和"非宠物"。自然界中原本并不存在宠物或者非宠物，这种区分完全是人类通过其语言强加给自然界的，而这一分类反过来又必然影响或塑造人的思维和世界观。语言就是这样赋予世界以意义并按照人类的兴趣、价值观和行为对它进行分类和组织的。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我们对"庄稼"和"杂草"的区分。这绝不是植物学的分类而只是一种符号学的分类：它来源于园艺文化和农业文化中人们的兴趣和风尚并被汉语和许多其他语言所编码。

正是基于上述语言事实和哲学社会学理论，福勒（Fowler）和其他批评语言学的创始者才感觉到对话语或语篇进行批评性语言分析是必要的："流行的正统观念认为，语言学是一门描写学科，无权对它所分析的材料进行评论；它既不规定用法也不评价所调查的事物。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存在具有不同的目标和程序的语言学分支；既然语言运用充满了价值，那么实践一种旨在理解这种价值的语言学似乎是无可非议的；这就是已为人们所知的批评语言学。"（Fowler，1991b：5）"批评语言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福勒等人于1979年出版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这本书里。在十年之后的1989年，费尔克劳（Fairclough）在他的著作《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中又提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这个概念。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把传统的文学文体学的理论和方法用来分析各种非文学的大众语篇，例如新闻报道、广告、入学指南、游泳馆规定等等。分析的目的是考察这些语篇中蕴涵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

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叛和补充。以索绪尔、布龙费尔德和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将语言视为一个自主的、自给自足、自我调节的抽象体系；这一体系无论是其产生抑或与它之外的非言语世界之间的联系都是任意的，因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不必参照任何体系外的因素来对它进行"客观"描写。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本来与人类学同生共长，20世纪初致力于研究描写正在逐渐消亡的各种土著语言。然而，从30年代开始它与人类学分道扬镳，试图将自己建设成一门"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即以当时的自然科学为蓝本的经验主义科学。语言只能以其自身的条件孤立地进行描写，不允许参照任何外部的事实，包括文化传统和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语言学反其道而行之，把语言形式在交际语境中的功能作为自己的核心课题。福勒等人把语言与社会看作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他们在《语言与控制》一书的序言里写道：(1) 我们每天生成和接触的语言包含关于现实的具体观点或理论；不同的说话方式和写作风格表达对经验世界各领域的不同分析和评价。(2) 语篇类型上的变化与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因为语言变体反映和表达社会结构中的差异。(3) 语言运用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建立和过程发展的结果或反映，而且是这些过程的一部分，它构成社会意义和社会实践。福勒(1991a)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概括：语言运用所表达的是对我们表述现实具有干预作用的意识形态形式；不同的语言形式或用法因为被使用的语境和交际目的不同而包含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语言并不像传统语言学家声称的那样是人们借以交流思想的透明媒介，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反映；语言传播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因而是社会过程的一种不间断的干预力量。

韩礼德(Halliday，1978)提到"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这个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为了理解别的事物，如社会制度，来研究语言。"(p.36)批评语言学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它着重分析人们生成的符号(如词、短语、句子等)和他们交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

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与科内尔顿(Connerton)所说的批评社会学的目的应该是相一致的:“批评……旨在改变或者甚至消除被认为是导致不真实的或者歪曲的意识的条件……批评……使得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以此在个人或群体中开启一个反省过程,以获得从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的解放。”(Connerton,引自 Fowler,1987:483)不过,福勒(1987)指出,就目的和方法而言,他更倾向于将批评语言学与历史学联系而不是与社会学相联系。像历史学家一样,批评语言学家的目的是去理解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背后的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的历时演变。至于方法,批评语言学家也像历史学家那样,把语篇既看作不同类型的话语实践(例如信件、宪章、宣言、条例等)也看作文献(documents,它们是社会机构的信仰来源)。另外,批评语言学家还像编史工作者一样,特别关注语言表述中意识形态的相对性。

第二章 语言和意识形态

我们对批评语言学的简单介绍已经表明，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始自 20 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就是语言学家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一种理性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关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伍拉科特(Woollacott)指出，现代符号学理论已经超越了结构主义者对一个自足的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关注，而时常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视“意识形态”(ideology)的作用。(1982)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以及稍后出现的“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便把分析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是什么关系？

2.1 意识形态：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一般认为，首先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以此来指一种“思想科学”(science of ideas)。(1990:30) 经过 200 多年的历史演变，如今这个概念的含义已经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的概念来使用：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生产所决定的思想产物，是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体系，是统治阶级有意无意用以巩固其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东西。意识形态本质上掩

蔽现实关系，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俞金吾，1993：161）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种用法，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是为巩固和强化现存秩序服务的。例如，在阿尔杜塞（Althusser）看来，意识形态中总是渗人阶级的偏见，它与人们的实际利益紧密相联，这就决定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为虚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达一种意愿（……），一种希望或一种怀旧，而不是描述一种现实。"（1969：233—234）阿尔杜塞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是相互对立的，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反科学：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知识总是威胁和阻碍。"（阿尔杜塞，引自黄颂杰，2002：708）

葛兰姆西（Antonio Gramsci）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他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是中性的，甚至是正面的。葛兰姆西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是一堆错误的观念，而是认为它代表一种思想体系、一种世界观，是世界观和相应行为准则的统一体；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1971：328）他一方面很清楚意识形态往往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社会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指出，不能因此把它完全看成是贬义的意识现象，因为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和"任意的意识形态"（arbitrary ideologies）。前者指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社会结构的反映形式，并为现实生活所必需；后者指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是个人的思辨，是对社会历史的歪曲反映形式。葛兰姆西充分肯定有机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它具有一种融合作用，个人通过对它的接受获得自觉的团体意识，从而投入到集体的活动中去。葛兰姆西因此把意识形态比喻为一种社会"水泥"。

在批评语言学中，福勒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中性概念，指出"提到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家并不是指一些虚假的思想或者因暴露出'被歪曲的意识'而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信念。更恰当地说它是一个中性的定义，与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关。"

(1991a:92)克莱斯(Kress)和霍奇(Hodge)也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认为它是从某一特定立场组织的思想体系，既包括歪曲现实的政治态度和理论又包括科学和形而上学。(1979:6)费尔克劳(Fairclough)，一方面认为意识形态不应等同于蛊惑性的宣传或偏见，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形态与人类的兴趣相关："意识形态涉及从某一特定兴趣的角度对'世界'的表述。"(1995a:44)汤普森(Thompson)和弗恩(Veron)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对批评性语篇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汤普森从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定义前者："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可用来指意义在特定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1990:7)弗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不把意识形态视为意象或观念，认为它不应该是指话语表达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决定意象和观念的组织和功能的成套规则："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具体的信息内容，或者一类社会话语；从其语义特征的角度看，它是信息组织结构的许多层面中的一个。因此意识形态是任何类型的语篇中，甚至科学语篇中都可能存在的一个表义层面。任何社会交流材料都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性质的解读。"(1971)这种意识形态解读在于发现隐含的信息组织结构。要分析这种潜在的组织结构，就有必要研究其作用机制，即选择与结合的规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表达信息组织结构的某一层次的语义规则体系。"(同上)显然，弗恩强调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和系统性以及信息形式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也正是批评性语篇分析所要揭示的。

2.2　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特征

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经济关系、国家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并不是经济关系的消

极的伴生物，它是整个社会生活中一个能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给予经济关系以巨大的反作用，而且表明自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外，马克思还指出，思想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在统治阶级内部创造了一个思想家群体，他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系统地阐述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最终脱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存在性；即它们与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分离，被赋予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代表着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2—54）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代表费尔克劳（1989）把这一过程叫做"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在此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倡导的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实践逐步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认可，变成了常识性的或者"自然"的东西，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

卢卡奇（Lukacs）也认为，在有阶级冲突的社会里，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从本体论上看，社会存在划分为两个异质的环节——存在和它在意识中的反映。从存在的观点出发，这两个环节不仅作为异质的东西相互对照，而且实际上是现实的对立面。这种二元性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卢卡奇，引自俞金吾，1993：302—303）这就是说，意识或意识形态并不是外在于社会存在并与之抽象对立的某种东西；相反，它们内在于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卢卡奇一方面肯定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特征，认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具有牢固的认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去解释它们之间的冲突，指出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不仅具有认识论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本体论的特征。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物："与其说是科学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不断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因素，毋宁说这种斗争也是意识形态历史本身的一个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的组成部分。"（Lucas，1984：412）

阿尔杜塞把上层建筑区分为"压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缩写为ISAs)两个部分(1970)。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武装力量、警察、法庭、监狱等,它们主要通过暴力来发挥作用;后者包括宗教、教育、法律、家庭、政治、工会、大众传播媒体、体育和文艺等文化活动等,它们主要通过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运用非强制性的、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服务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再生产。ISAs是确保国家政治机器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们既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场所又是其利害关系之所在,正是ISAs使意识形态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存在。阿尔杜塞将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人的关于“人是语言的存在物”这个命题改造为“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从而赋予意识形态本体论的意义:“人类社会孳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之于人类历史就像元素和空气之于他们的呼吸和生命一样不可缺少。”(1970:23)

阿尔杜塞关于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的观点,特别是他因此而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语篇的生成和存在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本质:语篇的生成并非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创造,它必定要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联系并受其制约,因为任何说话者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具体的位置。同样,语篇的意义是由语篇与其生成的具体语境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它总是在一定场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家庭、学校、工会或其他社会机构)中被特定的社会人“消费”的,因而其意义总会打上“消费者”的“烙印”。阿尔杜塞指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入个体,使个体成为一个有见解并能行动的主体。然而真正的主体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始终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1970:54)

2.3 意识形态的语言性

黑格尔认为，人就本来的意义而言是一种自然存在，人要进入社会，就必须扬弃自己的自然存在而转化为社会存在。这一过程是通过"教化"实现的。人类教化的本质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即教化是向普遍性的提升，它要求为了普遍性而舍弃特殊性。教化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教化世界是一个语言世界："每一个使自己由自然存在上升到精神性事物的个别个体，都会在他的民族的语言、习俗和制度里都发现一个前定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如他所掌握的语言一样，他已使其成为他自己的东西了。所以，只要单个个体于其中生长的世界是一个在语言和习俗方面合乎人性地造就的世界，单个个体就始终处于教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对其自然性的扬弃中。"（伽达默尔，1992：17）纯粹的自我只存在于语言之中，教化正是通过语言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而被感受到。

黑格尔的上述观点表明，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语言。马克思是这样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5）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具体的意识形态虽然是在意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产生的，但它们是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表达自己。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某一意识形态所常用的基本术语，那末他的思想是不可能超越这一意识形态的。（俞金吾，1993：65）正是意识形态的语言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因为既然意识形态通过语言这种最具社会特征的普遍的媒介物来反映人们的生活过程，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私人的而只能是社会的。

阿尔杜塞关于意识形态"设问"（interpellation）的理论也表明了意识形态和语言的不可分离性，因为设问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

设问本身就是一个言语行为。阿尔杜塞认为，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通过塑造意识主体而发挥作用的。他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话语塑造和强化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的这个过程叫做"设问"，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人预备一个主体位置，它呼唤出每一个人并赋予他一个名称，尔后通过自我形象或者表征的形式为他提供一种想像态的满足。设问对于每个人往往只是一个"识别"(recognition)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则通过这种识别得到了强化；当意识形态"招呼"他们时，他们便认识到自己是谁。这就是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被某种意识形态说服并相信它向他展示的东西实际上代表了他自身内在的特性或自我。此后，在任何场合，他都会像识别自我一样识别出这种意识形态，而后者一有机会就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存在。

意识形态设问往往是通过被质问人的潜意识发挥作用的。例如，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经常会无意中占据作者为这部作品的"理想读者"所建构的"阅读位置"，从而心甘情愿地从给定的角度理解作品的内容。韦伯斯特(Webster)在讨论读者如何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指出："读者被引向莱文(Levin)并通过他变成了体验小说想像力的中心：除非我们在阅读中特意抵制这种定位，否则很难避免这一过程。"(Hawthorn，1992：146)威顿(Weedon)等人指出："说话时，主体(subject)把自己等同于'他人'，即意义的来源，就好像意义来自于他自己，这是一种误解。正是这种误解现象被阿尔杜塞、拉康等人抓住，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作用方式。它被视为主体认同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基础，认同的过程是经由所谓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设问'来展开的。"(1980：204)

"subject"这个词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含义：(a)指一个自由主体、一个行动中心、一个行为发起者和责任者；(b)指一个从属者，他服从一种更高的权威，因而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只有一种自由例外，即他是自愿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的。拉康把人的社会化和主体的形成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经由"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从"想像

界"(the Imaginary)过渡到"象征界"(the Symbolic)[①]。拉康认为,从镜像阶段起主体就开始在象征界,即语言秩序和表述的世界被确立,而这种确立依赖于对"世界的比喻建构"(the figu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的认识,即对镜子里的"另一个"或"他者"的至关重要的认识;这是自己又非自己的"另一个"代表主体进入象征界。因此,进入象征界意味着认识到主体是分离的,被谈及的"我"与实际说话的"我"不一样。这意味着"我"既是他或她的认识主体又"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主体,服从于某人或某事物的权威和规定。那个某事物恰好就是象征秩序,即语言。"(Cameron,1985:119)格林(Green)和莱比汉(LeBihan)指出,"或许拉康最著名的评论,至少就文学评论家而言,是'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通过语言,主体学习和内化社会结构,以及更具体的性别差异。主体的地位和身份是由语言建构的。"(Green & Bihan,1996:169)这也就是为什么勒塞尔克尔(Lecercle)把"作者"(author)称作一个复合体,他既是"主人"又是"奴隶"。(1999:150)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比喻中的"作者"变为所指范围更广泛的"言者"。

2.4 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

从学科分类看,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而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柏瑟(Pêcheux)认为,社会科学尚未完成与意识形

① 想像界:这是一种"象征前"(pre-Symbolic)状态,是在镜像阶段开始形成的自我的自恋性意象,是自我的幻想或想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体尚不能区分自身和世界,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映像。镜像阶段:这是一个从想像界向象征界的过渡:主体获得了主观性、语言和区分事物的意识。象征界:这是一个语言和表述的世界,代表主体的符号性规范。它既存在于主体之先,因为主体还未出生就已处于象征性秩序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存在于主体的想像界之后,为想像、幻想或审美提供必须的语言规范。拉康认为正是通过这个阶段尚未成熟的幼儿变成为一个"主体"。进入象征界就意味着"主体"进入语言,受到语言这个"能指网络"(the network of signifiers)的塑造。(Green & Bihan,1996:178—179;王一川,1994:70—72)

态的"认识论决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它产出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社会政治实践的目标主要是以保持整个社会结构不变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Herbert，1966)柏瑟将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包括语言学，视为一门门的"技术"，它们通过语篇与政治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与柏瑟一样，沃洛西诺夫(Volosinov)也一再强调语言和符号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依存关系，认为意识形态贯穿整个符号学领域或全部表义系统，"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重合。它们相等同。凡是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存在。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具有符号价值……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意识形态。"(1973：9—10)

当代有关语言与意识形态的看法大多受到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的语言相对论的影响。这一理论使人们广泛注意到语言与认知和思维的关系。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观察与思考总是相伴发生，不存在纯粹的感觉行为。任何人对经验的感知和理解都是以个人的兴趣、头脑中的图式知识和由此产生的对世界事物的预期为基础。人们实际看到的事物或现象总是受其注意力指向的限制，他们看到了什么和没看到什么取决于他们向何处看和注意的是什么。人们最终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能够看到的一部分，这其中的一小部分进入大脑，而最终在大脑储存下来的就更少。具有社会属性的语言参与感性知识的储存和交流，人们极易对那些借助语言习得并通过语言运用而获得强化的感性知识习以为常，并将其当作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物。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现实的社会性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它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认知活动是人的大脑同外部世界以互动形式进行信息加工的活动，人的认知不是对外部事物纯粹的、客观的、直接的反映……语言同外部世界并不直接一一对应，语言的结构与功能都积淀了人类的经验，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以人的认知为中介的，过程大体是：外部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范畴—语言符号。"(徐盛桓，2002)

伽达默尔、洪堡特和维特根斯坦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强调语言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他们认为，语言就是世界观，谁拥有语言，

谁就拥有世界。在伽达默尔看来，人和世界的关系最终可以表现为一种语言关系。意向性的言语活动给人带来一个"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世界在本质上具有语言性。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都离不开从语言这个核心出发，都得依靠语言这个中介。但是另一方面，语言又不仅仅是意义的载体或传递工具，而是人们进入并栖居的地方，是传统的蓄水池，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认识世界，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因此，了解语言也就是了解世界。这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总是早已处于语言之中，正如我们早已居于世界之中一样。语言是我们进入世界的前提，它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正如世界先于我们存在一样。因此，意识形态总是通过语言把自己强加于每一个人。

语言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巴赫金曾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早期，文本之外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影响通过话语或者其他符号体现出来，而这些话语是别人的话语，首先是母亲的话语。然后，这些"他人话语"与以前听到过的另外的"他人话语"通过对话式的加工变成"自己的他人话语"，而后再变成自己的话语："他人话语成为佚名话语，被人据为己有(当然经过改头换面)；意识发生独白化。与他人话语的初始的对话关系也被忘却，因为他人话语仿佛吸收到业已掌握了的他人话语之中(通过"自己的他人话语"这一阶段)。创造性意识在独白化过程中，靠匿名作者充实了自身。这一独白化过程是十分重要的。随后已独白化的意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入新的对话(已是与外部新的他人声音进行过对话)。"(1998:382)罗素关于人们怎样教育儿童的论述与巴赫金的上述观点颇为相似。他指出，我们在给儿童灌输思想时经常表现得相当武断。例如，在向儿童描述地球的形状时我们不是对他们说："有人说地球是圆的，也有人说是平的。将来你们长大了的时候，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他们的论据检查一番而做出你们自己的结论。"我们不说这些而只是说：地球是圆的。"到了儿童成长到能够检查论据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已经堵塞了他们的思想，因此，'地平学会'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在他们心里也不能产生印象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认为真正重要的道德箴言

上，例如'不要挖鼻子'或'不要用刀吃豆子'。用刀吃豆子可能还有值得赞许的理由(不过我不知道)，但在早年受到了催眠似的说服，我已经完全不能鉴赏这些理由了。"(1998:191—192)

柏瑟和伊格尔顿(Eagleton)特别关注语言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作用。柏瑟反对把意义看作自在的独立于语言的东西而把语言仅看作交流这种意义的工具，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旨在掩盖或模糊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联系并把这些所谓的科学置于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他指出，我们必须弄明白生产体系的实践者在没有被正式安排位置，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体系中还有位置的情况下，是如何自发地或者本能地识别自己所处的地位的；恰恰是语言从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只有抛弃语言是单纯的交际工具的观点，才能理解语言的这种给每个人在生产体系中定位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无形的，看不见甚至也感觉不到的，因为语言一方面为个人规定其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另一方面它又掩盖这种定位的方式和过程。(Pêcheux，1982:111—117)应该注意的是，柏瑟并不否认语言的交际功能，他只是认为交际功能不过是语言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之一。伊格尔顿在讨论文学语篇的意识形态性质时不是把语篇视为对一个绝对的现实的易位，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产，是"把某些以往对现实的表述塑造成一种虚幻的客体"。(1976:75)我们所了解的现实和历史实际上是由语篇建构的；如果文学语篇"偏离历史，并不是因为它们把它变成了虚幻的东西，从一种本体论转向另一种本体论，而是因为它构想的意义来自以往对现实的表述而不是来自现实本身。语篇中编织的意义、概念和反应本质上首先属于想像出来的现实，这种想像就是意识形态。"(同上)

2.5　结语

本章概要地讨论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与语言和话语的关系。在讨论意识形态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时我们提到了许多理论和观点，例如黑格尔的"教化"理论，阿尔杜塞的"设

问”理论，伽达默尔等人的语言本体论以及语言对现实的社会性建构等。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把个人基本上视为社会化和反复灌输过程的产物，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独立性和判断力。事实上，个人从来就不单纯是社会化和反复灌输两者相加的结果；作为人，他们的天性之一便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与影响自己的社会过程拉开距离，对这些过程进行思考、批评、论争、嘲弄或拒绝。但是，个人与社会化和反复灌输过程的这种批评性的和论争性的关系并不一定会破坏社会秩序或社会生产，因为拒绝一种价值观或规范可能意味着与此同时接受另一种，或者这种拒绝可能促使他们参与有助于维持社会现状的社会活动。（Willis，1977）

把某些思想或事物作为虚假现象来剖析或作为错误观念来批评，这在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近代哲学以来，培根的知识偶像论和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社会批评都表现了类似的倾向。但是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体系才与作为观念背后基础的物质因素，特别是经济政治因素联系了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理论随之成为思想与非思想的利益和权力等准物质力量互为因果的理论。这样的用法仍是迄今为止欧美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正统观念。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种种相关讨论中，对利益与权力的解释各有不同，但这些讨论的共同之处表现为在所关注的精神现象背后挖掘非精神的、支配性的准物质力量因素，这是当今批评性语篇分析和一切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兴趣所在。

第三章

语言和权力

根据我们在前一章的最后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和讨论，对语言和语篇中意识形态的分析意味着分析语言意义是如何被用于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服务的。福柯（Foucault）指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巴尔特（Barthes）的观点更为极端，他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利必多"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让"权力寄寓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王一川，1994：241）巴尔特相信，权力尤其渗透于索绪尔称之为"语言"（langue）的部分："语言按其结构本身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言语，或更严格地说，话语发出，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用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语言是一种普遍的支配力量。"（同上）巴尔特甚至这样比喻语言中的权力所产生的效果："作为语言结构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1988：5）

费尔克劳（1992）曾对"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这一语篇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它忽视了权力在言语交际中的支配作用。会话分析与此前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和语篇分析相比，在方法论上有很多优点。最先进行会话分析的美国民族方法论者（ethnomethodologist）不是像以往的语言学家经常做的那样将话语看作是言语交流的结果或产品，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所关注的也不是像伯明翰学派那样就有限的材料建立整体的话语结构模式，而是强调认真考察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语言交际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就是说，民族方法论者对会话进行动态的考察，采取自下而上的步骤，先确立会话的最小单位；他们认为会话分析者要解

释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会话参与者话轮转换的规则、话语中毗邻语对的构成、参与者对话语进行修正的方式以及话题的引进、发展、转移、终结，等等。对语言使用者在实际会话中意识到的并自觉利用的生成和理解话语的程序和所持的期待作出客观的概括，这是民族方法论者进行话语分析所始终遵循的宗旨。但是，正如费尔克劳(1992)所指出的，会话分析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忽视了言语交际中的地位和权力因素。在实际的会话中，参与者所拥有的权力以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通常是不一样的，因而在话轮的分配和取舍上也是不平等的。会话分析仍然受到传统的交际观的影响，认为交际的本质就是把信息从一个(些)人的头脑中传送到另外一个(些)人的头脑中去(Saussure，1983：11—12)，语言在这当中只不过是一种最便利有效的传送工具，它是客观透明的，不偏向任何一方。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一种语言的使用绝不只是纯粹客观地向听者或读者传递消息。每一次的语言运用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行使、再生或者颠覆权力的工具。"(Ng & Bradac，1993：1)在我们说话、与他人交往和交流过程中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决定着我们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词、语气、语调、修辞手段等等，并以此支配着你我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伊格尔顿在批评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时也指出："阐释学无法承认意识形态问题——无法承认这一事实：人类历史的无穷对话常常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独白；或者，即使它的确是'对话'，对话双方——例如，男人和女人——也很少占据同等地位。它拒绝承认话语总是被一个可能绝非仁慈的权力所打断；而它最不能在其中认识到这一事实的话语就是它自己的话语。"(王一川，1994：209)那么，到底什么是"权力"？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权力"？

3.1 权力

"权力"是人们在分析人类社会行为时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权力"这个词可以有两种含义："行为的能力"(power to)和"支配控制他人的能力"(power over)。前者指的是人们为追求自己的目标

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个人（或机构）有采取行动、干预事件顺序和改变事件进程的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依赖和使用他所能调动的各种资源。每一个人都处在社会结构中一定的位置上；个人的这种社会地位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力使得一些人有能力做决定、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具备不同程度的这种能力的个人也就具有了大小不同的权力，他们相互处于由权力决定的社会关系中。罗素关于权力的一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的第一种含义："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因此，权力是一个量的概念。假设有两个具有类似欲望的人，其中一人除实现了另一人所实现的全部欲望之外，还实现了其他一些欲望，那么，他就比另一人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一个能实现这一种欲望，而另一个又能实现另一种欲望，那就没有精确的方法来比较他们的权力了。例如有两个画家都希望绘出好画和发财致富；但结果是两人中有一个绘出了好画，而另一个发了财，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估计谁的权力较大了。不过，大致说来，假如甲所预期的结果实现得多而乙实现得少，那就很容易粗略地说甲的权力是大于乙的权力了。"（罗素，1998：23）权力的第二个含义，即控制支配他人的能力，把权力表现为一种关系：在两个人当中，如果一个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个处于被支配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具有权力。这种权力关系既普遍存在于社会组织或社会机构中（例如军队里），也广泛存在于非机构性的日常社会生活当中（例如绑架者与被绑架者之间、朋友之间等等）。罗素认为，权力对个人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下列方式：A）对一个人的肉体直接行使有形的权力，例如监禁或处死；B）以赏罚为诱导手段，例如雇佣或解雇；C）对一个人的意见施加影响，也就是进行最广义的宣传。在这最后一种形式里还包括利用时机，在别人身上形成你所希望的某种习性，例如利用军事训练以达到某种效果。（1998：23）

人们通常认为，只要一个人 A 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使另一个人 B 采取了他原本不会采取的行为，那么就可以说 A 对 B 肯定具有权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 A 对 B 具有权力，那么 A 肯定能够利用 B 来实现 A 的目标。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任

何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都发生在社会环境中,都包含涉及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做事的能力还是支配控制他人的能力都不是万能的或者一成不变的。例如,权威者可能得不到他人的服从,或者他采取行动的能力是由那些原本没有权力的人体现出来的。鉴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区分权力的上述两种含义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两种含义的权力会同时发挥作用,毕竟实现目标的典型途径是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韦伯(Weber,1947)把权力的这两种含义合并起来,在定义中既强调了实现目标的一面又强调了关系的作用:权力是处在某种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者排除阻力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权力可以分为组织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力。一个组织怎样取得权力是一回事,而个人又怎样在组织里取得权力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两者是有联系的。个人的权力基本上依靠组织,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纯粹的精神权力,如柏拉图和伽利略的权力,不需要任何相应的社会机构也可以存在。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即使是这种权力,如果不由一个教会、一个政党或某种类似的社会组织来进行宣传,也不会成为重要的权力。"(罗素,1998:112)

权力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它"不是可以获得、夺得或被分享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可以抓住不放或者任其溜走的东西。"(Foucault,1978:94)权力的大小和有无最终取决于那些支持它或抵制它的人们。沃顿伯格(Wartenburg,1990)指出,即使在社会机构中,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些)人行使权力时,这种权力也有赖于其他人或群体的支持或者与他采取一致的行动。例如,当教师给学生打分或者当老板惩罚或解雇雇员时,只有其他人(包括其他教师或老板)赞成或准备采取类似的行动时,他才有可能行使这种权力。因此,权力总是要通过"社会联盟"(social alignments)发挥作用,"处于统治地位的主体现在的行为有赖于其同盟者在未来采取与他们以往类似的行为。但是这种对可预测将来的信任意味着支配主体的行为方式无法怀疑其同盟者的忠诚,因为只有通过他们的行为,未来才能够得以实现。"(Wartenburg,1990:170)权力关系产生于"各种力量关系的相互支持,形成链条或系统,或者反之,产生于使这些力量相互分离的分裂

和矛盾中。"(Foucault，1978：92)由于权力是通过社会联盟关系来行使和维持的，即使支配者通常也不能恣意妄为，其行为要受到维持未来联盟这一目标的限制。与此同时，从属者可以设法挑战或回避联盟："从属者从来都没有完全丧失权力而只是相对如此……就像支配者的行为要受到通过维持联盟者的忠诚来维护权力这个问题的制约，从属者也总是能够从没有权力的地位来挑战结为联盟的人之间的共谋关系。"(Wartenburg，1990：173)下面我们先看一看权力关系是如何反映在语篇中的以及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来行使权力的。语篇在这里被视为行使权力和实现各种权力关系的一种空间。

3.2 语篇里的权力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语言来帮助实现目标。一个人说的话和他说话的方式会给听者留下印象；语言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和他们的行为。为了影响他人，语言被用来进行说服、发出命令、威胁或许诺，提出要求或请求等等。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代学者(Kennedy，1963)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仅凭摆事实讲道理常常不足以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而语言风格和技巧运用却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此我们便有了修辞学。修辞学是研究说话艺术的学问，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增强话语的感染力，从而加强发话人运用语言影响他人的能力或权力。然而，仅凭语言手段，只是把话说得漂亮还远远不够，因为语言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语言本身与交际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请看下面的例子，这是一位医生和由他指导的一组实习学员之间的对话("·"表示短暂的停顿，"—"表示较长的停顿，"["方括号表示重叠，"()"表示听不清楚的话语：

(1) ① D：and let's gather round. the first of the infants — now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to make a basic. neo-natal examination just as Dr. Mathews has to do as soon as a baby arrives in the ward. all right so you are actually going to get your hands on the infant. and look at the key points and demonstrate them to the group as you're doing it. will you do that for me please. off you go

② S：well first of all I'm going to ⌈ ( )
③ D：⌊first. before you go
that is do you wash your hands isn't it I. cos you've just been examining another baby (long silence) are you still in a are you in a position to start examination yet ( )
④ S：just going to remove this.
⑤ D：very good. it's putting it back that's the problem isn't it it eh —
⑥ S：come back mum —
⑦ D：that's right. OK now just get a little more room by shifting baby. er up the. thing a bit more that's very good. well now. off you go and describe what's going on
⑧ S：well here's a young baby boy. who we have decided is. thirty. thirty seven weeks old now. was born. two weeks ago. um is fairly active. his er eyes are open. he's got hair on. his head ⌈. his eyes are ⌈ open ⌊yes
⑨ D：⌊yes you've
told me that
⑩ S：um he's crying or ⌈ making
⑪ D：⌊yeah we we we we've heard that now what other examination are you going to make I mean —
⑫ S：erm we'll see if he'll respond to
⑬ D：now look. did we not look at a baby with a head problem yesterday.
⑭ S：right
⑮ D：and might you not make one examination of the head almost at square one. before you begin.
⑯ S：feel for the ( )
⑰ D：now what ⌈.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⑱ S：⌊er gross mo-
gross motor ⌈ function
⑲ D：⌊well now. you come down to the mouth don't we.
⑳ S：yes
㉑ D：now what about the mouth

(Fairclough, 1989: 44-45)

这段对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医生 D 频繁打断学员 S 的话语。他这样做的真正目的不是有话要说，而是为了控制 S 的言谈与行为，例如制止 S 不洗手就开始检查、制止他重复同样的信息或者提供已知信息或无关信息、确保 S 提供重要信息。D 对 S 的控制还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在第一个话轮中向S宣布将要进行的项目。其次，向S发出指令，例如①中最后的“off you go”和⑦“中最后的 well now. off you go and describe what's going on”等。第三，对S操作程序或动作的先后顺序进行指导（见话轮③）。第四，对S的操作做出评价，例如⑤中的“very good”和⑦中的“that's right”等。这样的评价通常只用于身份地位相对较低权力较小的一方，如果反过来使用这样的话来评价身份地位权力相当或者在自己之上的人的行为，就会显得非常傲慢无礼。因此，虽然这些评价本身都是正面鼓励的话语，但也属于一种控制技巧。最后，在⑬、⑮、⑰和⑲中D也通过一连串的提问来使S遵守或掌握操作惯例，其中的那些短暂的停顿无疑会对S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使之不得不做出回答。另外也请注意D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在⑬和⑮中他使用的是“否定疑问句”（negative question）：“did we not”和“might you not”。在类似于本例这样的语境里使用否定疑问句往往会带有“我认为是这样，而你认为不是这样；事实上事情正是这样”的含义。此处这些问句一方面假定S应该知道某事，另一方面责备S恰恰不知道这件事，从而使S显得很愚蠢。D在⑰和⑲中的提问，“Now what.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和“well now you come down to the mouth don't we”，也充分体现了D和S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上面这个例子表明，语篇中的权力关系通常表现为权力较大一方对权力较小一方的言语行为的限制，主要有三种方式：1）对说话内容的限制；2）对参与者之间社会关系的限制；3）对参与者在话语中占据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限制。就内容而言，上述例子中的S被要求进行一种常规检查；D与S处于一种职业上的上下级关系；S同时占据两种主体位置：（实习）医生和学生；D相应地也占据两种主体位置：医生和教师/指导者。应该指出的是，虽然D在这个例子中处于支配地位，对S施加各种限制，但他本身也并不自由，而是受到其职业和所选择的话语体裁的限制。每一种体裁都事先为参与者规定了相互关系和应该占据的主体位置；不过权力大的参与者通常具有选择体裁的权利，因而可以间接地以此对权力小的参与者施加限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自己。

在一些场合或者某些语类中，例如上课、诊断、庭审、访谈、招聘面谈等面对面的言语交流，支配和限制的来源与对象、各参与者的位置和权力关系等都十分清晰，但是在许多其他场合和语类中这种关系就不一定很清楚。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2) **Israel Perceives a "Change"**

David Bar-Illan, a senior aide to Mr. Netanyahu, said the terms offered by Sheikh Yassin for a truce were unacceptable — but said the fact that Sheikh Yassin's overture was made at all represented "a positive change,"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In the past, Hamas leaders have spoken of a "holy war" to establish an Islamic state in what is now Israel.

"We would like to hope that it means that he will preach peace rather than violence," Mr. Bar-Illan said. "There is no question he has a following and charisma."

An Israeli committee looking into that bungled hit held its first meeting on Tuesday and requested documents it said it needed for its work.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8, 1997)

这是一个所谓的"大众媒体语篇"(mass-media discourse)，它与面对面的言语交流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单向性。就像几乎所有的书面语篇一样，在这里发话者和受话者是完全分开的，前者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生成语篇的主导权，可以决定语篇中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这则消息非常简短，主要内容是，哈马斯组织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亚辛此前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停火的条件，后者虽然认为这些条件不能接受，但却从中看出了哈马斯组织态度上的某种变化。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在这个语篇的生成过程中真正行使主导权的是谁？回答似乎应该是写这篇报道的那位记者。但是，众所周知，记者是在编辑的控制下工作的，所以也许是编辑或者报社在起限制作用。但是报社是根据什么来报道的呢，它是否必须有消息来源呢？如果是，报道本身的语言和观点是不是会受到那个消息来源的影响并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赋予了它以权力呢？比如，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篇消息来源于以色列政府，其中的转述引语全部来自以色列官员，代表着以色列政府的观点。(辛斌，1996)

大众媒体用作消息来源的个人和组织并不会平等地代表全社会

的人。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肯定要比无业人员和普通工人更容易和更经常获得新闻界的关注。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群体对新闻报道所产生或施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往往会突出地体现在新闻机构的采访或关注对象上，人们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新闻媒体经常代表社会中的权力者和占据支配地位群体的利益，从他们的角度进行新闻报道这一重要事实却往往不为人们所特别注意。在英国的大众媒体中权力者往往是消息来源，因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意识形态在大众媒体语篇中总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例如，工人的罢工往往被新闻媒体报道为“麻烦”(trouble)或者“骚乱”(disruption)，而罢工者则被一些报道描绘成“agitators”、“outsiders”、“seething mob”等等。(Trew，1979：143—144)这显然不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立场。

媒体中的这种倾向性通常只要读者对它使用的语言稍加分析就会暴露无遗。例如：

(3) **Quarry Load-Shedding Problem**

UNSHEETED lorries from Middlebarrow Quarry were still causing problems by shedding stones on their journey through Warton village, members of the parish council heard at their September meeting.

The council's observations have been sent to the quarry management and members are hoping to see an improvement.

(Fairclough，1989：50)

从内容看，这基本上是一篇为老百姓说话的报道：由于管理不善，采石场的运货车沿途洒落石头；政府通知采石场管理者并要求做出处理。我们的语言分析主要关注的是语篇中表达的因果关系。从表面看，造成石头从车上滚落的原因被解释得很清楚，即“unsheeted lorries from Middlebarror Quarry”。但是细加考察，报道并没有具体说明肇事者到底是谁，例如我们很难说肇事者就是运货车。报道如果换个说法原本是可以交代清楚的，比如采石场的管理部门或者其属下的某个(些)人等。但是，直到这篇报道的第二段才提到市政会已经向采石场的管理者(真正的责任者)发出了“观察报告”(observations)并要求改进。值得注意的是，当报道者选用了“observations”这个词时，他就完全避免了把责任归咎于对方(采石场管理部

门)的任何含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报道者使用的不是"observations"而是"complaints"这个词,情况会怎样呢? 事实上,报道者在这篇报道中有意无意地行使了一种掩盖权力关系的权力,具体说,就是掩盖采石场所有者和管理者拥有的既能损人利己、危害社会又能逃避惩罚的权力。这种权力大得足以影响报道的内容和措辞,使之更容易产生一种特殊意义和效果,而避免产生其他意义和效果。这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因为表面看来是新闻记者或新闻机构导致了这种意义和效果的产生,但真正受益的却是社会中的某个或某些利益群体。

媒体语篇中隐藏的权力和特定社会群体使用这种权力的能力有赖于新闻报道和其他媒体活动中的有系统的倾向性,一两个孤立语篇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媒体的威力和效果是通过不断重复使用类似的表现形式并以同样的方式建构阅读位置和塑造阅读主体等累积而成的。那么,媒体的这种隐蔽的权力是否是操纵性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明确的回答,恐怕只能说有时是,有时不是。例如,当美国发生了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平民时,如果报纸故意试图通过报道影响民意来开脱警察的责任,那它就具有操纵性。不过通常新闻工作者只是在按照他们的职业标准和惯例行事而并不会意识到恰恰是这些标准和惯例在帮助社会中的某些人或群体维护其地位和权利。

3.3 语篇里的权力斗争

权力不是永恒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们会不断地重申和强化他们的权力,而那些没有权力或者权力小的人们总会试图争取某些权力,这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无论是在具体场合还是在社会机构中或者在全社会范围内,权力始终是在社会斗争的过程中被赢得、使用、维护或者丧失。请看下面的例子:

(4) ① H: Why didn't you go straight down Queen Street?
② Y: I'm not walking down there with a load of coons from St. Hilda's coming out of school.

③ H：Why's that?
④ Y：Well that's obvious，isn't it? I don't want to get belted.
⑤ H：Well there isn't usually any bother in Queen Street，is there?
⑥ Y：No. None of us white kids usually go down there，do we? What about the bust-up in the Odeon carpark at Christmas?
⑦ H：That was nearly a year ago，and I'm not convinced you lot were as innocent as you made out. So when you got to the square，why did you wait around for quarter of an hour instead of going straight home?
⑧ Y：I thought my mate might come down that way after work. Anyway，we always go down the square after school.

（Fairclough，1989：68—69）

学生 Y 被怀疑卷入了一起犯罪；校长 H 正在为此跟他谈话。从这段对话看，Y 争得了远远超过他的身份应该享有的发言权和对会话过程的控制。首先，Y 在两处②和④对 H 的提问发出了挑战而不是做出正面的回答。其次，在⑥中 Y 除了回答 H 在⑤中的提问之外又连续提出问题来挑战 H，考虑到双方的身份，这种交谈方式显得有些异常。最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Y 根据这个相对正规的场合调整过他的说话方式，他似乎把这次谈话当作一次闲聊，把校长 H 当成了伙伴。这突出表现在他的用词上，如 belted，kids，bust-up，coons 等；最后一个词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当然 H 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对会话过程的引导与控制，例如大多数问题是由他提出的，大部分也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回答。另外，在这种场合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这里的 H）也有可能故意降低一些身份并放弃一些权力以达到更重要的会话目的。

费尔克劳认为，社会的组织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情景的"（situational）、"机构的"（institutional）和"社会的"（societal），任何发生在语篇中的权力斗争都可以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分析。在情景的层次上，上面这个例子反映的是一位青少年学生对校长权威的蔑视和后者采取的应对策略。但是这种师生之间的互动或斗争在当今的教育机构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仅如此，甚至在整个社会中的其他领域或机构中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年轻人与权威者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机构层次看这个语

篇表现的是发生在学校中的权力斗争，但是从更高层次看，它又代表了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年轻人与权威者之间的权力斗争。

3.4 语篇秩序与权力

“语篇秩序”(order of discourse)指的是支撑构成“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各社会领域和机构中的具体语篇，使它们的产生成为可能的社会规约、标准和惯例以及由与这些领域和机构密切相关的各语类(discourse type)构成的关系网络。语篇秩序是社会秩序在语言运用中的体现，它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我们在前一节对大众媒体语篇的讨论已经触及到了支撑语篇内权力的这种社会权力关系。下面让我们以语言“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语类为例，看看语篇秩序与权力的关系。

语言的“标准化”是指一种语言内部的某一“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ety)成为整个社会的“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的过程。语言变体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联系一直是社会语言学探讨的核心课题之一。在英国，语言标准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一过程的一部分，它改善了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因而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中世纪英国的商人是最早的资产阶级，而标准英语的发展与商人不断增强的权力密切相关。事实上，现在英国的标准英语是由中世纪英国商人使用的中部方言发展而来的。标准英语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殖民”(colonization)过程，它竭力“侵入”并“接管”主要的社会机构，扩展自己的使用范围，丰富其形式结构，逐步将此前广泛使用的拉丁语和法语排挤出去，从而使自己渐渐为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最终，由于与文学、政府、法律、宗教、教育等最重要和最强大的社会机构和领域紧密相连，标准英语开始成为象征政治文化权力的语言和掌握政治文化权力者的语言。

标准英语的发展不仅以拉丁语和法语为代价，英语的其他方言或变体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标准英语被看作“正确”的英语，而其他

变体则被看作不正确的英语，其使用者（主要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社会底层的人们）也遭到歧视，被斥之为粗俗、低下、原始、野蛮等。总之，标准英语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把其他语言变体置于从属地位的过程是与资产阶级争取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过程同步发生和发展的。它一方面被确立为全社会的语言，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方言，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利益。它是资产阶级拥有并利用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就像金融资本一样为其提供最大的收益。今天对任何英国人来说标准英语就像一种财富，它是在社会中获得好的工作和有影响有权力的位置的重要条件。

当然，人们承认标准英语的支配地位和重要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使用它或者接受它。一种标准语的发展往往是一个艰难曲折充满阻力和斗争的漫长过程，经常遭到其他语言变体及其使用者的顽强抵制。费尔莱（Fairlie）对此有这样的论述：

(5) There was a King's (or Queen's) English to be proud of. The Elizabethans blew on it as on a dandelion clock, and its seeds multiplied, and floate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King's English" was no longer a form of what would now be regarded as racial discrimination.

Yet there had been something in the remark of the Australian. The phrase has always been used a little pejoratively and even facetiously by the lower classes. One feels that even Mistress Quickly — a servant — is saying that Dr. Caius — her master — will lose his control and speak with the vigor of ordinary folk. If the King's English is "English as it should be spoken", the claim is often mocked by the underlings, when they say with a jeer "English as it should be spoke". The rebellion against a cultural dominance is still there.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from 张汉熙, *Advanced English*, Book 2)

当然，这并不表明普通大众就能够认识到一种语言变体发展成为标准语言的权力基础。虽然他们可能知道标准语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权力阶层的语言，但却未必能真正意识到正是社会中的权力阶层或强势群体确定并维护着各语言变体之间的主次关系。

各种语篇类型共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语篇秩序的一个重要

部分。在一个社会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语类，这里也存在着权力关系和利益冲突。如果把语类视为一种文化产品，那么它们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有价值的商品一样在社会上的分配是不均匀的，权力阶层和强势群体的占有量要远远超过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宗教仪式充分体现了对人们所能接触和使用的语类的限制：只有牧师才有权主持教堂里的礼拜，而牧师资格只有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才能获得。社会的其他领域，如医疗、教育、司法等，情况也是如此。体检、诊断、授课、庭审等活动虽然不一定像教堂里的礼拜那样高度地仪式化，但是对谁可以来组织实施这些活动以及不同参加者在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如病人、学生等）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语类上的这些限制使得一小部分人能够从中获得最大收益。例如，在某一社会中能够使用那些重要的语类，这本身就会加强公众对使用者的地位和权力的承认；而那些被排除在使用这些语类之外的人们不仅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且有时甚至连工作和生计都不保。人们通常认为，是否能使用一种重要语类，成为其主体位置的合法占据者（例如成为一名医生、教师、法官或者律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奋斗。这种观点或许没有错，但是影响个人能力发展和成功机会的各种社会因素也不应被完全忽略。

"形式化"（formality）是控制语类使用范围的最普遍和有效的途径。在每一个社会或语言共同体里，比较重要或被人们较为看重的实践活动和语类都在不同程度上拘泥于形式。形式化是那些能对语言运用产生独特影响的社会语境的一种共同特性，它是使用权力对语篇的内容、主体以及参与者的相互关系施加限制的具体体现。在内容上，拘泥于形式意味着对在各种正规的社会场合的行为和所能够谈论的主题，即可以做或说什么而不可以做或说什么，都有明确的传统规定；在参与者上，对于谁可以或者有资格来占据语篇的主体位置有较之一般场合更为严格的限制，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谁有资格主持教堂里的礼拜。形式化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格的条件来限制参与者，把他们局限于个别社会群体（通常是强势群体），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受到排斥的群体中引起普遍的羡慕或敬畏。在参与者的相互关系上，正规的场合尤其强调社会地位、身份、"面子"等。在这种场合，

权力关系和社会距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都会显得非常有礼貌。礼貌的前提就是对权力差异和社会距离等的清醒认识。

3.5 语篇的非政治化和权力的习惯化

权力和权力斗争在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社会单位无论大小，其中总会有一些人来告诉另外一些人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作出牺牲，或者做后者原本不一定想做的事情。这种支配和控制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例如引起不满和导致相互之间的对抗等。那么，我们通常需要达到怎样的一种平衡，才会使日常言语交际顺利进行呢？一个极端是交际双方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完全不在意，另一个极端是他们非常在意这种副作用以至于完全放弃向对方施加影响的企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各种中间情况，交际的参加者在向对方施加影响的同时尽量消除或者降低副作用。手段之一就是减轻发话者自己的责任，把影响他人的企图伪装起来，使之感到这种影响合意和容易接受。Ng 和 Bradac(1993)把这叫做话语或语篇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例如，如果孩子们在争吵，母亲可以不通过呵斥来制止而是以某种方式让他们意识到妈妈头痛难忍需要安静。再例如，在面对面的言谈中，要求他人做事情一般是以权力做后盾的，因此有时这种要求是直截了当的(如老板对秘书说：“Type this letter for me by 5 o'clock.”)，明确无误地显示着权力关系。但在另外一些时候这种权力关系需要被有意淡化，因此这种要求是间接委婉的(例如上面这位老板可以对秘书说：“Can you type this letter for me by 5 o'clock?”)，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隐藏起来。间接暗示、以请求的方式发出命令，以及各种礼貌的说话方式都是话语非政治化的常用手段，它们能在不同程度上消除或减轻来自受话人的抵触情绪。Ng 和 Bradac(1993)把英语中各种话语非政治化的手段按照使用目的和效果分为三类：用于“缓和语气”(mitigation)、用于“误导听众”(misleading)和用于“掩盖真相”(masking)。

语言既受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又帮助维护现有权力关系。米尔斯(Mills,1959)认为,权力的丧失往往伴随着心理的丧失,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成员往往根据亲身经验来认知其处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能把个人遇到的问题与公共问题相联系,也无法从社会的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观点的启发下,缪勒(Mueller,1973)借用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的理论,指出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语言属于"限制性语码"(restricted code)。限制性语码中的概念局限于此时此地的事物而无法用来进行抽象思维,因而无法使其使用者对社会语境进行宏观分析。结果这些贫困的人们在使用自己的"自然"语言时反而无意中巩固了其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从而帮助维持了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

伯恩斯坦关于"限制性语码"和"完备语码"(elaborated code)的区分一直受到批评,尤其他把前者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并认为使用限制性语码表明思想贫乏的观点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虽然如此,不能否认的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比弱势群体更有能力改变语言规则和语篇秩序并将其推广到全社会。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后开始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后者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类似的但不太明显的例子也会在一个国家或语言共同体的内部发生。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最终取得支配地位的语言或者语言变体都可能使其他语言或者语言变体逐渐消亡。最终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会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变得有利于某些思维方式而不利于另外一些;它会把权力阶层或强势群体作为评价其他群体的标准,将从属群体平凡化或边缘化,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传统在所使用的语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总而言之,群体的支配地位被转移到并编码进在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并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变体中。久而久之,这种获得偏爱的语言变体就不再是有标记的(marked)了,它渐渐变成了惯例或常规的东西并为人们所习以为常;而它在日常言语交际中的合法地位和广泛不断的使用又会反过来帮助某些社会群体强化和维持其支配地位。

3.6　结语

权力是人们为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它也是控制支配他人，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语言和意识形态相伴而行，它们共同服务于权力，帮助建构、维持或瓦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语言既受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这种权力关系。

第四章

语篇、常识和意识形态

社会学家加芬科尔(Garfinkel)曾经写道，日常生活是一个完全建构在"假定"(assumptions)和"期望"(expectations)之上的常识世界，这些假定和期望通常蕴涵在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知识之中，往往为人们所意识不到、被他们想当然地接受、很少受到他们的审视和质疑。但是这些假定和期望却在很大程度上既控制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又左右着他们对他人行为方式的理解。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篇生成所依赖的那些常规惯例都含有看似常识的意识形态意义，各种意识形态意义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融入了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的背景知识中。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

4.1 意义的合法化和习惯化

萨丕尔(Sapir)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绝大多数人，当被问及没有语言他们是否能够思考时，或许会回答'能，但对我来说这样做不容易。不过我仍然认为能够做到'。语言不过是外套！然而如果语言不像一件外套而更像一条铺好的路或挖好的槽，那又会怎样呢？的确，语言本来最有可能是在低于概念的层面上使用的一种工具，对其内容的理解才升华为思想。换言之，产品与工具同步成长，而离开了语言，思想的产生和日常实践是不可想像的，就像没有合适的数学符号体系做工具数学推理不可能实现一样。"(Sapir, 1921:15)

这种观点后来被沃尔夫(Whorf)绝对化："我们根据自己的母语

所规定的方式来分析自然……我们分割自然，把它组织成各种概念并同时赋予各种意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各方达成协议并以这种方式组织它——这是靠我们的言语共同体维持的编码于我们的语言结构中的协议。当然这一协议是不言明的，但*它的条款是绝对必须要履行的*；除非赞成这一协议所规定的对材料的组织和分类，我们一句话都说不了。”（Whorf，引自 Fowler，1986：32）沃尔夫认为，语言就是文化，文化在语言中得以表述；作为人们行动体系的文化，只能存在于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念之中，只有了解这些观念是什么，才能了解什么是文化。在他看来，从语言到文化、从文化到语言、从文化到社会行为、从社会行为到文化，这些都是封闭式的循环性轨道，人们只能沿着这些轨道来运行，而不能离开它们。沃尔夫的这种观点虽经多次试验，仍未被完全证实，不过也未被完全推翻。现在人们通常把萨丕尔和沃尔夫的上述思想叫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并把它分为“强式的”（strong version）和“弱式的”（weak version），即“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形式先于并决定知识的形式和理解过程；就是说，人类还无法想像一种不用语言编码的知识。语言相对论则认为，对于人类语言可能编码的意义，不存在任何先验的限制，被语言编码的意义会塑造或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潜意识。

语言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是绝大多数学者不承认语言能完全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语言相对论并找到了一些证据。（Hill，1988）沃尔夫本人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语言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思想的。在为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工作期间，沃尔夫注意到，人们对事物的命名或描述常常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这些事物的行为和态度。例如，他观察到：“在所谓的‘油桶’储存地周围，人们的行为趋向于一种，即特别谨慎小心；而在所谓的‘空油桶’存放地周围，行为却趋向于另一种——粗心大意，随意吸烟和乱扔烟头。然而，‘空’油桶或许更具危险性，因为里面充满了易爆的气体。从物理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很危

险，但按照惯例的语言分析却必须使用不表示任何危险性的'空'这个词。"(1964：135)沃尔夫的例子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中包含的认知上的"预设"(presupposition)基本上属于一种背景知识，往往不为人们所意识到。当有人把一个油桶说成是"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接受这个词所带有的预设含义，除非他们碰巧知道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空的。由此可见，语言能通过其蕴涵的大量预设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使用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每一种语言都为使用者向他人施加这种不知不觉的影响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么，语言中的这种普遍存在的预设信息是如何产生和保持的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批评语言学家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即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及其编码的意义体系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和"习惯化"(habitualization)。

首先是合法化。平时人们使用语言所表达的各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每个人临时创造的，而是先于个人存在于语言体系中的；这主要是因为，每个人使用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语言而是他所在社会或言语共同体继承的并由全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的语言，而个人在伴随其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也正是透过语言这个媒介来了解他所生存的社会和外部世界的。这种全社会公用的语言一般被称做"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或者"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因为它的结构和意义主要是由使用它的社会或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群体的利益所规定的。从婴儿呱呱坠地起，他们最先从作为老一辈和拥有绝对权威的父母那里学习语言。随着他们的成长，学校教育又适时地将其进一步引入权威者的语言：学校及其教职员工是获得政府认可的，他们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传达的相关意义，其合法性通常直接来自官方(例如通过定期检查、公开考试、在指定部门进行的教师培训等)。学校教育使用的课本以及从图书馆和书店所能得到的书籍，它们也都主要是用标准语言写成的语篇，并由官方认可的正规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在成长过程中，儿童从报刊杂志、电影电视以及其他传播媒体中接触的往往也都是主流社会的语言和意义。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一生中所接触的基本上是官方或主流社会认可的符合强势群体利益的语言和概念体系，而标准语言及其编码

的意义也以这种方式在一代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强化和延续①。这正应了福勒的话："语言中的意义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约定俗成的。当语言学家说意义的表达是任意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任何声音或字母可以用于表达任何意义。但是什么样的意义最终得以表达却不是任意的或者偶然的。在一个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会有一种词汇体系或措辞发展成适合该社会需求的体系——这些需求是占支配地位的特权群体的利益需求。这些重要群体控制着把他们喜欢的意义体系合法化的手段：学校、图书馆、大众传播媒体等。这样，语言变成了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成为维持主要社会秩序的工具。"（1987：31）这就是一种语言和意义体系成为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后所必然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约定俗成的语言和意义体系导致的第二个问题：习惯化。代码具有通过把具体概括成一般来简化知识和行为的神奇功能。例如城市中的红绿灯交通信号，当人们碰上红灯时就会不假思索地主动停下等待，并不仔细检查这个信号是否妥当，也不注意信号灯的高度、信号的强度等等。不仅如此，人们还会想当然地认为路上所有其他行人和驾驶者都和他们一样明白并遵守信号灯的指令，因而对交通的实际情况不会太留意，绿灯一亮马上前进，很少左顾右盼。这个例子说明，人们注意识别交通信号的意义并遵守它的规则，而不在意其语境和细节特征，除非这种信号发生异常或者与人们的预期不一致，例如红绿灯停止工作或者长时间不发生变化或者规则改变了（如碰上红灯时也可以向右或向左转）或者看到有人公然闯红灯。在这些特殊情况下人们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看"（see）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识别"（recognize）。总之，信号可以使我们的行为习惯化，使我们的认知自动化和不具分析性。交通信号如此，语言符号也是如此。

语言符号和语言运用导致的认知和行为的习惯化甚至可能极具危险性。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沃尔夫所观察到的油桶和空油桶现象，

① 当然也会有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逐渐的和小规模的，偶尔是剧烈的和革命性的。

在充满易爆气体的所谓"空油桶"旁吸烟和扔烟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福勒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把一个里面的水已经受到有害化学物质严重污染的洼地简单地叫做"水坑"可能会导致灾难的后果，因为"水"这个语言符号向不知情的人们传递的是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信息。奥维尔(Orwell，1946)是这样描述语言运用中认知和行为的习惯化的："当望着台上某个疲惫的唯命是从的庸才机械地重复着一些熟语——bestial atrocities，iron heel，bloodstained tyranny，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stand shoulder by shoulder——人们经常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们正在观看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木头人：灯光每每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使人看不见后面的眼睛，只看到两片光碟，每当这时人们的这种感觉就会突然间变得越发强烈。这并不完全只是幻觉。一位使用那种措辞的说话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他的喉部发出了合适的声音，但是他的头脑却并没有像他选择使用自己的词语时那样参与其中。如果他在做的演讲是已经做过多次早已习惯了的，那他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人们在教堂里发出的应答便是如此。而这种被弱化了的意识状态对于获得政治上的服从即使不是必不可少的，毕竟也是很有利的。"

柏瑟(Pêcheux，1982)把上述奥维尔引言中提到的"熟语"(familiar phrases)叫做"预制语"(pre-constructeds)。这类成分所表达的概念或意义通常被语言使用者视为不引起争议的并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是属于常识的一部分；因而在生成话语或理解话语时它们往往被当作背景知识的一部分。除了上面奥维尔提到的那些例子之外，英语中类似的其他例子俯拾即是，如当今频繁出现于英语报刊中的"human rights"、"freedom fighter"、"terrorist attack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等等。这些陈词滥调虽然无一不带有意识形态意义，但是频繁的使用似乎已经使人们对它们所表达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和含义习以为常了，从而不再对其提出质疑或进行审视。就是说，这些原本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意义已经作为一般的语言意义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变成了常识的一部分。费尔克劳把这一过程叫做意识形态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4.2 常识的语篇功能

费尔克劳（1989：Ch. 4）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常识”（common sense）的语篇功能和意识形态性质。他从加芬科尔关于“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这个常识世界”的讨论开始，指出日常生活是建立在既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又控制他们理解他人行为的那些假定和预期上的。话语或语篇中包含的常识意义构成日常生活常识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渗透于话语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的常识性背景知识之中。费尔克劳的讨论主要围绕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

（1）什么是语篇里的“常识”？常识与语篇连贯性和语篇理解过程有怎样的关系？常识、连贯性和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2）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如何表现在语篇里的？

（3）意识形态变异和社会斗争之间是什么关系？语篇中意识形态性质的常识是怎样在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4）意识形态性质的常识是如何影响语言成分的意义、说话和写作常规以及生成语篇的社会主体和语境的？

（5）分析者如何使这种处于背景中的常识前景化，令其处于突出的位置？

我们在本节和后面的几节中将就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做一简单讨论。先看看常识性的背景知识与语篇的连贯和理解之间的关系。

假设我们知道一个语篇（口头的或书面的）里每一个词的字典意义，那么要弄清楚整个语篇的意思或者对它做出连贯的理解我们还必须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太大，要做出完整的回答并不容易；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必须弄清楚语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第二，还必须弄清楚如何把该语篇表达的意义或传递的信息纳入我们以往对世界的理解中，以便知道它是关于世界哪些方面的或者它预设了什么样的世界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

为，语篇的连贯性主要是由语篇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和语篇与世界之间的衔接这两个方面构成的，无论哪一种衔接实际上都是由语篇的读者建构的而不是由语篇本身形成的。不过，在建构这些衔接关系的过程中读者必须求助于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属于背景知识的那些假设和预期。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语篇与世界衔接的例子。

(1) For many centuries, the opal was reputed to be an unfortunate stone, bringing the wearer bad luck.

(*True Story* Summer Special, Argus Press, 1986)

人们必须设想一个怎样的世界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或许是这样一个：在这个世界里石头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运气。值得注意的是，由该语篇预设的这种世界观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常识的一部分，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有些不可思议。请再看一个稍长的例子：

(2) Clare Russell came into the Clarion office on the following morning, feeling tired and depressed. She went straight to her room, took off her hat, touched her face with a powder puff and sat down at her desk.

Her mail was spread out neatly, her blotter was snowy and her inkwell was filled. But she didn't feel like work.

(van Dijk, 1977: 98)

显然，如果想顺利准确地理解这段话必须具备下面这样的背景知识：一个房间可以构成办公室的一部分，办公室里通常需要有办公桌，办公桌上摆放的物品中经常包括信件、墨水瓶和吸墨用具等等。另外，我们的常识还会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职业女性一般很注意形象，她们往往随身带有简单的化妆用具，其中包括粉扑。这个例子说明，语篇连贯性依赖读者对周围世界一般状态的认识和假定，就是说，读者对语篇意义结构的期待取决于他们对世界的一般结构和世界中各种事物和事件的具体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的知识。如果语篇中所表达的属于异常现象，那么读者就需要发话人给予具体的信号或指示。比如，上面的例子最后一句话之所以使用“but”(但是)这个词，是因为坐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前却不工作，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认知语言学家把人们关于那些比较固定的常规场合或情景的知识叫做“框架”(frame)，或者“图式”(schema)或者“脚本”(script)。

就上面这个例子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理解这段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事先已经存在着一个“办公室框架”。无论是在阅读汉语语篇还是外文语篇时，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会，我们几乎都认识语篇中的每个词或句子，但就是对整个语篇不知所云。其中的原因往往是我们缺乏某种相关框架，或者虽然具备这个框架但却没有能够及时激活它。请看下面的例子：

(3) The procedure is actually quite simple. First, you arrange things into different groups depending on their makeup. Of course, one pile may be sufficient depending on how much there is to do. If you have to go somewhere else due to lack of facilities that is the next step, otherwise you are pretty well se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overdo any particular endeavour. That is, it is better to do too few things at once than too many. In the short run this may not seem important, but complications from doing too many can easily arise. A mistake can be expensive as well.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mechanisms should be self-explanatory, and we need not dwell on it here. At first the whole procedure will seem complicated. Soon, however, it will become just another facet of life. It is difficult to foresee any end to the necessity for this task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but then one never can tell.

(Bransford & Johnson, 1972: 722)

布兰兹福特(Bransford)和约翰逊(Johnson)在1972年进行了一连串实验，旨在探讨背景知识或图式知识与话语理解和回忆之间的关系；上面这个例子是他们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使用的一段话。实验结果表明图式知识对语篇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许多人在读了上面这段话之后恐怕都会感到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把它与背景知识中的哪一个方面相联系。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段话是关于洗衣房里如何洗衣服的，它立即就变得不那么难理解了。这个例子不仅表明背景知识对话语理解的重要性，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具备相关知识还不能保证话语理解的成功，只有这些知识被有效地“激活”(activated)了，它才有助于话语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语篇的生成者总会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为读者提供线索。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语篇的生成还是对它的阐释都是以理解为前提的。语篇的生成过程也是建立在生成者对整个世界或者

其某些方面的理解之上，而最终语篇的形式特征则是这种理解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对读者而言，这些痕迹就是理解语篇的线索，引导他们借助自己的图式知识来理解语篇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看一看连贯性的第一个方面，即语篇各部分间的衔接。在理解话语时受话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明确表达出来的那些命题之间填充未被言明的信息来把语篇的各部分串联起来。任何语篇在本质上都是不明确的，就是说，其中有大量的命题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但是它们可以由受话人根据表达出来的命题推导出来。范戴克(van Dijk)把这些未被言明的命题叫做"缺少的环节"(missing links)。例如：

(4) John came home at 6 o'clock. He took off his coat and hung it on the hat-stand. He said "Hi, love" to his wife and kissed her. He asked "How was work at the office today?" and he took a beer from the refrigerator before he started washing up the dishes (...)

(van Dijk, 1977: 110)

哪怕是如此短的一个语篇，里面也包含着大量未被言明的信息。例如在第一和第二句话之间我们至少可以推导出下列信息

(5) (John came home at 6 o'clock.) Walking to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flat he put his hand in his left coat pocket, searched for the key to the door, found it, took it out, put it into the lock, turned the lock, and pushed the door open; he walked in and closed the door behind him. (He took off his coat and hung it on the hat-stand.)

再看下面的例子：

(6) Problems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We are always willing to listen. You can write to us, Dave and Lesley, at: Blue Jeans, P. O. Box No. 305, London NW11TX. Please enclose a stamped, addressed envelope if you'd like a personal reply.

要使这段话具有连贯性，我们必须设想：1)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找个人谈谈；2)"这个人"的主要作用是"倾听"。就是说，你遇到问题先不要试图自己去解决，要找一位能耐心倾听的人谈一谈。另外，要建立第三个句子与前文的联系，我们还要设想谈和听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来进行。

4.3 常识的意识形态功能

前面的例子表明，在阅读语篇时往往是读者自己而不是作者把常识性的假定和背景知识带人话语的理解过程中。这向我们展示了把某些思想强加于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即说话者可以通过在语篇中提供的某些线索来引导读者持有或产生某种联想或想法。这是因为在英语里定指(definite)名词短语都包含一个存在命题，例如当一个人说出“The king of France is bald”这句话时，句子中“the king of France”这个短语的使用意味着说话者认为“法国有国王”。不仅如此，使用这种定指名词短语通常还表明发话人把其中所包含的存在命题当作一个不争的常识性的事实。因此将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倾向的意义或信息通过语言手段使其隐含在语篇中成为常识性背景知识的一部分往往会产生理想的潜移默化效果，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或者接受它。费尔克劳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意义在不被察觉时才最有效：“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在最不显眼时才最有效。如果人们发现了常识的某一方面正在以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代价维持权力上的不平等，这个方面就不再是常识了，而且就不再具有维护权力不平等的能力，即不再具备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语篇中不被明确表达而是被作为背景知识，一方面引导语篇生成者以特定方式来描绘世界，另一方面引导读者以特定方式来理解语篇，从而使意识形态具有了无形的性质。语篇通常不是向外“喷发”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提供线索引导读者将意识形态带入对语篇的理解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对它们进行再生产。”(Fairclough，1989：85)

阿尔杜塞是这样论述常识性意义(他称之为“显而易见的东西”(obviousnesses))和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的：“像所有显而易见的事情一样，包括那些使词‘指代事物’或者‘具有意义’(所有包括认为语言“具有透明性”的思想)的事情，你和我都是主体这一显而易见的思想——而且这种观点不引起任何疑问——是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1970：54)阿尔杜塞这里想说的是，虽然主体性是一种意识形态效果，但它已经为人们所习以为常，变成了一种常

识。这种效果首先是通过语言和语篇发生的。就是说，社会化过程使得人们被固定到了一定范围的主体位置上，而他们通常正是通过各种类型的语篇来学会占据这些位置。每一种体裁都会构建自己的一套主体位置，以供使用该体裁来生成或者阅读语篇的人们去占据。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7)

How a Command of Good English Will Bring You New Recognition and Success

Language — the everyday act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of reading and thinking — plays a much more important part in our daily lives than we usually realise. Indeed, it is a success "secret" of most outstanding men and women.

This booklet describes a new, unique way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to increase your business and social success, to find new power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nd to get more out of life.

Command Request

You will learn in detail how to dominate and influence every situation simply by using the right words at the right time. What's more, you can confidently look forward to ending boredom and frustration and gaining the attention and respect that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Yes, a command of good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aid you could have in your search for success.

这个语篇是如何为读者建构阅读位置的呢？该语篇的理想读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特点？显然这个语篇是针对这样一些人来建构阅读位置

的；他们正在寻求成功、追求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以及结束无聊和失意的途径等等。这种理想的阅读位置在语篇中是部分地通过一些言语行为来建构的。例如，语篇的标题是在向读者“保证”(assure)，良好的英语能力带来成功并令人刮目相看。第三段中的两个句子也都是在实施这一言语行为。语篇的这些部分在实施这一言语行为时所预先假定的都是读者希望成功、希望控制或者影响他人等等。

如果说生产社会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通过话语或语篇来进行或完成的，那么这个过程就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为个人建构位置的渐进过程。社会化过程往往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而社会主体则是由这一过程所不断建构的某些特定的主体位置构成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体远没有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和谐统一，而是像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兰姆西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复合个性”(composite personalities)，或者像福柯所说的，主体弥散于各种主体位置之间：“语篇并不是一个思考的有知识的说话主体进行的壮丽展现，相反，它可以完整地展示这个主体的弥散性和不连贯性。”(Fairclough，1989：104)

那么，阿尔杜塞为什么把他所谓的显而易见的事情，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体”这一思想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效果，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呢？这是因为，在阿尔杜塞看来，这一思想使人们意识不到自己恰恰是作为一个所谓的主体而被限制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相反，他们通常会认为自己的主体身份是先于社会，独立存在于社会之外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错误认识构成各种各样关于人类社会的唯心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些理论把个体置于社会之先，认为社会产生于个人，而不是个人产生于社会。阿尔杜塞把这叫做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意思是说意识形态的本质就在于建构主体——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给主体定位。我们以上关于语篇主体所阐述的观点也适用于语篇的情景。人们通常把语境视为“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不加任何质疑。然而，被人们忽视的是，情景并不像他们的常识假定的那样是先于语篇而孤立存在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语篇的产物；每一种具体的话语类型或者体裁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情景类型，从而蕴涵着与其他语类不同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主体位置还是主要体裁的情景类型都有习惯化或者"自然化"的倾向，就像他们使用的词的意义和交往惯例容易自然化一样，而言语交际的不同层次或方式的自然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效果。首先，词义的自然化是限制话语内容的有效途径，从长远看来，也可以有效限制人们的知识和信仰。其次，情景类形的自然化具有同样的作用，它帮助强化人们对特定社会秩序的意识。再次，日常交往活动形式的自然化能有效限制话语中体现的那些社会关系，并从长远看能有效限制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体系。最后，主体位置的自然化显然对主体具有限制作用，而且从长远看既促进个人的社会化又帮助限制特定社会机构或社会团体的社会个性的总量。由此可见，社会交往中的自然化倾向是维护社会权力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因而也是社会斗争的焦点。

4.4 语境与意识形态意义

构成常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词的意义。我们通常把一个词的意义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这种事实出现了任何问题，我们求助于词典。词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它们在词典中的意义就是它们的意思，这简直是一种常识！然而，只要简单考察一下语言意义的下列两个方面，我们便会对词义的这种常识的性质产生怀疑：词义的变化和意义体系的性质。由于常识赋予词典以权威性，人们往往对词义的不稳定性和变化估计不足。事实上，虽然一些现代词典在体现这种不稳定性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词典基本上依然是标准语言编码过程的产物，依然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即词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要证明意义在不同的社会方言之间会有所变化并不难。另外，意义也随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柏瑟指出，词的意义"取决于词、短语和命题产生的(或者再生的)历史过程中意识形态立场的相互作用"(1982:111)；"词、短语、命题等根据使用者的立场改变它们的意义，它们参照那些立场，即参考(上面所定义的)意识形态来获得意义。"(同上)总之，词义随使用者立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以"意识形

态"这个词为例，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它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意义。有人甚至说，由于这个词有那么多意义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当然，情况还没有糟糕到如此地步。"意识形态"的确有不少意思，但是这种语义变化并不是漫无边际无从把握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意思归为几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至少有这样两组。第一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在英国和美国流行的意思，即"任何有意识地部分或全部从社会理论派生出来的社会方针政策"。(Fairclough，1989：94)第二组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即意识形态是在社会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于特定物质利益的思想"。(同上)

众所周知，一个词的意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系统之中。词及其他语言成分之间存在多种关系，如相同、相似、反义、对立、重叠、包容等等，某一个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词与其他词的关系。话语中使用的词的意义取决于它们与那些没有被使用的词的关系，即"本可以说出而没有说出的词，此前(在同一场合或者其他场合)说过的词，以及不能够说出的词。"(Pêcheux，1982：117)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中有如下论述："总之，感情、评价、情态是语言之词所没有的，它们只是在词语实际用于具体表述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语言之词是无主的，但同时我们却只在特定的个人表述中听到它们，在特定的个人作品中读到它们，而在这里词所具有的已不仅是典型的情态，还有不同程度上鲜明表现出来的(视体裁而定)个人的情态，而个人的情态是独一无二的，为个人的表述语境所决定。"(巴赫金，1998a：172—173)柏瑟和巴赫金在这里所刻意强调的都是，词并不像词典向人们暗示的那样总是具有固定的意义，它们的意义通常会受到语境和使用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8) Displays of fiery trees and silver flowers, a night without darkness.
Brothers and sisters skip by gracefully in dance.
The strains of The Full Moon rise with joyful swell.

But for one man's leadership,
How could the hundred nationalities assemble?
This merry eve's festive gathering surpasses all!

(9) The night was long and dawn came slow to the Crimson Land.
For a century demons and monsters whirled in a wild dance,
And the fiv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were disunited.

Now the cock has crowed and all under heaven is bright,
Here is music from all our peoples, from Yutien too,
And the poet is inspired as never before.

这是两首汉语诗的英译。第一首诗是 1950 年 10 月 3 日柳亚子参加中南海怀仁堂国庆招待会有感而发，填词一首*浣溪沙*；第二首是毛泽东步柳亚子诗的原韵和的一首诗。我们发现，在这两首诗的英译文中都出现了"night"和"dance"这两个词，然而，由于两首诗为它们创造了完全不同的语境，它们的含义便有了相当大的差异。这正应了沃洛西诺夫的话："一个词的意思完全取决于它的语境，一个词有多少使用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思。"(1973: 79)这句话虽然过于夸张，但上述例子表明它不是没有道理的。语境和使用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使同一个词具有不同的意思，而且还可以使完全不同的词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请看下面的例子：

(10) **THE STILL SMALL VOICE OF TRUTH**

Since the invasion of the Falklands on April 2, there has been the sound of many voices. *Yet a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t was an evil thing, an injustice, an aggression*. Nobody disputes that. Even loyal Argentines — let alone Argentina's apologists — accept that force should not have been used to prosecute the Argentine case. But force was used; and it was not necessary. Beneath the roll of Argentine drums there are voices, however small, however still, which say that too, and they recognize that the unity achieved by the junta in Buenos Aires may only be a passing one, since it was born of an injustice. Unity in Britain, on the other hand, is based on recognition of the invasion as an incontrovertibly evil act. Obviously there have been disagreements about the method of coping with that evil, but there should be recognition that to compromise with evil — to appease it — is to run the risk of having to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it. How we react to evil must therefore be conditioned by the need to compromise with it as little as possible, while taking care to see that our reaction to it does not compound the original evil.

(*The Times*, May 20, 1982)

在这个语篇的第二个句子中"invasion"被定性为"an evil thing"、

"an injustice"和"an aggression"。在这个语篇中这三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与"invasion"互换使用而不会对语篇的意义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上面的引语和我们举的例子并不是也不能否定词具有相对稳定的词典意义。巴赫金就曾指出，任何一个词对于说话人而言，都存在于三个层面上："一是中态的而不属于任何人的语言之词；二是其他人的他人之词，它充满他人表述的回声；三是我的词，因为既然我同他在一定情景中打交道，并有特定的言语意图，它就已经渗透着我的情态。"(1998a:174)没有"语言之词"在词典里的中态意义，语言就失去了它至关重要的共同性，从而也就无法保证所有操该语言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如果把词在第一层次上的存在叫做"语言之词"，那么它们在第二和第三个层次上的存在就可以叫做"言语之词"了，正像上述例子试图说明的那样，它们是实际言语交际中使用的词，总是带有个人和具体语境的性质。

4.5 如何凸显语篇中的常识

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只有当话语出了毛病时其中包含的属于常识性的东西才会暴露出来被人们所察觉。这就是为什么批评性语篇分析经常关注那些交际的失败和相互的误解现象以及人们试图修复话语的那些情况，以便凸显话语中看似常识实则意识形态性质的东西，将其带入人们的意识范围之内。另一个可以凸显语篇中这种常识性成分的场合是当交往的双方或者交往的参加者与旁观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在这种场合，对一方来说是常识性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可能就是奇怪的或者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事情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之间经常发生。语篇分析者完全可以围绕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向人们展示在他们看来表达的可能是异己意识形态的话语或语篇。凸显语篇中常识性成分的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对话语的某种形式的介入来干扰其中的常识性成分。例如下面是加芬科尔做的一个实验：

(11) The student was telling the experimenter, a member of the

subject's car pool, about having a flat tire while going to work the previous day.
(S) I had a flat tire.
(E) What do you mean, you had a flat tire?
She appeared momentarily stunned. Then she answered in a hostile way: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A flat tire is a flat tire. This is what I meant. Nothing special. What a crazy question!'

(Garfinkel, 1967: 42)

在这个例子中实验者试图打乱话语的常识世界，但被实验者对此的反应表明了这个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多么地牢固与真实。我们可以看出，当这个世界受到干扰，人们会变得怀疑、恼火或气愤；他们往往会认为，试图搅乱这个常识世界的任何人，不是傻瓜就是神经出了毛病。因此这第三种方法须慎用。

4.6 结语

本章对语篇中常识性背景信息的讨论表明，虽然语言创造知识、帮助思维并简化认知，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不利的后果：语言编码的范畴会僵化，进入人们的潜意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尽可能多的语言使用者意识到并抵制这种情况。虽然“批评”这个词通常带有负面的含义，但在这里它应该指的是一种健康的质疑，因为批评者关心的是限制人们的知识和知情权的那些社会条件，关心意义产生的方式和各种意义体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等。批评语言学不仅仅是从形式上对作品说短论长，严肃的批评语言学家完全清楚这里涉及的价值观问题，因为他们所研究的语篇和意义都是来自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交往。

第五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1)

"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倡导对语篇,尤其是"公众语篇"(public discourse)进行批评性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强人们的"语言意识"(language awareness),提高他们对语言运用的鉴赏和批评能力,以便更好地应付当今语言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广泛的介人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批评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20几年,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论。可以说它在语篇分析的方法上主要还是采取"拿来主义",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理论方法,只要能用于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它都不会拒绝。当然,批评语言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最主要的方法论来源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谈谈批评语言学为何把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泉;然后,简述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般方法;最后,引入汤普森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以便读者对批评语言学的方法论能有一个较为具体的了解。

5.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语言学

批评语言学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视语篇为生成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认为语篇是一种社会空间,在其中同时出现两种基本的社会过程:对世界的认知与表述和社会交往互动,因而对语篇的分析离不开对话语实践过程本身及其发生的社会语境的分析。费尔克劳(Fairclough,1992:

73)把这一观点图示如下：

图 1



图中表明，“语篇”(text)是交际过程或者“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production)、“传播”(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费尔克劳提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步骤：1)“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2)“阐释”(interpret)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交际过程的关系；3)“解释”(explain)交际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批评语言学的上述观点要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多功能的系统，因此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成了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韩礼德对语言结构提出了纯粹功能性的解释，认为语言的本质与我们对它的需要和它所应具备的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语言的本质与我们对它的需要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功能对于一种文化是具体明确的。……语言的语法系统所特有的形式与语言所要满足的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密切相关。”(1970：142)韩礼德认为语言必须满足使用者三个方面的需要，即表达主客观世界的经验、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遣词造句和组织语篇。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metafunction)：“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

能和"语篇"(textual)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上有助于批评语言学达到其分析语篇的目标。首先,它以语义,而不是以句法为基础,即它从语义出发考察语篇中各种语言成分的表义功能。韩礼德(1973)把言语行为分为行为、意义和语法三个层次,每一层次都由一组选择构成。行为层包括人类的各种行为,言语行为构成其中的一类;意义层包括人类能够表达的所有意思;语法层包括一种语言用于表达意思的各种手段。人们说话就是从行为层到意义层再到语法层的一次次选择。例如,两名儿童在一起玩,其中一位在回家时拿走了另一位的玩具。前者的母亲发现后希望让孩子知道妈妈不喜欢他的这种行为,以后不许这样做。假设这位母亲选择用语言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她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上述意思:

(1) a. That's very naughty of you.
    b. I'll smack you if you do that again.
    c. I don't like you to do that.
    d. That thing doesn't belong to you.
    e. Daddy would be very cross.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母亲首先产生了说话的愿望,因为她有些思想要表达,然后寻找表达这个意思的合适的语言手段。韩礼德的这种语言观符合批评语言学家关于意义服务于权力和语言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思想。

其次,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是,韩礼德关于语言的系统功能理论本质上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性质。他将语言定义为一种意义潜势,即语言使用者可以运用的一组组意义选择。而且,"这种意义潜势是行为潜势通过语言的现实化。'能够意指'在语言中就是'能够做'。意义潜势又在语言系统中被实现为词汇语法潜势,即发话人'能够说的东西'。"(1973:51)总之,"发话人能够说的,即整个的词汇语法系统,作为语义系统的现实化而进行运作;语义系统是发话人可以意指的东西,即我所说的'语义潜势'。我把语言基本上看作一个语义潜势系统。而一旦走出语言,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语义系统本身又是更高层次的某种东西的现实化,这就是发话人能够做的事情,即我所说的

'行为潜势'。"(Halliday,1978:39)语言使用者做出的意义选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们具有语言学意义,因为从语言系统中所做的选择可以被解释为意义选择的一种现实化;另一方面,它们具有社会学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洞察既是社会结构的表达形式又为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那些行为模式。最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尤其是他关于"语域"(register)、语境、衔接和连贯的理论,为从宏观上考察语篇结构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的方法。这有助于批评性语篇分析者从整体上了解语篇的交际目的和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5.2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般方法

批评语言学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①(instrumental linguistics,Fowler,1987:481),它着重分析人们设计的符号(如词、短语、句子等)和他们交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与科内尔顿(Connerton)所说的批评社会学的目的应该是相一致的:"批评……旨在改变或者甚至消除被认为是导致不真实的或者歪曲的意识的条件……批评……使得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以此在个人或群体中开始一个反省过程,以获得在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的解放。"(Connerton,引自Fowler,1987: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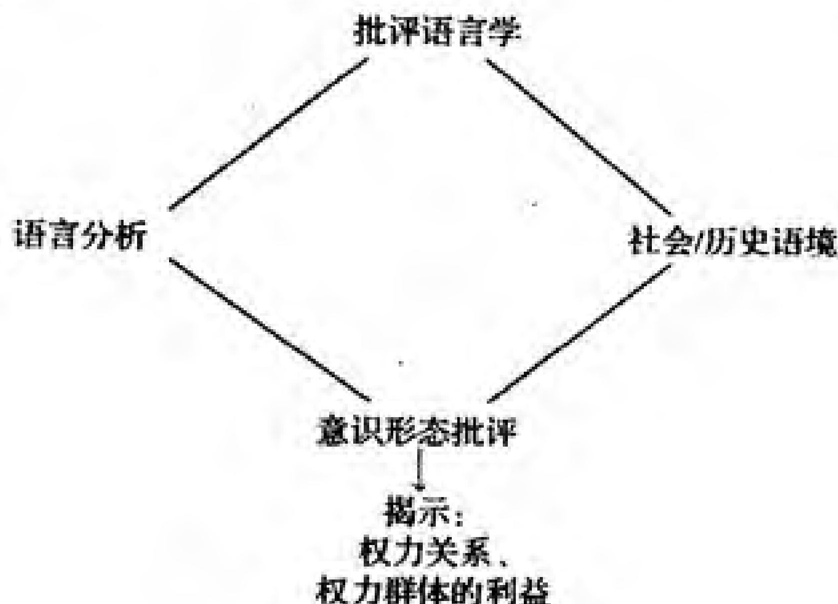
批评语言学迄今特别关注的是两个非文学领域。一个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司法官员、商业组织、新闻机构等的话语。这些语篇值得分析是因为它们来自官方,在塑造一个社会的态度、意义和意识形态上起着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于这样的语篇,普通百姓通常只是被动地接受,很少对话语的生成者直接做出

① 韩礼德将其定义为"为了理解别的事物,如社会制度,来研究语言"(1978:36)。

反应。第二个非文学领域是个人话语，即个人间发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谈。个人话语很容易使人习以为常，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意义。批评语言学家经常考察的主题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教育、就业和司法上的不平等；战争，核武器和核力量；政治策略和商业行为等。在分析中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分化和不平等，但这样的社会为什么能够维持下去?"。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批评语言学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意识形态的产生和运作机制上。在他们看来，正是意识形态使得现存社会关系的再生和延续成为可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批评性语篇分析特别注意语篇生成者在"及物性"(transitivity)、"情态"(modality)和"分类"(classification)等方面做出的选择，以及不同句子结构之间的相互转换所产生的不同意义。进入 90 年代一些批评语言学家致力于扩大语言分析的范围和加强分析的客观性和一致性，有的甚至列出了应该重点分析的语言项目清单。(Fairclough，1989，1992)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批评语言学特别强调在分析中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福勒(Fowler，1987)甚至提出，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批评语言学更像历史学而不是社会学。我们可以把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般步骤图示如下：

图 2



批评语言学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分析语篇的结构特征并将其与某些生成技巧或过程相联系，例如，分析者可以把某语篇对动作名词和被动结构的大量使用看作是“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这两种言语生成过程在该语篇中的具体体现。然后，分析者可以论证，这些技巧或过程在所分析的语篇生成和理解的具体语境里或许与某种意识形态意义相关。例如，在具体语境中“名物化”和“被动化”具有物化社会历史现象的作用，即把事物短暂的历史状态表述为永久性的自然状态。最后，分析者还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语言过程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对某种社会过程起着介入或干预作用，例如帮助获得、维护或颠覆某种权力关系。

批评性语篇分析者对于带有明显偏见的语言选择或者语篇中明确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观点或思想倾向不感兴趣，因为读者要识别它们并不难。他们特别关注的是语篇中那些不被直接言明的隐藏在语言表达背后的假定、信念和价值观，即巴尔特(Barthes)称之为“神话”(myth)的那些东西：不是由其信息涉及的对象而是由其表达信息的方式所定义的“一条消息”、“一类言语”或者“一种交际系统”。(1957：14)批评性语篇分析就是要揭示语篇里那些不易被读者察觉的各种假定和信念以及它们是如何通过语言手段而被隐蔽地表达的：“批评语言学致力于参照语篇的社会历史背景详细研究其语言结构，以便揭示语言中含有的信仰和价值观模式——对于把该语篇视为‘自然’的任何人，这些信仰和价值观模式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Fowler，1991b：67)下面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2) Picture the average household before their evening meal. Has mum cooked it? No, she's just come in from work — she'll get a ready-prepared meal out of the fridge just for herself. The family no longer eats together because it can rely on today's high-tech food any time they want it.

(*Sunday Times*, January 22,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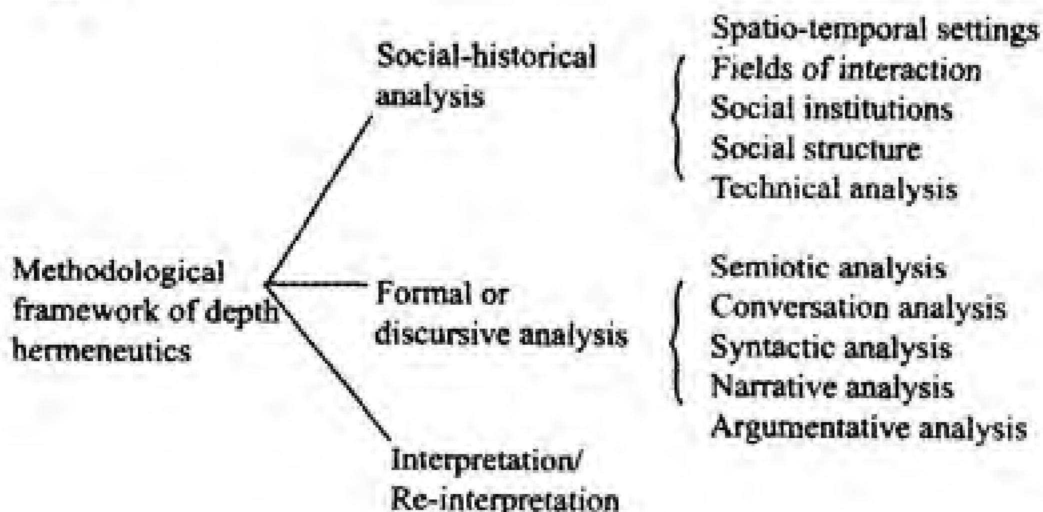
包含例(2)中这段话的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由于对高科技食品

和微波炉的依赖，一般的家庭普遍缺乏烹饪知识。在例(2)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蕴涵的关于家庭和母亲角色的一些传统观念。例如，"Has mum cooked it?"这个问题显然假定，在家里做饭通常是母亲的事情；但是，在本文中，"母亲"没有承担她的角色，即她不做饭，而是在外面工作。所以，上述问题事实上是对"她"作为母亲的资格和她是否遵循了传统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另外，本文也暗示，它所指的这个家庭处于分裂状态，而不是一个真正圆满的家庭，因为其成员"不在一起就餐"。说话者在这里利用的是关于典型家庭的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成员在一起吃的家庭才算一个家庭。

5.3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

汤普森(Thompson，1990)提出了一个语篇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对前文中的批评性语篇分析一般方法的具体化或者详细化。汤普森认为任何语篇分析都必须以对语篇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基础，因而都会涉及阐释学的理论方法。所以他把这个分析模式叫做"深度阐释学的方法论框架"(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depth hermeneutics)：

图 3



(Thompson，1990：281)

根据这个框架，对语篇意识形态的分析应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历

史分析、形式或语篇分析和阐释/再阐释。先看第一个方面。如前所述,任何语篇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传播和接受的;社会历史分析的目的就是试图再现这些具体条件,它主要包括五个层次:

1. 认识并描写产生和接受语篇的具体"时空场合"(spatio-temporal settings)。
2. 分析和描述语篇产生的"交际领域"(fields of interaction)。一个领域可以被视为存在一些"位置"(position)和"轨道"(trajectory)的一个空间,这些位置和轨道一起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能得到的机会。个人在交际领域里采取行动时,需要依赖各种各样的资源或"资本"(capital)并遵循某些规则、惯例和灵活的"模式"(schema)等。这些模式并非清晰而系统的规则或方案,而是一些含蓄的不成体系的指导原则。它们被当作实用知识,应用于世俗的日常生活活动中并获得再生。
3. "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是指一套比较稳定的规则和资源加上由此确立的社会关系,它一方面处于交际领域中并通过确定一套位置和轨道而赋予交际领域以具体的形式,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立新的位置与轨道来创造新的交际领域。分析社会机构就是要重建形成各种社会机构的那些规则、资源和关系,追寻其发展,并考察属于这些机构并在其中行为的那些个人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
4. 与社会机构不同,"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指的是社会机构和交际领域中存在的那些典型的比较稳固的不对称现象和差异。分析社会结构的重点是这些不对称的关系、差异和分割,并力图确定哪些不对称是体制性的,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或者说,哪些显示的不是简单的个体差异,而是在资源、权力、机会分配和获取方面的群体的和持久的差异。社会结构分析也包括确定这些差异背后隐藏的可以用来解释它们的产生和存在的那些标准、范畴和原则。对社会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对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不对称和不平等形式的分析,都是社会结构分析的典型例子。

5. “技术分析”(technical analysis)是对赖以产生、传播和接受语篇的媒介的分析。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必须依赖某种传播媒介，而不同的媒介往往赋予语篇以不同的特征，例如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某种可再生性，以及媒体使用者的参与范围等。一般的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通常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场景之中，要求一定的编码和解码技术、规则和资源，这种技术和资源本身在社会中或个人间就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往往只有负责语篇生产和流通的特定机构才可以使用。因此，对语篇传播媒介的社会历史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应阐明这些媒介所处的和被使用的社会语境。

总之，社会历史分析的目的是描写和重建语篇产生、传播和接受的具体社会条件，考察这些语境赖以构成不同的具有特定社会结构的领域的那些规则和惯例、社会关系和机构，以及权力、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和分布。

语篇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第二个方面是形式分析，主要分析语篇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关系，有五种分析方法。“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关注的主要是符号形式本身，包括它们的构成成分、内部结构、相互关系以及符号背后的系统和规则等；它一般不考虑产生、传播和接受符号的那些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在批评语言学家看来，这种分析是很不充分的。“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把语篇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关注的不是就有限的材料建立整体的语篇结构模式，而是强调考察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言语交际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他们认为，只有考察会话参与者实际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发现某一会话机制的内在原因。简言之，会话分析者试图解释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自己建构的会话程序。

“句法分析”(syntactic analysis)是对语法规则在日常言语中的实际运用所做的分析，典型的例子是福勒、克莱斯和霍奇等人在他们

的著作中对各种语篇进行的分析[1]。句法分析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主要是分析叙事体语篇的"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它可以探测具体的叙事手段和它们在故事讲述中的作用,或者考察一组叙事体语篇所共有的那些结构、人物和角色等等。"论证分析"(argumentative analysis)的目的是揭示和重建语篇的典型推理方式,对研究政治性语篇(如政府官员的讲话或文章)尤其有用。因为这类语篇通常以论证的形式出现,即把一些声称或断言、论题或主题,比较连贯地串联在一起,借助于华丽的辞藻,试图说服听众。形式分析是任何语篇分析都不可缺少的,但这种分析绝不应脱离深度阐释学的方法论框架中的其他两个方面,即社会历史分析和阐释/再阐释。

"阐释"(interpretation)在形式分析和社会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并创造新的"可能意义"(possible meaning)。形式分析往往被认为是不搀杂分析者个人观点的客观分析,但无论这种分析是如何地严谨和客观,它都是不完善的,都需要从分析中创造出新的可能意义,需要从字面意义推导出引申意义。我们注意到,在汤普森的分析框架中,阐释也是一个"再阐释"(re-interpretation)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重新阐释过程?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等学者曾提醒我们,关于符号的研究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在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就属于一个"先前已经被阐释过的"(a pre-interpreted)领域。社会历史领域不完全是一个仅仅需要客观观察的客观世界,它也是一个部分由主体构成的主观世界,这些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探究自己和他人,并试图理解和阐释发生在周围的行为、话语和事件等。当社会学家试图解释象征符号时,这种符号本身或许就已经是一种阐释了,即它已经构成客观世界的主体所阐释。因此,在阐释学的这个方法论框架内,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新理解和阐释一个先前已经被理解和阐释过的领

---

[1] 例如福勒等人的《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克莱斯和霍奇的《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Language as Ideology*);霍奇和克莱斯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域；我们是在提出某种可能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或许是全新的，不同于构成那个社会历史领域的主体所理解的意义。

作为对一个先前已经被理解和阐释了的对象领域的重新理解和阐释，阐释过程必然带有风险，必然充满矛盾和争议。引起争议和矛盾的可能性内在地存在于任何阐释过程本身，而正是这种可能性才使批评性语篇分析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5.4 结语

批评语言学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方法论主要建立在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上，但也不排斥其他语言理论中适用的概念与方法。它在分析中特别强调对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而往往被忽视的思想观念，以促使人们对它们进行重新审视。

第六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2)

在前一章里我们粗略地论述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英语中的某些形式在语篇中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语篇的"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及物系统"(transitivity)，"情态系统"(modality)和"转换系统"(transformation)。从理论上讲，语篇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结构都可能具有意识形态意义(Bolinger，1980：Ch.3；Fairclough，1992：74)，但对语篇做批评性分析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详细考察其中的每个语言成分。通常的做法是，在"对语篇的语境、功能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具备丰富的直觉知识和准确理解"(Fowler，1991：90)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中可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某些语言结构和过程，然后就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对语篇做批评性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人们的语言意识(language awareness)和批评性语篇阅读的能力。

6.1 分类

分类是指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Fowler et al，1979：210)语篇的分类系统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没有词，我们的世界将是一座经验的沙丘"。(Eschholz et al，1982：209)但是，语言绝非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人们用它给事物加贴的标签不一定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性，而是会受到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

即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分类原则。例如，澳大利亚人提到18世纪末开始的欧洲人对该大陆的占领时，习惯使用"European settlement"这个词，但他们却常常把土著人在该大陆上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迁移说成是"black invasion。"（Lee，1992：14—16）这清楚地暴露了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的意识形态。类似的例子在语言运用中不胜枚举，如 radical/liberal，terrorists/freedom fighters，riots/demonstrations。特鲁（Trew，1979：135）把上述这样的成对（组）词叫做"争议性纵聚合关系语言项"（dispute paradigm），即"在某一场合可供选择的一组词，其中每一个都表明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样的成对词，在西方传播媒体中的选择运用无不取决于这些媒体的立场和观点。

韩礼德将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归纳为三类，并称之为"纯理功能"或"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和"语篇"（textual）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验或经历的表达。就是说，语言通过这种功能来反映主观和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和发生的事件。人际功能指的是语言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等的功能。语篇功能指的是把信息和语言成分组织成为连贯的语篇并把它与语境相联系的功能。语言的这种多功能的性质可以解释话语或语篇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介入作用：语言通过其概念功能构成知识和思想体系，通过人际功能帮助形成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语言的这两种功能在构成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体中的作用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罗列了一些海湾战争期间英国新闻界指称和描述交战双方时所使用的词语。"we/our"代表以美英法为首的联军，"they/their(s)"指伊拉克一方：

(1) **We have**	**They hav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A war machine
Reporting guidelines	Censorship
Press briefings	Propaganda

We	They
Take out	Destroy
Suppress	Destroy
Eliminate	Kill
Neutralise or decapitate	Kill
Decapitate	Kill
Dig in	Cower in their foxholes
We launch	**They launch**
First strikes	Sneak missile attacks
Pre-emptively	Without provocation
Our men are ...	**Their men are ...**
Boys	Troops
Lads	Hordes
Our boys are	**Their men are**
Professinal	Brainwashed
Lion-hearted	Paper tigers
Cautious	Cowardly
Confident	Desperate
Heroes	Cornered
Daredevils	Cannon fodder
Young knights of the skies	Bastards of Baghdad
Loyal	Blindly obedient
Desert rats	Mad dogs
Resolute	Ruthless
Brave	Fanatical
Our boys are motivated by	**Their boys are motivated by**
An old fashioned sense of duty	Fear of Saddam
Our boys	**Their boys**
Fly into the jaws of hell	Cower in concrete bunkers
Our ships are ...	**Iraq ships are ...**
An armada	A navy
Israeli non-retaliation is	**Iraqi non-retaliation is**
An act of great statesmanship	Blundering/Cowardly

Our missiles are ...	**Their missiles are ...**
Like Luke Skywalker zapping Darth Vader	Aging duds (*rhymes with Scuds*)
Our missiles cause ...	**Their missiles cause ...**
Collateral damage	Civilian casualties
We ...	**They ...**
Precision bomb	Fire wildly at anything in the skies
Our PoWs are ...	**Their PoWs are ...**
Gallant boys	Overgrown schoolchildren
George Bush is ...	**Saddam Hussein is, ...**
At peace with himself	Demented
Resolute	Defiant
Statesmanlike	An evil tyrant
Assured	A crackpot monster
Our planes ...	**Their planes ...**
Suffer a high rate of attrition	Are shot out of the sky
Fail to return from missions	Are Zapped

（材料来源：Widdowson 1994 年在英国 Essex 大学讲授的一堂课）

这个例子证明了批评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对同一事物总会存在带有不同立场或倾向性的不同描述或表达方式。(1)中对交战双方的描述显然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分类原则上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韩礼德也曾提出"词汇的分类组织"的概念，意思是在组织词汇时将概念进行详细的分类。词汇结构上的分类和对立在例(1)中表现得一目了然，这种选词上的对立肯定会塑造或影响欧美读者对联军和伊拉克军队及其领导人的看法并可能左右他们对整个战争的立场和观点。

通过词汇来给事物分类是大众传播媒体惯用的手法，也是创造或产生歧视的主要途径。例(1)中"我们"和"他们"的分类表现了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或种族中心主义的心态。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福勒(1991b:16)将其称为"同中心主义"(homocentrism)。它的特点是偏爱同类，如类似于自己的国家、社会和个人；排斥歧视异类，把他们

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在英语大众媒体中，这种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在第一人称代词"we"和"us"的使用上，例如他们经常出现在社论中以表明发话人是在代表人民说话。其他的例子如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样的短语："our economy recovery"，"our health system"，"our nuclear deterrent"。它们通常出自政客之口，用于表示"合意"(consensus)，即发话人和受话人或者更广泛的人民大众在利益或思想感情上是完全一致的。下面是英国前首相希思 1972 年 2 月关于解决矿工罢工的一篇广播讲话的片段：

(2)　In the kind of country we live in there cannot be any "we" or "they". There is only "us"; all of us. If the government is "defeated", then the country is defeat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just a group of people elected to do what the majority of "us" want to see done. That is what our way of life is all about.

It really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it is a picket line, a demonstration or the House of Commons. We are all used to peaceful argument. But when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is used, it challenges what most of us consider to be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I do not believe you elect any government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and I can promise you that it will not be tolerated wherever it occurs.

(Hall et al,1978:56)

霍尔(Hall)指出，在冲突最明显时公开呼吁合意尤其普遍。"合意"假定，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全体成员团结如一，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所有成员都认可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一个人都同意 p 和 q 和 r 等等(Hall，1973：85—94；Chibnall，1977：14—22；Hartley，1982：81—83)。虽然"合意"听起来开明、大方和有人情味，然而，就像例(1)表明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它往往滋生偏见、敌意和分裂，把人们分成"我们"和"他们"。

与其他词类的词(如形容词)相比，名词的分类功能尤其值得注意。名词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们通常仅以一两个特征为标准把许多事物归于某一类，反过来又把该类事物所具有的全部内涵赋予其中的每个成员。例如：

(3)　"But," I said, "isn't it a fact that the average Jew is a labourer working for about a penny an hour?"

"Ah, that's only for show! They're all money lenders really. They're cunning, the Jews."

(George Orwell:Marrakech;张汉熙,1990:16)

似乎凡是犹太人就一定富有,贫穷也是伪装的。另外,形容词和动词等描写的不一定是永久性特征,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过是事物临时具有的。名词则不同,它们的使用意味着将描述对象贴上标签,永久性地归于某一类事物。请比较:

(4)

形容词	名词
She is ungrateful.	She is an ingrate.
She is worried.	She is a worrier.
Don't be foolish.	Don't be a fool.

分析语篇的分类系统时,有两种现象应该特别注意:"重新词化"(relexicalization)和"过分词化"(overlexicalization)。前者指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取代旧的表达方式或与之形成对立(Fairclough, 1992:194)。例如:

(5) The vocational preparation product is usually a programme. It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re therefore central parts of the marketing process, and should start from the needs of potential customers and clients and the benefits for which they are looking.(同上)

(*Further Educational Unit* 1987: 51)

重新词化反映说话者对事物的新的理解,为他提供新的说话角度。在例(5)中,课程被说成"产品"(product),学习者被称做"顾客"(customers/clients)。这表明说话者把学与教的关系视为商品的买卖关系,反映了当今社会教育商品化的趋势。过分词化指用大量不同的词语来描述或指称同一事物。它对批评语言学的重要性在于表明说话者及其所属的群体或阶层尤为关注的经验和价值领域,从而有助于语篇分析者发现或确认该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Fowler et al,1979:211—212)。例如,英国的《太阳报》(The Sun)1977年在一篇关于一次罢工的报道中不厌其烦地使用了下列词语指称罢工者:agitators, rent-a-mob, outsiders, riot-pickets, bully-boys, seething mob, squalid extremists, demo-merchants, arrogant militants (Trew,1979:143—144)。仅从这些称谓,读者便可清楚了解该报对

罢工和罢工者的态度。

6.2　及物性

及物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与小句(clause)如何表现概念功能有关,其作用是"把经验世界分成易操作的一组过程"(Halliday,1985:106),并表明各种过程的参加者和情景成分。过程主要有六种: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Halliday,1985:Ch. 5)这些过程实际上是对小句表达概念意义的方式的概括和分类,它们与现实中真正发生的过程和存在的状态并不一定有对应关系。同一事件可能表达为不同的语言过程,同一语言过程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

(6) I dropped the vase.
The vase was dropped by me.
The vase fell out of my hand.
The vase broke.
} 物质过程

The vase is broken.　} 关系过程

语篇对过程类型的选择一般会受到体裁(genre)和主题内容的影响。但是,即使同一类型的语篇,对某一事件的描述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过程组合;这通常取决于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和他对事件的理解和看法。"选择哪类过程来表达一个真正的过程会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Fairclough,1992:180)例如,1977 年 8 月 30 日,英国的《太阳报》(*The Sun*)和《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均载文报道了前一天诺丁山狂欢节(the Notting Hill Carnival)的情况,标题分别为"Into Battle"(*The Sun*)和"Fighting Mars End of Carnival"(*The Morning Star*)。

(7) **INTO BATTLE! Riot Shields out as the Police Storm Carnival Mob**

Two hundred police carrying riot shields and truncheons last night charged a rioting mob of black youths at London's Notting Hill Carnival.

More than 70 policemen were injured, one stabbed, before the Special Patrol Group officers cleared the trouble spot at Acklam Road — flashpoint of last year's riot in which 600 were injured.

The 10-minute riot began when youths charged a police cordon. Hurling bottles and bricks as they burst through the thin blue line.

Police reformed the line and counter-charged with truncheons, but the weight of the crowd was too much for them.

Scotland Yard's Deputy Assistant Commissioner David Helm gave the order that Carnival organisers had been dreading: bring out the Special Patrol Group and the riot shields.

The Group, held out of sight during the two-day carnival, met a barrage of bottles and bricks.

An eye-witness said: "At one point the police were pinned down. The mob stoned them and they used their riot shields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e riot began when Carnival organisers asked black youths running a mobile disco in Portobello Road to close down for the night.

A gang of eight youths immediately started stoning the organisers.

One of the stab victims — 21-year-old Morwean Hatom of Cambridge Gardens, Notting Hill — was critically ill in hospital last night. He was knifed in the chest as he left home to watch the carnival procession.

The stabbed police officer, PC Fred Bibby, was later said to be not seriously ill.

The violence started early in the afternoon when small groups of youths used the gaiety of the Carnival for an orgy of crime.

They beat up people in lavatories for the small change they were carrying. Girls were attacked, beaten to the ground and their handbags stolen.

A gang of youths attacked a group of press photographers. Cameraman Barry Beattie was kicked to the ground and badly beaten up.

At Ladbroke Grove Tube Station several hundred youths hurled bottles and bricks at a police cordon. They scattered as a police bus drove towards them with its lights flashing. ...

Before the violence began, laughing happy crowds followed steel bands through the streets. They danced for joy as West Indians and whites mingled peacefully together. ...

And the cry went up from the Carnival stewards: "Stay cool. We want another carnival next year."

Everyone listened except the thugs.

(*The Sun* 30 August 1977)

(8) **FIGHTING MARS END OF CARNIVAL AFTER A DAY OF PEACE**

Police observers hovering in a helicopter above the huge crowds at London's Notting Hill Carnival yesterday estimated between 200,000 and 250,000 people were taking part.

For most of the time and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t was a happy, peaceful occasion.

But by 9 p.m. some streets in Notting Hill had become a battlefield, with the police mounting a massive operation to clear them.

The trouble started about 8 p.m. at the top of Portobello Road, near Westway. A scuffle erupted into the police cordon.

Police, using plastic riot shields and goggles, charged down streets using truncheons under a hail of stones and cans.

The two sides sparred amid a hail of missiles, and from there on the police adopted streetfighting tactics. However, until 10 p.m. at least, part of the Carnival festivities did continue in the streets around Notting Hill.

Dozens of police coaches were in the area and groups of police were standing on every corner, though they were subjected to a hail of missiles said by witnesses to be more violent than the Lewisham incidents.

They seemed determined in numerous street charges to even the score.

When they broke into one shop from where missiles had been coming, those inside were knocked about by truncheons.

There were reports last night that a man of 21 was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with a stab wound. A policeman was also reported to have been stabbed in the stomach.

As the sun began to go down the crowds were in a happy mood despite packed streets — even by 5 p.m. it was impossible to move down Portobello Road and other main routes.

But generally the atmosphere was very lighthearted and good humoured.

The only incidents I noticed occurred when crowds moved suddenly as groups of youngsters started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The great gay surging carnival of music, dancing and singing got under way smoothly in blazing sunshine. ...

(*Morning Star* 30 August 1977)

正像标题表达的那样，前者着力渲染了狂欢节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和狂欢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报道者对该节日活动基本持否定态度。与此相应，语篇中出现的 59 个动词性成分中，有 52 个表达动作性强的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约占 88%)。《晨星报》的报道突出的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对绝大多数人，这是快乐平和的一天"，"总之，气氛非常轻松愉快"。语篇中使用的 41 个动词性成分中，有 19 个表现心理过程、关系过程和言语过程(占 47.5%)。

语言系统总是为表达现实过程提供各种各样的手段，韩礼德(1985: Ch.10)把它们概括为两类：适合表达(congruent wording)和隐喻表达(metaphorical wording)。语篇选择隐喻表达方式的动机很多，其中之一是为了掩饰行为者或模糊因果关系。让我们看一个例子。1985 年 8 月，英国伯明翰市的一名警察在试图逮捕一名犯人时，开枪误杀犯人五岁的正在熟睡的儿子。法庭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调查审理，1986 年 7 月 4 日宣布警察无罪。当晚的 BBC 电视新闻是这样描述男孩之死的：

(9) The boy died when the policeman's gun went off.

虽然电视台未必有意误导听众，但这样的表达方式有效地模糊了该事件中的因果关系。首先，BBC 的新闻本来可以像当时的其他媒体那样，把该事件表达为一个物质过程(例如"The policeman shot the boy"或者"The boy was shot dead by the policeman")。但报道者却把它分为两个过程，用并不表示必然因果关系的连词"when"将两者联结在一起。其结果，"男孩"的角色由纯粹的受害者变成了行为者。其次，把"警察开枪"这个命题置于从句中，无疑降低了该信息的重要性。最后，选择动词短语"go off"使得过程的行为者不再是"警察"，而只能是"枪"(例如，我们不能说"Somebody went off the gun"或"The gun was gone off by somebody")，即杀害男孩的不是警察，而是那支枪。

6.3 情态

情态系统表达人际功能。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有两个目

的:(a)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b)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和直接/间接引语等都可表达情态意义(Halliday,1985:Ch.4;Simpson,1993:Ch.3)。

在许多语言里,人称代词的选择往往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和亲疏程度的限制(Brown & Gilman,1960),例如汉语里的"你/您"和法语里的"tu/vous"。英语第一人称复数代词"we/us/our/ours",按是否包括听话者分为外排(exclusive)和内包(inclusive)两种用法。前者可产生疏远对方的效果,如"We know what's best for you"。这样的话语很容易使对方觉得受人摆布。在本章的第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内包用法通常旨在拉近与听话者的距离,给人一种平等参与、休戚与共的感觉,如"We will all have to make sacrifices in the coming weeks or months"。不过我们也看到,这种用法经常会被权力人物用来创造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Fowler et al,1979:203)

英语里的时态除了表达时间概念外还有其他功能。如过去时表示委婉、礼貌和虚拟等。语篇里现在时的使用尤其应该引起注意。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时态并不表示时间,而是表示普遍性真理、始终存在的状态、习惯性或连续性的行为和过程等。(关于现在时的语篇功能,任绍曾,1995)我们在下一章里分析了英国的《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关于希伯伦惨案的一篇报道中现在时的使用情况,表明报道者借助该时态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希伯伦惨案绝非以色列军方宣称的那样只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以政府和军队长期姑息纵容好斗的犹太移民所造成的恶果。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文学作品中通常用于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秦秀白,1986:262),但在新闻报道和其他大众语篇里,其作用有所不同。大众传播媒体的宗旨之一是追求真实性。由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一般出自当事人、知情者或权威人士之口,对受话人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它们的使用能有效增强语篇的权威性。考察直接引

语需特别注意其来源，不同人的话语可能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引用者常常借此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间接引语由引用者转述而来，转述的方式多种多样（Widdowson，1979：120），它们的选择取决于引用者对原话的理解和他的立场观点与交际意图。考察间接引语的最好办法是，如有可能，把原话找来进行比较，或者将一个语篇中的引语与其他语篇中对相同话语的引用加以比较。前一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弄清说话者在引语中掺入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自己的观点；后一种能帮助我们了解不同语篇在描述相同事件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态度。（Fairclough，1992：Ch.4）

在英语句子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些谓语动词，它们本身就含有各种情态意义。以“realize”为例：

(10) Marian realiz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在这个句子中动词“realize”的使用表明说话人认为它后面的补语表达的是一个事实，这类谓语动词叫做“叙实谓词”（factive predicate）。所谓“叙实”，是指发话人在语句中选择这类谓词必然预先假定（presuppose）它后面补语成分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其他的例子如：

(11) It is significant that he has been found guilty.
(12) I regret that I have agreed to the proposal.

例(11)和(12)中由“that”引导的补语从句，它们表达的命题都是发话人认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整个句子的真实性以从句的真实性为前提。例(11)告诉我们，叙实谓词既可由动词又可由形容词构成。下面是一些常见的叙实动词和叙实形容词：

(13) A. know, realize, regret, grasp, ignore, mind, forget, deplore, bear in mind, ...
B. significant, odd, tragic, exciting, relevant, ...

与叙实谓词相对的是“反叙实谓词”（counterfactive predicate）和“非叙实谓词”（non-factive predicate）。前者预设从句命题的虚假性。例如：

(14) Marian pretend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Leech,1974:302)

显然(14)的发话人选择"pretend"意在表明从句表达的内容不是事实。至于非叙实谓词,它们的使用表明后面的补语从句表达的命题不一定真实,发话人对其真实性不承担任何责任,整句话的真实性也不取决于补语命题的真实性。就是说,发话人在选择这类谓词时,既不预设它们后面从句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也不预设其虚假性。以"think"为例,它表明后面话语的命题内容只是说话者心理过程的一部分,因而说话者对其真实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他的例子如:

(15) I believe that he has proposed several alternatives.
(16) It is likely that he has been found guilty.

例(15)中使用的"believe"表明一种信念,这一信念未必正确。例(16)表明,非叙实谓词同样可以由形容词构成。这里的"likely"意味着它后面的 that 从句表达的只是一种可能。

区别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最简单的方法是否定主句的谓语,这时如果补语命题的真实性不受影响,那么主句中的谓词便是叙实的。请比较:

(17) a. It is not significant that he has been found guilty.
　　b. I don't regret that I have agreed to the proposal.
(18) a. It is not likely that he has been found guilty.
　　b. I don't believe that he has proposed several alternatives.

显然,例(17)两句话中的 that 从句的命题依然真实;而例(18)则不同,在否定主句谓语的同时,从句的命题内容也遭到了否定,就是说,在非叙实谓词句中,主句的否定阈(scope of negation)包括从句。下列词只能构成非叙实谓词:

(19) A. think, want, feel, try, like, seem, assert, suppose, believe, conclude, claim, charge, fancy, assume, comprehend, maintain, happen, ...
　　B. likely, sure, true, false, possible, ...

除了叙实、非叙实和反叙实谓词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含蓄谓词"(implicative predicate)。通常后接不定式从句。在肯定句中主句和从句之间存在一种蕴涵关系,即如果主句的命题内容是真实的,那

利实施；

(2) 行为者至少做过尝试；

(3) 该行为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行为者的能力。

bother: (1) 实施不定式从句表示的行为，要求行为者有意识地做出某种努力；

(2) 该行为实施与否取决于行为者是否愿意做出这种努力。

上述例子表明，含蓄谓词的前提意义中实际上包含一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决定着从句中的事物或行为能否出现或实施。如此看来，在肯定含蓄谓词句中，发话人实际上是在断言某些必备条件已经得到满足，从句表示的行为得以实施。所以我们能够从例(20)引出例(21)。在否定句中情况恰恰相反，发话人断言这些条件未获满足，行为未能得到实施。因此，在含蓄谓词句中，对主句的否定也是对从句的否定。

前提意义是不被言明的隐性信息，它往往以隐蔽的方式表达各种情态意义。语篇中叙实、非叙实、反叙实和含蓄动词的使用不仅反映说话者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看法，而且也反映他对世界的总的观点，即他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因此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

6.4 转换

"转换"一词来自生成转换语法，但其含义在此有所不同。在生成转换语法中，它仅指两种语法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但在批评语言学里这种关系必须从话语的性质、语境和目的等方面加以理解。(Fowler，1991：90—91)另外，"转换"有时也指语篇中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Trew，1979)

考察英语语篇中的转换需要特别注意名物化(nominalization，也叫"名词化")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的运用。名物化指说话者本来可以用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某个意思，但却选择了名词短语。它有两种方式：(a)添加适当的派生词缀把其他词类的词转换成名

词，如"consciousness, acceptance"；(b)用名词短语代替动词结构或句子，如"the detention of black pupils"（比较"somebody detained black pupils"），"the shooting of 174 Africans"（比较"somebody shot 174 Africans"）。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替代动词性结构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名物化将过程和活动转化为状态和物体，将具体事物变为抽象事物"。(Fairclough, 1992: 182)名物化通过删除情态成分、模糊时间概念和掩饰过程的参加者及因果关系等，创造一种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效果。

语篇中的被动结构具有与名物化相似的功能，它为掩饰因果关系和行为者提供了方便。请比较：

(27) The police shot 15 demonstrators.
15 demonstrators were shot by the police.
15 demonstrators were shot dead.

被动化能有效地减弱行为或过程的动作感。在英语里，表示动作或行为的被动结构与表示状态的系表结构之间有时只有一步之差。例如：

(28) The window was closed by a blow of wind.（被动结构）
The window was closed.（系表结构）

某些语篇往往利用被动结构的这一特点，例如：

(29) Membership cards must always be carried and shown on request.
(Fowler & Kress, 1979: 27)

这种表达方式在社团和机构的规章制度中司空见惯。它既隐去了规章的制订者又增强了话语的状态感。福勒和克莱斯(1979: 31)指出，区别就在于过程一般在行为者的控制之下，可以被修改，而状态则往往被视为难以改变，只能让人忍受。此外，被动化是"主题化"(thematization)的一种手段。它把表示受事的宾语成分移到句首，充当有标记主位(marked theme)以突出该成分所表达的信息。下面是英国两家报纸，《泰晤士报》(*The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在报道同一事件时所使用的标题：

(30) Police shoot 11 dead in Salisbury riot. (*The Guardian*)

(31) Rioting blacks shot dead by police as ANC leaders met.（*The Times*）

(30)使用的是主动态，行为者"police"出现在句首充当主位；(31)选择了被动结构，整句话突出了受害者，而将责任者放到了句子中间。在英语的句子结构中，中间位置最不引人注意，所以说话者通常把表示次要信息的成分放到此处。

由于名物化和被动化的语篇功能相似，两者几乎具有相同的分布或出现场合，说话者可以通过它们的交替使用，取得重要的意识形态效果。特鲁（Trew,1979a）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975年6月1日，津巴布韦首府索尔兹伯里发生了游行示威的黑人与白人警察之间的流血冲突，11名黑人被开枪打死，15人受伤。据警方后来证实，冲突的直接起因是一条警犬咬伤了一名游行者，激怒了整个游行队伍。事件发生后，英国的各家报纸争相做了报道和评论。特鲁分别追踪考察了《泰晤士报》和《卫报》数日内的连续报道和评论，发现两家报纸关于该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观点前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流血事件的责任者由开始的"警察"(police)变为"骚乱"(riots)，最后变成了黑人中的"派系斗争"(factionalism)。如下所示：

police ⟶ loss of life
riots ⟶ loss of life
factionalism ⟶ loss of life ↓

（横箭头表示因果关系；纵箭头表示报道者的立场观点前后发生的变化）

这一变化过程是相当隐蔽和循序渐进的。为了取得这种变化，报道者使用了许多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动化和名物化。（Trew，1979a：104）

6.5 结语

语言为表达意识形态意义提供各种各样的手段，这一章对英语中的某些结构和过程的讨论只能是挂一漏万。语言和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可以分为"显性的"(explicit)和"隐性的"(implicit)。前者较易识别，因为它们主要体现在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句子的命题意义

中。但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1]却不易被察觉，它们往往体现在前提意义、内涵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等当中，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中大部分已被自然化，变成了貌似常识性的东西，对语言使用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使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凸显出来，以便人们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① 费尔克劳(1995b:45)区分语篇的"意识形态方面"(ideological aspects)和"劝导方面"(persuasive aspects)。前者主要由这类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构成。

第七章
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虽然批评语言学重视对所有非文学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但是迄今为止新闻语篇是它最主要的分析对象。这其中的原因正如汤普森(Thompson，1990：264)指出的那样，分析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必须充分注意"大众传播媒体"(mass media)的性质和影响在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作用。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文化产品的传播范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从而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文化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体。

数百年来英语和它所承载的文化伴随着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传播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影响乃至左右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今天，以英语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体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英语和语言文化"霸权"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明显；英语新闻主导着世界舆论，每天都在影响甚至操纵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受各种政治集团和权力集团的利益驱动。许多英语新闻语篇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对读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语言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话语的"殖民"和"霸权"倾向(Fairclough，1992；Kress，1985/1986)早就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许多语言学家从70年代末就开始呼吁对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批评性分析，即分析其语言表达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

7.1 新闻报道的选择性

以往，对新闻语篇的分析和对一般的话语的分析一样深受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影响，分析者通常只关注语言事实的客观描写、注重语言和语言运用中的"什么"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对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来回答语言运用中的一些"为什么"的问题。目前批评语言学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语言的形式取决于其社会功能，结构的不同既反映意识形态的差异又反过来帮助维持和/或强化这种差异，而这一切都可以从社会的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得到解释。新闻报道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新闻语篇是这种实践的产物，它们跟任何其他类型的语篇一样包含或反映着其生成者的立场和观点，因而不可能绝对不偏不倚地反映客观事实和社会现实，而是参与伯杰(Berger)和卢卡曼(Luckmann)所说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西方政府和传播媒体总试图向世人灌输这样一种信念，即西方社会的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新闻报道总是客观公正的。其实，任何新闻报道都不可能反映所有人的观点或者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像任何语篇一样，新闻也是通过语言来表述世界的。由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可避免地会把所表述的内容置于某种信念或价值观框架之内。新闻报道有很强的选择性。什么事件被当作新闻来报道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内在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一整套人为的选择标准，正如格伊斯(Geis)指出的那样，"也许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权力是它能够说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并决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的声音"。(1987：10)因此，如果说某个事件具有"新闻价值"(newsworthiness)那只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些已经规约化了的筛选程序而被选中作为消息来报道。显然，这种选择程序决定了新闻语篇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客观现实的完整图像。高尔登(Galtung)和鲁杰(Ruge)提出了一组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被人们广泛认可：

(F_1) frequency	(F_7) continuity
(F_2) threshold	(F_8) composition
(F_3) unambiguity	(F_9) reference to elite nations
(F_4) meaningfulness	(F_{10}) reference to elite people
(F_5) consonance	(F_{11}) reference to persons
(F_6) unexpectedness	(F_{12}) reference to something negative

这些标准中的一部分需要做一些解释。(F_1)是指事件持续的时间符合新闻媒体的出版发行频率；例如报纸通常每日出版发行一次，因此一个孤立的事件就比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过程更容易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F_2)是指事件需要达到的规模或程度；例如，20辆汽车追尾通常要比两辆汽车相撞更具新闻价值。(F_4)包括两个方面：文化近似性(cultural proximity)和相关性(relevance)。前者如在英国关于法国的新闻远远多于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新闻。相关性可以优先于文化近似性，例如，虽然亚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离英国很远，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英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场危机当时很可能向全球扩散，从而影响英国的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F_5)也包括两个方面：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和需求(demand)，它们指人们预料要发生或者希望发生的那些事件。根据(F_6)，越是预料不到的事件越具有新闻价值。(F_7)是指某个事件一旦成为新闻，尽管其新闻价值会不断降低，它的新闻地位会持续一段时间。(F_8)是指一份报纸或者电视新闻简报的内容组合或安排，一条消息的新闻价值的高低取决于编辑者手头掌握的其他可用消息的价值。

从上面的八条标准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所谓的"新闻价值"是如何地依赖于各种社会因素和人们的价值观，而这种依赖性在最后的四个标准上体现得更明显。事实上，高尔登和鲁杰强调，(F_9)至(F_{12})是"影响事件成为新闻的文化依赖性因素"。(F_9)中所谓的"elite nations"通常指北美、西欧、日本、俄罗斯等这样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事物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F_{10})是指媒体对社会名流和权力集团的偏爱和关注。这种偏爱和关注尤其体现在消息来源上。怀特克(Whitaker，1981：31—32)提供了下列英国的新闻报道

通常的消息来源：

1. Sources monitored routinely
    a. Parliament
    b. Councils
    c. Police (and the Army in Northern Ireland)
    d. Other emergency services
    e. Courts (including inquests and tribunals)
    f. Royalty
    g. "Diary" events (e.g. annual events like Ascot or conferences known about in advance)
    h. Airports
    i. Other news media
2. Organizations issuing statements and holding press conferences
    a.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 Local authority departments
    c. Public services (transport authorities, electricity boards, etc.)
    d. Companies
    e. Trade unions
    f.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pressure groups, charities, etc.)
    g. Political parties
    h. Army, Navy, Air Force
3. Individuals making statements, seeking publicity, etc.
    a. Prominent people (e.g. bishops and film stars)
    b. Members of the public.

显而易见，这些消息来源都是有权有势的机构和个人，他们与媒体之间往往存在一种互动和依存关系，即由于他们有权有势媒体总是希望接近他们、获得和报道他们的话语，而另一方面在需要时他们又总能通过媒体来公开或推广自己的思想感情。久而久之，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和权力机构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就会跟他们的话语一起变成媒体的惯例性和常识性的东西而被不知不觉地向全社会传播渗透。因此，福勒(1991)指出"如果批评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新闻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那么研究这种语篇与新闻记者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就是极其重要的"。(F_{11})也叫"人格化"(personalization)，是指把某个(些)人看作某些品质或事物的象征或者典型代表。这种做法能够直接激发受话人的某些情感，如认同感、同情心、厌恶等等。许多专家指出了媒体中的人格化倾向的危险性，因为过分地将个人作

为某些事物的象征常常只是为了回避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和解释，例如扔石头的骚乱者被频频曝光，而导致骚乱的失业问题或者社会保障的缺乏却很少引起注意。

7.2 英语新闻语篇的制作

某个事件被选作消息之后到发表之前还需要进入一个形成文字的"转换"(transformation)生成过程："电视和报刊上的'消息'并不是不解自明的。消息与其说是被'发现'或者被收集的不如说是被制作的。它是一种新闻报道程序的创造物，是一种人工制品，甚至是一种商品。"(Philo，引自 Fowler，1991：13)菲罗(Philo)在这里显然强调了新闻是人工制作的观点，这也使我们想到了科恩(Cohen)和扬格(Young)合著的一本书《新闻的制造》(*The Manufacture of News*)。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等的大众传播媒体构成一个国家的乃至世界的经济中一个地位非常确定的行业或者一种生意，因而其活动和产出在相当程度上要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利润、经营组织、与其他行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的关系、新闻业的规约、生产日程安排、劳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工商结构和关系必定会对新闻语篇和新闻报道产生影响。即使抛开上述因素，单从记者和编辑的角度看，新闻的客观公正性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格伊斯在讨论新闻语篇是否能够消除偏见时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要为某件事提供不偏不倚的报道，他就必须对事件没有先入之见，即他必须对有关事件近乎一无所知。然而，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一无所知，要想做出有效的报道是困难的。他将不知道报道的重点是什么，该去采访谁等。"(1987：15)可见，新闻报道中的"偏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可能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道，《太阳报》(*The Sun*)对工会组织始终抱有成见，而《泰晤士报》(*The Times*)采取的通常是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新闻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被理解和加工过的世界。

每一种体裁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意义潜势，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

主体位置、阅读位置、修辞方式、使用规则和惯例等；它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和机构的意识形态。那么新闻英语这种体裁的意义潜势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其意义潜势？它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存在着怎样的相互作用？这些都是对英语新闻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时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并不一定全部是发话人有意识要表达的，相当一部分源于语篇体裁或语篇类型的意义潜势，这种意识形态意义往往是由于说话人的文化背景、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社会阶层或地位、所从事的职业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所不由自主地或无意识地表达出来的。这也恰好反映了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塑造人的强大威力，而这种威力首先和主要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语言和语篇发挥作用的。

"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Bakhtin，引自 Kristeva，1986：37）克丽丝蒂娃（Kristeva）把语篇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是新闻语篇的突出特征。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来源未加任何说明的他人的话语（van Dijk，1988：128；Bell，1991：63)，很少有完全由记者本人话语写成的新闻语篇。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特克提供的英国新闻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他们主要是一些有权势的社会机构和个人，而范戴克（1988：128）则从互文性的角度把荷兰主要报纸的消息来源分为 12 类，它们代表的主要是不同的体裁：

1. Dispatches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ies.
2. Press releases of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firms, etc.
3. Press conferences, including invitations for them.
4. Agendas and materials of a large number of legislative bodies, committees, and organizations.
5. Reports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6. Interview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organizations.
7. Phone call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organizations.
8. Notes of interviews, phone calls, press conferences, etc.
9. Official letters of organizations (often to other organizations), sometimes accompanied by documentation.

10. Articles in a variety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newspapers.
11.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of own newspaper (clippings).
12. Printed versions of speeches, interventions in meetings, and debates.

新闻记者和编辑往往只是把来自这些渠道的语篇中的某些话语原封不动地拿来，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语篇。这些他人的话语或者"抄袭"来自各种渠道或信息来源，往往具有不同的体裁或文体特征、体现不同的意义潜势、代表着不同人或群体（通常是有权者）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例如，下面是贝尔(Bell，1991)编写的一条消息：

(1) A tiny mite has arrived in New Zealand to lead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untry's most costly weed, gorse.

(2) A consignment of several hundred gorse spider mites was flown into Christchurch by the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3) The mites were imported in sealed containers from the CABI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Control at Ascot near London.

(4) They were taken to DSIR's maximum quarantine facility at Lincoln and will be released for multiplication in August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spring.

(5) The mites are a brickred colour and measure less than a millimetre. They live in colonies of thousands inside webs spun on to gorse branches and feed heavily on the plant.

(6) The importation follows issue of a permit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7) DSIR Entomology Division director John Longworth said introduction of the mite culminates a decade of research,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8) "Because releasing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is an irreversible step, the impacts, costs and benefits have been carefully assessed over several years", he said.

(9) Detailed tests carried out in England since 1980 had shown the mite would establish only on gorse and not damage other native or economically important plants in New Zealand.

(10) A 350-pag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irculated last November concluded there were no compelling economic 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to prevent introduction.

(*The Daily News*, New Plymouth, 4 August 1988. Cited in Bell, 1991: 63)

他事后在分析该语篇时发现它包括了来自下列渠道的语篇的文字

内容：

a. Notes from a brief preliminary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of scientists who had been research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ite. The interview largely pointed him to other sources he should interview and to written sources, and updated developments since the last of the documentary sources had appeared.
b. Notes from a later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the same group leader.
c. The 350-pag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on the effects of introducing the gorse mite. This is itself a highly composite document, drawing heavily on earlier reports. In particular the EIA stresses that three previous impact assessment documents should be consulted before reading this EIA and it embeds these as appendices.
d. Draft press release written by the principal scientist involved.
e. Cover letter from this scientist accompanying the press release.
f. Copy of a press release (and published clips) issued the previous year at an earlier stage of the assessment.
g. Notes from his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the scientist (and follow-up questions in subsequent phone calls).
h. Amendments to his draft story made by both scientist and group leader.

贝尔语篇中各段落与上述各种语篇的对应关系是：1. f, g; 2. g; 3. b, g, h; 4. b, d, e, g; 5. b, d, g, h; 6. a, b, d, g; 7. b, e, f; 8. c, d; 9. c, f; 10. a, f, h。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对新闻语篇中互文关系的分析往往可以深刻揭示其中隐含的各种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

7.3 英语新闻语篇的分析方法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重点在于实践。虽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讨论批评语言学的方法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当英语师生面对一个具体的新闻语篇时，恐怕还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另外，由于批评者自身世界观或思想情感的局限性，对语篇所进行的批评性分析的结果也难免会带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倾向。因而，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乃至整个批评语言学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就是寻找或设计出一套相对客观的、简单实用的分析方法并列出英语中可能含有或用于表达某些意识形态意义的结构、转换和组合，以供人们在分析或阅读英语新闻语篇时参考。一些批评语言学家，如福勒(1979)和费尔克劳(1992)等，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讨，但还远远不够。他们关于英语的分析清单或者零乱缺乏系统性或者太抽象难以具体操作。我们认为，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一种新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清单应该主要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上，尤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和转换生成语法。

在对英语新闻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时除了参照前面第五和第六章中已经提到的一些总的原则和方法之外，最常用的具体方法是对比分析，例如(1)对比英语新闻语篇中某些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的表义功能；(2)对比不同英语新闻机构在同一时间关于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以对比他们在同一事件上立场观点的细微差异；(3)分析某一特定新闻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同一重大事件的连续报道，以比较其立场观点是否发生任何变化，并寻找可能的变化原因。我们还可以结合新闻英语教学，做一些调查研究，例如通过访谈、问卷、改写语篇、复述语篇和阅读对比练习等来考察英语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学生对英语新闻语篇中某些结构和表达方式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敏感程度并有针对性地探讨提高他们批评性阅读和分析英语新闻语篇的能力的有效途径。

以上我们简要概述了新闻英语批评性分析的一些总的原则和方法。批评性语篇分析体现的是一种综合能力。对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要求扎实的英语基础、敏锐的洞察力和耐心细致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它要求分析者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尤其是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的知识并对各种社会过程具有深刻的理解。具备了这些，再加上适当的方法，就能够对英语新闻语篇做出比较有意义的批评性分析。在这一章剩下的部分和下一章里我们将通过对几个英语新闻语篇的对比分析来例示批评语言学和新闻语篇批评性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7.4 两篇英语新闻的对比分析

7.4.1 语料

1994年2月25日，一犹太移民持枪闯入希伯伦清真寺，当场开枪打死29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礼拜者。当时本应该在清真寺外值勤因而有可能阻止惨案发生的以色列治安警察不知何故未按时上岗，因此人们对事件的真相议论纷纷。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以色列政府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此案。3月10日一位负责该地区治安的以色列官员 Meir Tayar 在向委员会作证时透露，即使他本人当时在现场也难以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因为上边有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向犹太移民开枪。消息传开，舆论哗然。下面的这两个语篇便是对这一消息的报道，它们分别取自英国的《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以下简称"论坛报")在同一天(1994年3月11日)对希伯伦(Hebron)惨案的报道：

Hebron massacre inquiry shocked
By disclosure of army instructions
Israeli troops "under orders" not to shoot Jewish settlers

SARAH HELM
In Jerusalem

ISRAELI troops are under strict orders never to shoot at Jewish settler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even if they are killing Arabs, it emerged yesterday. Although it had been widely suspected that Israeli soldiers were under orders to be lenient with often-truculent settle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rules of engagement have been spelt out in public.

The orders were described by Chief Superintendent Meir Tayar, Hebron head of the Border police, a paramilitary force attached to the Defence Ministry, in testimony before the judi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25 February Hebron mosque massacre. It means that troops would not have been permit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o have opened fire on Baruch Goldstein while he was firing into crowds of Muslim worshippers.

The testimony stunned the five-member commission, and appeared to

throw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in Israel into confusion. At first, some doubt was thrown on the witness' testimony, but later evidence only appeared to confirm it.

Yitzhak Rabin,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and Defence Minister, who travels to Washington next week to seek US help to re-start the peace negotiations, refused to comment last night. But the testimony is certain to put Mr. Rabin under new pressure to uproot settlements, and raises highly damaging questions about Israeli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ssacre, and about legal immunities granted to Jewish settlers.

Palestinian leaders and some liberal Israeli commentators last night said that the testimony should not have come as a surprise, in the wake of mounting evidence that the Israeli army has repeatedly failed to act against violent Jewish settlers who attacked Palestinians, while opening fire on unarmed Palestinian stone-throwers.

"This only proves what we have always said — that there are double values on human life — settlers, literally, can get away with murder and are not accountable. People, as so often, do not believe us until it is too late," said Hanan Ashrawi, former spokeswoman for the Palestinian peace delegation.

While the testimony was being heard, tension again mounted in Hebron as Palestinians protested and threw stones outside Beit Hadassah, one of the most militant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centre of the town.

The evidence came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which has already been told of major security lapses on the night of the massacre by Israeli forces assigned to guard 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

Chief Superintendent Meir Tayar disclosed the existence of the order after first describing how guards assigned to the mosque were late arriving on duty. He said h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prevent the massacre even if he had been present because of special open-fire rules in relation to Jewish settlers.

Pressed by the judges he sai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can he [a settler] be fired upon." He added: "Our orders are to take cover, wait until the clip is empty or the gun jams and then overpower him."

Chief Superintendent Tayar then stated that the order had been issued by senior army officers following controversy last year over television pictures showing Jewish settlers in Hebron shooting at Palestinians.

He named a battalion commander, Meir Khalifi, as the man who gave the instructions, saying the orders were oral, not written.

Judge Abdel-Rahman Zuabi, the only Israeli-Arab member of the panel, asked: "You mean if a settler fires at worshippers and you see him, you are not allowed to shoot him even in the leg?"

Chief Superintendent Tayar said that was how he interpreted the instructions. Asked what he thought of the policy, he said: "Perhaps it is an illegal order. I am not a lawyer."

Later, Major-General Shaul Mofaz, the army commander in the West Bank, said that if he had seen a Jew killing Arabs in the mosque he would have shot him. However, he did not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roversial order, saying he understood the principle behind it to mean: "We do not shoot Jews. They are not the enemy."

Israelis Had No-Shoot Order on Settlers

By David Hoffman
New York Times Service

JERUSALEM — The Israeli Army had strict standing orders not to shoot at armed Jewish settlers even if they were firing at Palestinians, a senior commander in the paramilitary Border police disclosed Thursday to the commission investigating the Hebron massacre.

Meir Tayar,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he Border Police force in Hebron, surprised the five-member panel when he said that there were special "open-fire" rules concerning settlers. The panel is investigating the Feb. 25 massacre in which a militant settler, Baruch Goldstein, killed at least 30 Muslims at 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 in Hebron.

Mr. Tayar's testimony seemed to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that armed, militant Jewish settlers had been permitted free rein. The testimony may further undercut the army's claim that the massacre was the work of an isolated lunatic and could not have been prevented.

"The order was that if a Jewish settler shoots his gun, even in the street ... toward locals, to the extent it was directed fire, not warning shots in the air, it was forbidden to shoot him," Mr. Tayar said.

"You take cover and wait for the clip to finish," he added, "then stop him in some other way, not by shooting."

According to Mr. Tayar, the orders not to fire at settlers were given in December after Israel television broadcasted a report in which settlers opened fire in Hebron at Palestinians, and the army did nothing to stop them. A soldier was seen running away while the settler discharged his machine gun.

Mr. Tayar said the orders, which were not written, were issued by Meir Khalifi, the local army battalion commander. When operating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the Border Police followed army orders. The orders were "first of all, to hide oneself so as not to be hurt," and then to

try and overpower the settler.

It is not clear if the orders would have changed the situation on Feb. 25 since the slaughter was over by the time the police and soldiers got to the scene. But the disclosure of the special orders immediately set off criticism. Members of the inquiry grilled Mr. Tayar about the open-fire rules. Chief Justice Meir Shamgar, head of the panel, questioned whether the procedure was logical.

"Not so much," Mr. Tayar said. "I was not 100 percent comfortable with it."

Later, Shaul Mofaz, a senior commander of army forces in the West Bank,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e order, but said it was issued in the context of "riots".

"The Jews are not an enemy in the context of riots," he told the panel.

He said the procedure was to disarm a Jewish settler who opened fire but not to shoot him. However, Mr. Mofaz said that had he been at 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 "I assume I would have shot Dr. Goldstein."

Hagai Meirom, a Labor member of parliament, criticized the separate orders for Jewish settlers.

"Security instructions are security instructions for everybody," he said. "The horrible possibility that a Jewish settler would shoot at a soldier and a soldier would look for a way to grab his magazine is a farce, it's baseless and I hope that clear orders will be given, so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anyone who opens fire, anyone who threatens with a weapon is like anyone else — he's a terrorist."

Ori Orr, a Labor Party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a reserve general, said of the order, "If such a thing was said, it is stupid and improper. It is the duty of whoever is in charge of law and order to act against anyone shooting, Jew or Arab."

The com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told that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the security establishment had never prepar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Jewish terrorism, and that all the rules were aimed at preventing Arab attacks on Jews.

Dr. Goldstein was not stopped by Israeli Army officers — they apparently did not suspect anything — when he walked into 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 carrying a sub-machine gun, up to seven clips of 32 bullets each, and special ear protectors to protect against noise.

我们将着重分析"分类"、"情态"和"转换"。分析表明,虽然表面上两篇报道都力求客观、不偏不倚(考虑到"命令"的性质和它已经或

可能造成的后果，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貌似客观中立的报道本身就是对以色列方面的偏袒），但仔细考察它们的语言就会发现两者对事件及其牵涉的各方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截然不同。我们首先从它们的分类体系开始。

7.4.2 分类

分类是指通过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它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手段。语篇的分类体系往往最能反映说话人的世界观，因而也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认真考察语篇中对主要过程和核心人物的描述会帮助我们清楚了解说话人对相关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下面是这两个语篇在描述犹太移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方命令时所用的词语：

图 1

	独立报	论坛报
Jewish settlers	often truculent, violent	armed, militant
Palestinians	Muslim worshippers, Unarmed stone-throwers	
the order	strict, special, oral, not written, controversial, legal immunities (granted to the settlers), policy	strict, standing, special, not written, separate, procedure

独立报将犹太移民描绘为"truculent"和"violent"，而论坛报则把他们说成是"armed"和"militant"。从《朗曼当代英语词典》和《牛津高级英语词典》对这些词的释义来看，truculent 和 violent 有好斗、残忍、寻衅等意思，而 armed 和 militant 均为中性词，后者既可用于褒义又可用于贬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语篇中 militant 一词是用来形容凶手 Baruch Goldstein 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说话人对枪杀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暴行究竟是在表示赞许抑或谴责。论坛报对巴勒斯坦人无任何评价，但独立报称他们为"穆斯林礼拜者"和"不带武器的投掷石块者"。前者令读者产生善良虔诚、热爱和平的联想，后者使人

感到，面对全副武装的、“经常残忍好斗的”犹太移民和偏袒不公的以色列警察和士兵，投掷石块不能不说是自卫的克制之举了。

两篇报道对巴以双方所持态度的不同，也反映在对以色列军方命令的描述上。例如，独立报称之为“政策”（policy），而论坛报称之为“程序”（procedure）。两者的区别在于，政策一般由政府、政党或组织制定，有鲜明的目的性。独立报使用这个词分明是把这一不道德命令的责任归于以色列军队和政府。“程序”一词的含义则完全不同，它指任何事情进行的次序或方式。这种次序可以是自然的、传统的，也可以是人为临时规定的。因此该词的使用无疑有助于淡化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减轻或开脱以色列军队和政府的责任。

7.4.3 转换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转换”。在分析语篇中句法转换的表义作用时，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的运用。名物化指的是说话人原本可以使用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但却选择了名词性成分。名物化的例子在这两个语篇中都很常见。例如：

独立报：open-fire rules, legal immunities granted to Jewish settlers, highly damaging questions about Israeli resposibility for the massacre, etc.

论坛报：no-shoot order, the open-fire rules, the disclosure of the special orders, the work of an isolated lunatic, etc.

从修辞的角度看，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替代动词结构或句子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名物化就是使动作或过程“物化”（objectification），它通过删除情态成分、模糊时间概念和掩盖参加者等创造一种“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效果。本文的两个语篇在这方面有相似之处。

选择被动语态的动机多种多样（Huddleston，1984），其中之一是为了隐瞒动作的发出者，即“施事”（agent）。被动化的例子在这两个语篇中俯拾即是，请看下表（施事一栏只包括文章中明确表达出来

的那些)：

图 2　独立报：

Agent	Process/Action	the Affected
(1)	been suspected	that-clause
(2)	have been spelt out	rules of engagement
(3) Meir Tayar	were described	the orders
(4)	would not have been permitted	troops
(5)	was thrown	some doubt
(6)	granted	legal immunities
(7)	was being heard	the testimony
(8) Israeli forces	has been told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9)	assigned	Israeli forces
(10)	assigned	guards
(11) the judges	pressed	Meir Tayar
(12)	can be fired upon	he (a Jewish settler)
(13) senior army officers	had been issued	the order
(14)	are not allowed	you (Israeli soldiers in general)
(15)	asked	Meir Tayar

图 3　论坛报：

Agent	Process/Action	the Affected
(1)	had been permitted	militant Jewish settlers
(2)	could not have been prevented	the massacre
(3)	were given	the orders

（续表）

Agent	Process/Action	the Affected
(4)	was seen	a soldier running away
(5) Meir Khalifi	were issued	the orders
(6)	was issued	the order
(7)	will be given	clear orders
(8)	was said	such a thing (the order)
(9)	has been told	that-clause
(10)	were aimed	all the rules
(11) Israeli army officers	was not stopped	Dr. Goldstein

总的来看，两篇报道使用被动结构的数量相差无几。但应该指出的是，论坛报省略的 9 个表达施事的短语中有 8 个是指以色列一方，而独立报省略的 12 个中只有 6 个指的是以色列一方。这说明前者比后者更加倾向于回避提及作为施事的以方。

7.4.4 情态

我们对情态的考察着重于时态和转述引语形式的选择。首先是时态。虽然两个语篇都使用了多种"时态"(tense)和"体"(aspect)，但在现在时和过去时的选择上两者存在明显不同。在论坛报中现在时只用了一次(It is not clear ...)，但在独立报中却多达 9 次，其中一般现在时 6 次：

1. Israeli troops are under strict orders never to shoot at Jewish settlers ...
2. ... even if they (the Jewish settlers) are killing Arabs, ...
3. ...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rules of engagement have been spelt out in public.
4. ... rules of engagement have been spelt out in public.
5. It means that troops would not have been permit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o have opened fire on Baruch Goldstein ...

6. ... the testimony is certain to put Mr. Rabin under new pressure ...
7. ... (the testimony) raises highly damaging questions about Israeli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ssacre, ...
8. ... the Israeli army has repeatedly failed to act against violent Jewish settlers
9. (continued from 8) who attack Palestinians.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上述使用现在时的句子串联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篇，它恰好表达了原文的核心内容。在这些句子中，作者把以色列政府和军队在巴勒斯坦人和犹太移民的冲突中一贯采取的歧视前者偏袒后者的立场和态度暴露得淋漓尽致，并且一步步将希伯伦惨案的责任明白无误地归于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报道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般现在时的巧妙运用。这一时态在英语里有独特的功能，除了表示现在时间之外它更经常地被用于表达普遍性真理、始终存在的状态、习惯性或连续性的行为等。因此在报道者看来，希伯伦惨案绝非像以色列军方宣称的那样只是一次孤立的偶发事件(见*论坛报*)，而是他们长期姑息纵容犹太移民中的好斗分子所酿成的恶果。

直接引语在新闻报道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它们往往出自当事人、知情者或者权威人士之口，所以对读者有很强的说服力。报道者常常利用直接引语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把它们间接地强加于读者。独立报和论坛报都充分利用了直接引语的这种作用。如果不考虑 Meir Tayar 的证词，我们会发现独立报中的直接引语全部出自阿拉伯人之口(Hanan Ashrawi 和 Abdel-Rahman Zuabi 法官)，而论坛报中的直接引语则全部引自以色列人，其中包括一位以色列军官(Mr. Mofaz)和两位议员(Hagai Meirom 和 Ori Orr)。这不能不令人认为，两家报纸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采取了不同的角度。独立报中 Ashrawi 的话代表了巴勒斯坦和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及其同情者的观点，认为一贯采取双重标准和不公正立场的以色列政府和军队，应该对此次事件负主要责任。然而论坛报中议员们的话，实际上是在为政府开脱责任。他们就事论事，一味指责军队个别官员，似乎政府毫无过失。这不能不令读者怀疑他们是否在寻找替罪羊。此外，他们在话语中使用像“the horrible

possibility"，"if such a thing was said"这样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在向读者暗示证词未必可信，这或许也正是报道者的观点。

除了以上分析的几个方面之外，两家报纸在报道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独立报用了更大的篇幅来描述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even if they (the settlers) are *killing* Arabs	(1) even if they (the settlers) were *firing* at Palestinians
(2) while he (Baruch Goldstein) was *firing* into crowds of Muslim worshippers	(2) a militant settler *killed* at least 30 Muslims
(3) violent Jewish settlers who *attacked* Palestinians	(3) settlers *opened fire* in Hebron at Palestinians
(4) while (the Israeli army) *opening fire* on unarmed Palestinian stone-throwers	(4) a Jewish settler who *opened fire*
(5) Jewish settlers in Hebron *shooting* at Palestinians	
(6) if he (Major-General Shaul Mofaz) had seen a Jew *killing* Arabs	

7.5　结语

上面我们通过对两篇新闻报道的分析，表明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语言运用，语言又如何被用来传播强化特定的意识形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语言运用中，说话人总是故意利用各种表达方式来歪曲事实，欺骗受话人，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事实上，虽然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时必须借助的头脑中储存的图式知识无不带有阶级的烙印，但图式知识的这种社会属性或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大多已通过自然化过程变成了非意识形态的常识。(Faiclough，1989)在通常情况下，说话人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中会包含某种意识形态意义，读者对此往往也浑然不觉。这也正是意识形态的效力所在，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它、强化它。费尔克劳(1989：92)指出："意识形态通过伪装自己的性质，装扮成另一种东西

发挥作用”，“其作用方式最隐蔽时才最有效”。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话语或语篇中的这种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的关系。当然这不是说语言形式或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什么稳定的对应关系。某一语言结构孤立来看或许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出现于特定的语境中，与其他结构相联系，便可能产生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总而言之，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取决于语言形式或语篇结构出现的上下文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批评性语篇分析必须将语篇及其描述的事情与它们出现的社会生活场景相联系。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

第八章
英语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样说这些话的。"新闻的这条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件事如此是因为某个人说它如此'。"(Fishman,1980:92)新闻语篇大量引用别人的话,主要目的在于为报道增添真实感,显示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确信报道者并未掺杂个人的观点。但是,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说的,绝对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本章拟分析两篇新闻报道,考察其中转述引语的语用功能以及报道者如何运用它们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8.1 转述引语及其分析方法

在转述引语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方法(Baynham,1996:62—65),即传统的(traditional)和语篇语用的(discourse-pragmatic)。传统方法纯粹从句法学的角度观察言语的引述,着眼于直接引语向间接引语转化时句子结构和语法形式(例如代词、时态等)上的变化。请比较:

(1) He said, "We'll come back here to finish the work tomorrow."

这个句子中的直接引语可以转化为下面的间接引语:

(2) He said that they would go back there to finish the work the following day.

上述转化过程主要涉及下列变化:

a. 去掉直接引语的引号;

b. 使用"that"引导间接引语;

c. 把直接引语中的代词“we”替换成间接引语中的代词“they”；
d. 把动词的时态将来式改为过去将来式；
e. 把(1)中的“tomorrow”改为(2)中的“the following day”；
f. 直接引语中的动词“come”变为间接引语中的“go”；
g. 直接引语中的副词“here”变为间接引语中的“there”。

这一切变化的宗旨就是消除被转述引语的主要情景特征，使之符合转述引语的情景特征。莱昂斯(Lyons，1968：174)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转述引语的传统观点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这样说的：

> Take for instance a passage such as the following: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he deeply regretted the incident. He would do everything he could to ensure that it did not happen again. On the following day he would confer with his colleagues. He was confident that ... ." Once again, passages of this kind are best accounted for in two stages: first of all, by describing a set of independent sentences in their "direct" form (I deeply regret ...;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 Tomorrow I will confer ...; I am confident that ...) and then, by specifying the secondary grammatical rules which will transpose each of these sentences onto the corresponding "indirect" form when they occur in sequence after a "verb of saying".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似乎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库尔马斯(Coulmas，1985)、班菲尔德(Banfield，1982)、贝因汉姆(Baynham，1996)和许多其他学者都曾指出过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传统观点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直接引语中包含的下列成分就很难被转换成间接引语：

a. 表情成分(expressive elements)，例如感叹词、咒语等等；
b. 称呼语(terms of address)；
c. 语调(intonation)；
d. 句子的语气(sentence moods)，例如祈使语气、疑问语气等；
e. 省略句(elliptical sentences)；
f. 一些组织话语的信号(discourse organizing signals)，例如起始语(starters)、停顿填充语(pause fillers)、表示犹豫不决的一些词语、一些常规的表示话轮变换的成分、口头禅等等。

这些语言成分不容易被转换成间接引语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们与被转述引语原来的语境密不可分并依赖于原来说话人的观点。其次，在间接引语中它们会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例如像"He said that hello/ouch/good luck/ ..."这样的"句子"在英语中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英语的语法规则"that"是一个从属连词，后面必须跟一个从句。最后，这些成分中有一些并不真正属于原来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义的一部分，例如(f)中的那些成分便是如此。

在对传统的方法提出批评的同时，这些学者强调从真正交际的角度研究转述引语。斯珀伯尔(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在《关联》(*Relevance*)一书中把语言运用区分为"描写的"(descriptive)和"解释的"(interpretive)。他们认为任何话语或者语句都能以两种方式表述事物。首先，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命题直接表述某一事态；其次它也可以通过转述他人的话语来间接表述某一事态。他们把前者叫做描写或者描写性的表述，把后者叫做(对他人话语的)解释或者解释性的表述。语言的描写性用法涉及的是命题和事件或事态的关系，即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命题的真实性依赖于事态本身的真实性。语言的解释性用法涉及的是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指的是用一句(些)话来表述另一句(些)话，双方或者在形式结构上或者在命题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请看下面的例子：

(3) A：What did Harry say?
　　B：Saddam Hussein is never going to stand down.

假设 Harry 的原话是(4)、(5)或者(6)：

(4) Saddam Hussein will never stand down.
(5) He will never stand down.
(6) Saddam Hussein? He'll never resign.

那么，(3)中 B 的话就是对 Harry 的话的表述，因为两者在内容或/和形式上具有相似性。用斯珀伯尔和威尔逊的话说，B 的话语作为 Harry 的话语的表述具有相关性。用于表述他人话语的话语没有价

值，即其表达的命题不可能被判断为真或者假，因为它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事件或者状态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对它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话做出评价。有时候说话人自己就会表明这种忠实程度。例如：

(7) He is going to see the doctor tomorrow. *That's exactly what he said.*
(8) He is going to see the doctor tomorrow. *At least that's how I understand him.*

解释性话语的关联性不仅在于它转述他人的话语或思想，而且就像(7)和(8)表明的那样，它在转述的过程中还会带上说话者或者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或评价。斯珀伯尔和威尔逊(1986)在讨论"反讽"(irony)时把这类话语叫做"回应"(echoic)话语，指出要在反讽中识别出说话者的态度取决于"首先，要认识到话语是回应性的；其次，识别引起回应的观点的来源；第三，认识到说话者对回应的观点采取了抵制或者不赞成的态度。"(1986:240)斯珀伯尔和威尔逊关于"回应"话语的思想与巴赫金关于语篇对话性的理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较早地从社会语用的角度来系统研究转述引语的现代学者首先当推俄罗斯文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正处于上升阶段时，巴赫金就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详细讨论了转述引语和被转述引语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尖锐地批评了将转述引语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机械的纯粹语法模式："鄱思考夫斯基(Peskovski)犯了一个典型的语法家的错误。他那在风格上不做任何适当的调整而只是把转述引语从一种形式转写成另一种形式的机械的纯粹语法的做法，不过是一种不真实的非常令人生厌的制造课堂语法练习的方法。这样的对各种言语转述形式的实施与这些形式在语言中的真实存在一点关系也没有"。(Volosinov, 1973:128)巴赫金对直接和间接引语的讨论着眼于其语篇语用功能，特别强调引语与"转述语境"(reporting context)或"引述者话语"(reporting speech)之间动态的作用关系，将转述引语解释为"言语内的言语，话语内的话语，同时又是关于言语的言语和关于话语的话

语。"(同上:115)就是说,某句话被从它原来出现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另一语境中的话语的一部分,从而在同一句法结构中暗示不同时空概念的语境发生了相互作用。他指出,转述引语在说话者(即转述者)看来是属于他人的话语,在其原来的语境中是结构完整意义独立的话语。转述引语正是从这种独立的存在被移植入引述者的说话语境中并与此同时保留下自身原来的命题内容和基本的语言结构。这就是说,说话者在引用他人话语时一方面会把他人话语的语言结构、语言风格和谋篇布局上的常规惯例部分地吸纳入自己的话语或者语篇框架,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来话语的自主性。因此在研究话语转述时"我们处理的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1973:116)"在转述引语和转述语境之间高度复杂和紧张的动态关系在起着作用。不考虑这些关系,要想理解任何形式的转述引语都是不可能的。"(1973:119)

巴赫金关于转述引语的观点反映了他一贯坚持的语篇的对话性:"转述引语和转述语境只不过是一种动态关系的名称。这种动态反映了人们之间言语对话交际中的动态社会交互作用。"(1973:119)转述引语和转述语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动态有两个基本的运动方向。一方面,转述者尽可能清楚地标示出转述引语的边界,把它与自己的话语分开,从而保持原来话语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转述者可能以微妙的方式把自己的声音渗透到转述引语中去。在这后一种情况中,转述语境会想方设法打破转述引语严谨的独立性、瓦解它,抹去它的边界。当然,上述这两种倾向只是个程度问题。不管怎样,我们对言语转述的分析目的应该是考察转述引语和转述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voice)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在这一章剩下的部分里我们试图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借鉴巴赫金的理论方法分析对比两篇报道,考察它们对同一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我们的分析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消息来源、转述形式和转述

动词。

8.2 语料

"Critics Round on Netanyahu"和"Netanyahu Faces Crisis over Failed Hamas Hit"这两篇报道分别来自1997年10月6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下简称《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以下简称《论坛报》)。1997年9月25日，两名以色列特工人员持伪造的加拿大护照，在约旦首都安曼刺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的领导人Khaled Meshal未遂被捕。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对这一行径进行了谴责；加拿大政府指责以色列政府在幕后策划或者支持了这起暗杀行动，愤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侯赛因国王下令驱逐约旦境内的所有以色列特工人员，并要求以方释放哈马斯的创始人Sheikh Ahmad Yassin和其他被关押的哈马斯成员，来交换被逮捕的两名刺客。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的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介纷纷严厉批评政府虑事不周、做事不慎，招致了以色列特工史上最令人羞耻的惨败。这两个语篇报道的就是内塔尼亚胡总理及其政府所面临的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处境。全文如下：

Critics round on Netanyahu
Israeli Prime Minister under Fire over
Botched Assassination Attempt in Jordan

by Avi Machlis and Judy
Dempsey in Jerusalem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yesterday faced growing criticism over the recent botched attempt to assassinate an Islamist leader in Jordan, allegedly by Israeli agent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s remained silent on the issue, although it has become a major domestic crisis. Opposition members and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demanded to know why Israeli agents carried out an attack on

the territory of its closest Arab ally, Jordan.

Meanwhile Canada recalled its ambassador from Israel at the weekend in a row over the use of forged Canadian passports by two alleged Mossad agents detained in Jordan after the attack on Khaled Meshal, a Jordanian-based leader of Hamas,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Lloyd Axworthy, Canada's foreign minister, said Canada had evidence that Israel was behind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Mr. Netanyahu ordered the operation agains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security officials in retaliation for recent suicide bombings by Hamas. Some opposition members called on Mr. Netanyahu to resign, if charges of Israeli involvement in the affair were true. Others appealed to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Zeev Schiff, a leading commentator for the Israeli daily Ha'aretz, said the move "must go down as one of the worst operational failures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s intelligence services".

Mr. Schiff said the move dealt a blow to Israel's relations with Canada and Jordan. "In well ordered countries,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members resign over such things, not just the intelligence chiefs," wrote Mr. Schiff.

In one of the few statements issued yesterday by the government, it accused the media of "false charges" without addressing any of the allegations. In addition, the statement rebuffed charges that Mr. Netanyahu wa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King Hussein of Jordan, balancing Arab outrage and Israeli sensitivities, said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was "a reckless act ... carried out by a party with no faith in peace."

President Mubarak of Egypt yesterday attacked Mr. Netanyahu's policies. "There are real fears that the lack of confidence between all sides will continue because of lax, inadequate policies that lack any sense and are not forward looking," he said.

Meanwhile, Sheikh Ahmad Yassin, a Hamas founder released from Israeli custody last week, said he would return to Gaza today after being deported to Jordan. Mr. Yassin said he was willing to co-exist with Israeli Jews "in brotherhood and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on condition that they do not gobble up our rights".

The Hamas leader's statement of moderation sharply contrasted with recent Hamas policy. The movement has killed scores of Israelis in suicide bombings in recent years in an attempt to torpedo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making.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his remarks will be accepted by other Hamas leader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6, 1997)

Netanyahu Faces Crisis over Failed Hamas Hit

By Serge Schmemann
New York Times Service

JERUSALEM — After four days of holiday-enforced silence about charges that Israel had sent agents on a botched mission to kill a Hamas leader in Jordan, Israeli commentators loosed a fierce barrage of accusations against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on Sunday for a debacle that stood to seriously damage Israel on every political and security front.

The two suspected assailants were in custody in Jordan. The authorities said the two were detained by the Jordanian police after attacking the political leader of Hamas on an Amman street on Sept. 25 with a device that stunned him and injected a poison into him.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gents of Mossad, Israel's secret service.

Separately,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Sheikh Ahmad Yassin,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Hamas who was released by Israel last week in an apparent bid to appease a furious King Hussein, would return to the Gaza Strip on Monday. There were also reports that Israel was under pressure from Jordan to release more Hamas prisoners in exchange for the two men in custody.

These reports, wrote Yaacov Erez in a bitter article in Ma'ariv that was echoed in numerous editorials, commentaries and conversations, demonstrated the affair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iascoes ever linked to the Mossad in particular, and to Israel in general."

Zeev Schiff, a reporter for Ha'aretz, was among several voices insisting that if Mr. Netanyahu was responsible, he had to step down: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a failure of such magnitude and such strategic blindness be allowed to pass without those responsible resigning or being fired."

For now, Mr. Netanyahu has remained silent. But a statement issued after the cabinet's weekly meeting, while avoiding direct comment on the affair, sought indirectly to defend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and to defend Mr. Netanyahu against published charges that he had ordered the assassination over the objections of his security chiefs.

The statement described the target of the attack, Khaled Meshal, as "responsible for the murder of innocent Israeli civilians." It also followed Mr. Netanyahu's practice in his many crises of attacking the press.

"False charges are being published, thus cynically exploiting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at present, refraining from comment," it said.

In Jordan, King Hussein also continued to refrain from directly accusing Israel of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But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rabic daily Al-Hayat, the King assailed the attempt on Mr. Meshal as "an irresponsible act" by someone determined to undermine the process toward peace.

Making clear who he meant, King Hussein proceeded to lash Mr. Netanyahu with unusually blunt terms: "I am personally unable to reach a conclusion as to how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thinks," he said, "This makes me very worried."

Experts in Israeli strategic affairs also said they were stymied by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operation. "It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 an even greater disaster if they would've killed this guy," said Mark Helle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Jaffee Center, noting that an Israeli assassination in Jordan might have forced King Hussein to take more drastic ac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6, 1997)

众所周知,在政治新闻中,报道人们如何看待和评论某一事件往往要比报道事件本身更重要。这两个语篇便是如此,《时报》共引述别人的话语15次,《论坛报》14次(计算标准是每出现一个转述动词为一次),字数分别约占总篇幅的47%和57%。

8.3 消息来源

所谓消息来源(news source)是指报道者引述的话语的发出者。在英语新闻语篇中,报道者在引述别人的言论、观点或意见时,通常要交代它们的来历。交代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张健,1994:85—89):

(A) 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报道者有名有姓地交代引语的发出者。例如:

(9) **Editor Assunta Ng** says that before she founded the Chinese Post in 1982, immigrants "had to go to a billboard in Chinatown to find out what was going on."

(*The Chri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4, 1995)

(B) 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报道者不直接点明引语的发出者,而只是用一些不具体的词语来间接地加以暗示。例如:

(10) **City administrators** say they have tried and failed to resist such

practices ...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6, 1995)

(11) **Managers** freely admit that Thomas is only one of many people who get extra privileges or a favour when they ask for it.

(同上)

(C) 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报道者或者对消息来源并不清楚，或者觉得不重要或者故意隐瞒，却又要故做姿态，以显示其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因而使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惯用短语来交代引语的来源。例如下面这些转述他人话语的方式都属于这一类：

It is said ...
It is reported ...
Reports say ...
Rumors say ...
It is learned ...
It is understood ...
According to an anonymous source ...
Foreign wire services quoted/cited as saying ...

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讨论一下两个语篇中(B)和(C)两类消息来源。像(B)和(C)这样不点明消息来源的报道方式有时候会影响报道效果，例如当读者不知道一些话或者观点的确切来源时，他们常常无从判断其重要性和可信度。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报道者出于某种目的会故意隐瞒消息来源，埃德曼(Edelman，1977)把这种做法叫做"参照虚构群体"(reference to mythical groups)。门兹(Menz，1989：236)指出，要查证这样的消息来源是不可能的，参照虚构群体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宣传和强化报道者的观点。西方的绝大多数新闻机构对不明消息来源的使用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的《丹佛邮报》(*The Denver Post*)规定它的记者"只要可能必须点明每一篇报道的信息来源"，"例外情况必须跟编辑和报社的律师进行详尽的讨论。"(Anderson & Itule，1984：66)不过，做出这种严格规定，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而是为了保护新闻机构自己，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正如《底特律自由报》(*The Detroit Free Press*)编辑舍恩(Shine)坦承的："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一个信任的

问题，而是保护职员和报社避免一些可能的麻烦。消息来源必须在报道中点明，除非有压倒一切的理由不这样做。"（同上）非具体明确的消息来源在这两个语篇中各出现了4处：

《时报》	《论坛报》
Opposition members and ...	The authorities ...
Security officials ...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	There were also reports that ...
Some opposition members ...	Experts in Israeli strategic affairs ...
Others ...	

从分布看，总共8处的不确定消息来源中有7处在文中出现得较早，都在引述以色列政府的"声明"（statement）之前。就是说，两篇报道中对消息来源的交代均表现出从含糊不清到具体明确的倾向。这或许是因为它们开始提供的主要是有关事件的背景信息，读者对这类信息来源的模糊性一般具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不过，含蓄不露的和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容易导致的后果之一是，读者由于不了解引语的具体来源，无法判断其重要性和可信程度。

"也许新闻媒介最重要的权力是它能够说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并决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的声音。"（Geis，1987：10）与《论坛报》相比《时报》的背景消息主要来自以色列国内，其中包括反对党成员和安全部门的官员。报道者不具体明确地交代这些消息来源，是因为这些人对读者来说并非是十分重要的人物，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们所代表的党派和机构。另外，使用"opposition members and security officials、some opposition members、others"这些不定指短语，很容易给人一种"人数众多"的印象，使读者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国内遭到反对党和政府官员的普遍批评和反对。《论坛报》中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例如"there were reports that ...，there were also reports that ..."，具有类似的作用，只是它们没有像《时报》那样突出以色列内部的反应，而是涵盖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声音。

8.4 转述形式

转述形式尤其是“直接引语”(direct speech,DS)和“间接引语”(indirect speech,IS)之间的选择往往决定转述者话语和被转述引语之间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是清楚的或者模糊的。从语用的角度看，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具有相同的交际功能，即表明某些话语或思想是出自他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述者就所引用的话语向受话人做出的承诺：使用直接引语表示绝对忠实原文，引用的每个字都是原话；使用间接引语表示引用者只忠实原文的内容而不是原来的措辞。与间接引语相比，直接引语更具表达力，因为它能准确地保留原话的风格。间接引语受其形式的限制，常常无法保留原话的口语特征、习语和韵律特征。请比较：

(12) a. He said, "Well done! What an achievement!"
b. ' He said that well done and what an achievement.
c. He said that that had been done very well and was a real achievement.

(Volosinov, 1973: 128)

像(12a)中这样的原话在英语里难以间接转述，结果只能提供一种像(12c)那样的意义不甚严谨的释义。克拉克(Clark)和格里格(Gerrig)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使用直接引语会使表达更加生动和准确。他们把直接引语视为一种“展示”(demonstration)，把间接引语视为一种“描写”(description)。在克拉克和格里格看来，展示和描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交际方式，前者描绘的是“所指”(referent)，即展示的对象，而后者不是：“展示的作用是能够使他人体验所描绘的对象。”(Clark & Gerrig, 1990: 765)请比较下面的例子：

(13) She said, "well I'd like to buy that suit."
(14) She told him that she wanted to buy the suit.

(13)的说话者是在向受话人展示顾客“she”在向店员说这句话时实际上是怎样做的，而(14)则只是在描述顾客的行为和所说的话。

人们经常还区分另外两种转述形式：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FIS)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the 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NRSA）。自由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转述句"（reporting clause），在语义和语用上它往往混合了转述者和被转述者两种声音。利奇（Leech）和肖特（Short）指出，自由间接引语在真实性和忠实原文上很特别："它属于一种中间情况，即不宣称是原话的复制，同时又比间接引语更为忠实原文。"（1981：325）请将下面的（15）与前文的（2）比较：

（15） They would go back there to finish the work the following day.

虽然与（2）中的间接引语不同，（15）不包含任何转述句，但是两个例子中的动词时态和人称代词却是相同的。在间接引语中被转述的部分在语法结构上总是从属于作为主句的转述句，一旦把转述句删去，自由间接引语就好像直接引语一样获得了独立性。

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指的是只转述他人话语所实施的言语行为，转述者既不承诺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更不承诺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因而这种转述形式要比间接引语更为间接。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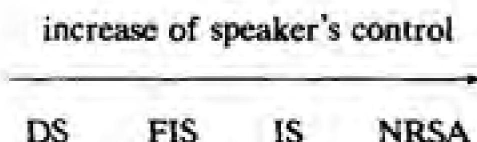
（16） She spoke of his trickery.
（17） He told her when he'd return.

（16）和（17）可以被看作下面（18）和（19）的叙述性撰述：

（18） "I know those tricks of yours!", she said.
（19） He said, "I'll be here tomorrow".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对言语转述的研究应该着重考察转述引语和转述语境或者转述者话语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往往体现在：（1） 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voice）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2） 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对引语的理解。参照这两点我们不难发现，选择不同的转述形式意味着转述者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介入他人的话语。在下面的图中，箭头所指的方向表示这种介入程度的增加：

图 1



图中显示，选择直接引语转述者的介入程度最低，而选择叙述性转述则介入程度最高。然而，应该强调的是，任何一种转述形式都可能为转述者提供介入他人话语的机会，直接引语也不例外。首先，这是因为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者可以选择引用谁的话语和什么内容的话语。其次，专家在定义直接引语和区分它与间接引语时总会指出直接引语是被引用者的原话，即它忠实于原文的措辞，而一般人也普遍想当然地认为真的是这样："根据获得普遍接受的观点，直接引语暗示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于被转述的话语而间接引语只转述其内容。"(Coulmas，1985：41)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克拉克和格里格(1990)指出发话人在引用他人话语时所承诺的只是描述原话的某些方面，这与完全按照字面引用是两回事。请比较：

(20) I — I've only been — we've only been to like. four of his lectures, right?

(Clark & Gerrig, 1990: 795)

这句话可以用下列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转述：

(21) a. Sidney says, "I — I've only been — we've only been to like. four of his I — five of his lectures, right?"
b. Sidney says, "We've only been to, like, five of his lectures, right?"
c. Sidney says, "We have only been to five of his lectures."

(21a)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逐字转述，(21b)显然经过了整理，形成了一个合乎英语语法的句子，而且是比(21b)更为正规的形式。人们在新闻媒体上见到的直接引语通常恰恰就是类似(21c)的形式。有时候所谓的直接引语根本就不是出自被引用者之口，而是由记者或者采访者代劳的。例如，假设一位记者正在采访一位不善言辞的人，他对记者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只用"是"和"不是"、"好"和"不好"、或者"行"和"不行"等来回答。采访者可能会非常欣赏如此简练的回

答，但是他的采访报道不能只由这类词语构成。于是他可能采用下面这样的方式：问："你认为这项工程浪费了我们纳税人太多的钱吗?"回答："是，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记者会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史密斯先生说'这项工程浪费了我们纳税人太多的钱。'"安德森(Anderson)和伊图尔(Itule，1984)指出，记者经常在转述引语中做一些小的变化，例如使之更合乎语法、删除不规范或者不雅的语言等等。克拉克和格里格(1990)也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直接引语通常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原话"。

与直接引语相比间接引语在更大程度上允许转述者介入他人的话语，因而间接引语往往是两种声音的混合交融。英语里有一些词，当把它们用于间接引语里时往往令人难以判断它们表达的到底是谁的声音。请看下面的例子：

(22) Harry said that he *really* didn't know who she was.
(23) She asked him whether he could *please* be quiet.

(22)和(23)中的"really"和"please"两个词表达的既可能是原说话者的声音也可能只是转述者的理解。当然，也许大多数受话人会倾向于支持第一种可能性。下面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24) My grandfather told me that his brother, *God damn him*, had ruined their business by hiring that idiot as the manager.

我们显然很难确定(24)中的"God damn him"究竟是"my grandfather"的原话还是由该说话者后加上的。

除了上述图中列出的转述形式，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还各有其他的变化形式，例如在新闻语篇中我们还经常发现下面这样的混合型：

(25) But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rabic daily Al-Hayat, the king assailed the attempt on Mr. Meshal as "an irresponsible act" by some one determined to undermine the process toward peace.

《论坛报》

(26) King Hussein of Jordan, balancing Arab outrage and Israeli sensitivities, said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was "a reckless act ... carried out by a party with no faith in peace."

《时报》

在(25)中，"assailed"之后采用的基本上是间接引语，只是中间有个别词语被加上了引号，表明为消息来源的原话。报道者这样做的原因或者是表示该部分特别重要、或者想与它保持距离、表示自己不一定赞成它所表达的意思。本文将把这样的转述形式视为间接引语。在例(26)中，报道者先采用间接引语的形式，然后"滑向"(slipping)直接引语，就好像间接引语是在为直接引语铺路，直接引语顺理成章地从间接引语中发展出来。沃洛西诺夫(1973:134)把这种引述方式叫做"预先调整的直接话语"(preset direct discourse，以下简称PDS)，它"实质上是半叙述半转述的，它预先调整了对直接引语的感知，即将出现的直接引语的主旨用语境预示，并用作者的语气去渲染。经过这样的处理，转述引语的界限变得极不清楚了。"前面例(9)已经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分析的这两个语篇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

(27) Mr. Yassin said he was willing to co-exist with Israeli Jews "in brotherhood and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on condition that they do not gobble up our rights".

《金融时报》

(28) The statement described the target of the attack, Khaled Meshal, as "responsible for the murder of innocent Israeli civilians."

《论坛报》

(29) Zeev Schiff, a reporter for Ha'aretz, was among several voices insisting that if Mr. Netanyahu was responsible, he had to step down: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a failure of such magnitude and such strategic blindness be allowed to pass without those responsible resigning or being fired."

《论坛报》

请注意，例(29)的直接引语并未具体说明谁应该负责，但间接引语却把矛头直接指向内塔尼亚胡。报道者显然是在用自己的声音引导读者对直接引语的理解。

自由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其实也是间接引语的变体，它们融合了转述者和被转述者的声音，从而受话人往往无法确定哪些形式和内容是原话哪些不是。例如：

(30) For example, Linderman says, her office hears criticism that EN-

ABL should be offered to 10-year-olds in communities with very high rates of teen pregnancy. *Other communities have complained that talking to 14-year-olds about sex is inappropriate*. "You really see differenc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she say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2, 1995)

(30)里使用斜体字的句子的动词用的是现在式，表明它很可能出自 Linderman 之口，尤其是它位于点明是由 Linderman 说的两句话之间。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肯定事情就是这样。再看一个例子：

(31) Even when safety is not an issue, money is. According to D. C. Public Works Director Larry King, the city is spending $10,000 to $15,000 every week on overtime pay for garbage collectors. *It eventually would be cheaper to fix the trucks and hire enough workers to staff them*.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6, 1995)

(31)中最后的斜体字部分究竟仍然是 Larry King 说的话抑或是报道者做的评论？显然，在像上面这样的例子中转述者很容易做到在引用他人话语的同时掺入自己的观点而不被受话人察觉。至于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从前面的图中可以看出，它是转述者介入程度最高的一种转述形式，在这里被转述者的声音几乎完全消失，我们听到的只是转述者的声音。

我们至此讨论了好几种转述形式以及它们允许转述者介入引语的相对程度。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们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两个语篇中的出现和分布情况。除了自由间接引语之外，其他几种转述形式都出现了。在下面的统计数字中我们把言语形式的叙述性转述算入了间接引语：

图 2

DS	PDS	IS	
2	4	9	《时报》
5	2	7	《论坛报》

表中显示，两篇报道在转述别人的话语时都有选择间接引语的倾向。如果考虑到 PDS 中的间接成分，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间接引语

的特点是引述者将别人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相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前者往往为后者所吞没。费尔克劳（1995：Ch.2）指出，新闻语篇有一种倾向，即引语和引述者话语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新闻报道在“始言者”（principal）和读者之间充当“媒介”（mediator）；它至少是“传言者”（animator），常常也是“作者”（author），有时甚至冒充始言者。即使仅仅作为传言者，媒介也难免在报道里掺杂自己的观点。各种形式的间接引语为新闻语篇发挥这种媒介作用提供了既实用又经济的手段。请看下面的例子：

(32) In addition, the statement **rebuffed charges that Mr. Netanyahu wa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时报》

(33) But a statement issued after the cabinet's weekly meeting, while avoiding direct comment on the affair, sought indirectly to defend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and to **defend Mr. Netanyahu against published charges that he had ordered the assassination over the objections of his security chiefs.**

《论坛报》

虽然两篇报道转述的是以色列政府声明中的相同内容，但是无论从概念意义（ideational meaning）抑或人际意义来看，两者都明显存在不同之处。其结果是，报道者在读者心中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府形象：例(7)的语言直截了当，政府态度强硬；而例(8)的语言迂回婉转，政府态度温和，基本处于一种谨慎的守势。

要了解报道者在间接引语里加入了什么样的观点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来原话加以对照，但要做到这一点往往不可能。更简便的方法是把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拿来比较，例如前文中的例(25)和(26)。在转述侯赛因国王对此事件的看法时，《时报》选择了直接引语，表示转述的是国王的原话，其中的“a party”并不一定指内塔尼亚胡本人。《论坛报》基本上采用的是间接引语，其中“someone”一词显然暗指内塔尼亚胡，在紧接这句话的下一段里报道者表明了这一点。与《时报》相比，在《论坛报》中，侯赛因国王的语气要严厉得多；从整个语篇来看，报道者似乎是在着意突出暗杀事件给约以关系带来的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直接引语并不能保证传递给读者的是消息来源的原话。人们通常把是否忠实于原话作为区别直接和间接引语的主要标准："根据普遍接受的观点，直接引语表示忠实于被转述的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而间接引语只转述其内容。这种观点得到了人们的承认。"(Coulmas，1985：41)然而，在新闻报道中事实并非如此。贝尔(Bell，1991：60)指出，直接引语一般是报道者根据消息来源所说话语的大意整理编写的，形成的文稿有时是经他同意后才发表的，然而通常情况下，新闻报道连这一道程序也被省略了。由此可见，在新闻语篇里，直接引语往往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报道者以此来显示报道的客观公正。至于是否逐字逐句地忠实于原话，那又另当别论。例如，虽然例(25)和(26)中的"an irresponsible act"和"a reckless act"都被置于引号内，表示引述的是原话，但它们的措辞却并不一样。另一方面，间接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中也充满着不加引号的直接引语。(Fairclough，1995：Ch. 2)由于新闻报道的特点之一是其时效性，新闻记者的工作经常只是把来自各方面的口头或书面消息穿插编辑成一个新的连贯语篇，其中有大量的原话被不加引号地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编辑是按照报道者的理解和目的完成的。

8.5　转述动词

沃洛西诺夫(1973)强调，转述引语，只有参照它们的语境才能确定其意义。转述动词构成转述引语最直接的语境，具有预示和支配其意义的功能。在《时报》和《论坛报》中转述动词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如下：

《时报》	《论坛报》
Opposition members and security **Have demanded** to know ...	The authorities **said** ...
Lloyd Axworthy **said** ...	... **wrote** Yaacov.
	Zeev Schiff was among several voices **insisting** that ...
Some opposition members **called on** ...	

Others **appealed** to ...

Zeev Schiff ... **said** ...

Mr. Schiff **said** ...

... **wrote** Mr. Schiff.

it (the government) **accused** ...

the statement **rebuffed** ...

King Hussein of Jordan ... **said** ...

President Mubarak of Egypt Yesterday **attacked** ...

... he (Mubarak) **said**.

Sheikh Ahmad Yassin ... **said** ...

Mr. Yassin **said** ...

a (governmental) statement sought to **defend** ...

The statement **described** ...

it (the statement) **said** ...

the king **assailed** ...

King Hussein proceeded to **lash** ...

he (the king) **said** ...

Experts in Israeli strategic affairs also **said** ...

... **said** Mark Heller.

(Mark Heller) **noting** that ...

在英语里"say"和"write"两词在感情色彩上属中性，是最常用的转述动词。例如在《时报》和《论坛报》中出现的25次转述动词中，它们就占了13次。不过，频繁使用这两个词来转述别人的话语会使语篇单调乏味。另外，"say"和"write"貌似客观，实际上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原话的风格和其他人际意义。鉴于这些原因，引述者经常或者选择其他的转述动词，或者给"say"和"write"加上一些修饰成分，从而使它们带上了报道者的声音。例如：

(34) These reports, wrote Yaacov Erez **in a bitter article** ...

《论坛报》

(35) King Hussein of Jordan, **balancing Arab outrage and Israeli sensitivities**, said ...

《时报》

格伊斯(1987:130—132)把英语中一些常用的转述动词按其可能引起的感情色彩分为两类：积极的(positive)和消极的(negative)。在本文分析的两个语篇中出现的有(积极程度由左向右递增，消极程度递减)：

POSITIVE: noting, described

NEGATIVE: attacked, assailed, accused, appealed, insisting

积极动词帮助塑造消息来源的谨慎、镇定、坚强、严谨或成功者的形象；消极动词则给人一种鲁莽、软弱、不严谨、易冲动或失败者的形象。

《时报》和《论坛报》选择消极动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积极动词。在格伊斯所列的40个积极动词中，只出现了两个（均在《论坛报》里）。消极动词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应该加上"demanded，lashed，rebuffed"。考虑到报道的内容，这种选择并不奇怪，可能更有意义的是考察中性词（"say"和"write"）、积极动词和消极动词在两个语篇中的分布情况。在《论坛报》中"say"和"write"以及仅有的两个积极动词"noting"和"described"的主语（表示消息来源）全部指称以色列人，而两个消极程度相当高的动词的主语均为侯赛因国王。在《时报》中情况几乎恰恰相反。8个中性词（"said"和"wrote"）中有5个用于转述非以色列人的话语，消极动词中除了"attacked"的主语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之外，其余的都是以色列人。对比最明显的是两篇报道在转述以色列政府和候赛因国王的话语时所选择的动词：

图3

《时报》	《论坛报》	
Accused Rebuffed	(sought to)defend described said	Israeli government
Said	assailed (proceeded to)lash said	King Hussein

转述动词选择上的这种差异帮助两篇报道分别为以色列政府和候赛因国王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形象。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时报》和《论坛报》在转述同一些人的同一些话语时表现了不同的观点。首先，《时报》突出以色列政府在国内遭受的压力，对阿拉伯人的反应则有点轻描淡写。《论坛报》突出的则是约旦国王候赛因的愤怒和事件给约以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破害。其次，《论坛报》突显以色列政府的这样一种形象：面对国内外

的压力，它采取一种谨慎的守势，表现得温和从容、处事不惊；而阿拉伯人则显得怒不可遏、咄咄逼人。《时报》为双方塑造的形象几乎正好相反：候赛因国王小心翼翼、言辞谨慎；而以色列政府面对各方的批评和谴责则态度十分强硬，言辞之中显得有些恼羞成怒。两篇报道通过转述引语所表达的这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是与整个语篇相一致的。例如，《论坛报》引述的候赛因国王的话语在篇幅上远远超过了《时报》。另外，《时报》在文章的结尾突出了哈马斯对以色列构成的潜在威胁，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以色列人有理由对暗杀失败表示不满，以政府也有理由策划这次暗杀行动。而《论坛报》则以专家们对约旦可能采取的行动和约以关系的担忧而作为其结尾。

8.6 结语

有关言语转述的研究历来局限于文学语篇，以致于每当提到转述引语，人们就会想到文体学家对文学语篇中的引语所概括出来的那些形式特征和修辞功能。但是，随着非叙述性语篇分析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转述引语的性质与功能因语篇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它们的研究应建立在具体的语篇和语境上。（Baynham，1996：62）在新闻语篇中转述引语通常用来增强报道的真实感和权威性。然而，本文对两篇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表明它们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常被报道者用于突出报道的重点，并借此有意无意地影响读者对所报事件的看法。

第九章
语篇的互文性分析

"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转化。"（Bakhtin，引自 Kristeva，1986：37）克丽丝蒂娃（1986）把语篇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文论中互文性往往既可以指作者、读者和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又可以指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即一个"语篇充满其他语篇的片段"（Fairclough，1992：84）；因此，互文性有时候指的几乎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语篇的对话性。不过，在克丽丝蒂娃的理论中，所谓的"互文性"，主要指的是"互文本"（intertext）的特性，而"互文本"的意思是说一个"文本"（text）或者语篇是由它以前的文本或者语篇的遗迹或记忆形成的。一个语篇就是一个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装镶嵌起来的图案。受克丽丝蒂娃的影响，巴尔特指出："每个语篇，由于它本身就是另一个语篇的互文，因而都具有互文性。"（Barthes，1979：77）或者"任何文本（text）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citations）的一个新织体（a new tissue）。"（Barthes，摘自王一川，1994：250）当然，我们切不可因此就误以为互文性无非就是摘抄、仿效、剪贴或拼凑，而应该是指从语篇这个网络中抽出的任何语义成分总是要超越此语篇本身而指向它之前的语篇，这些先前的语篇把现在的这一个语篇置入其自身必然联系着更广阔的社会历史。

互文性研究的历史恐怕与"语文学"（philology）的历史一样长。只是以前人们一直把它等同于"语源研究"（source study），即为了解释某一个语篇的意义而去寻找和确认与之相关的以前的文献或语

篇。这种研究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的，它要求事先存在给定的相关语篇作为事实，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Culler, 1981: 117—118; Frow, 1986: 156)但是，克丽丝蒂娃指出，一个语篇是对"一些语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种互文组合：在一个语篇的篇幅内，来自其他语篇的言论相互交叉和中和。"(Frow, 1986: 36)克丽丝蒂娃使用"互文性"这个词，就是要表达语篇生成过程中相互交叉的各种语料的这种复杂和异质的(heterogeneous)特性。她所强调的是语篇重新组合或转换的内部过程，在此过程中来自其他语篇的语料按其功能被结合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语篇。

9.1 互文性的分类

克丽丝蒂娃(1986)区分互文性的两个方面："水平"(horizontal)互文性和"垂直"(vertical)互文性。她根据巴赫金的理论把语篇视为一个三维的互文空间：写作主体(writing subject)、受话者(addressee)和外部语篇(exterior text)。语篇中的词的具体地位可以沿水平轴(the horizontal axis: subject-addressee)和垂直轴(the vertical axis: text-context)，根据两者的恰好重合来定义。这种重合表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每一个词(语篇)都是词(语篇)的交叉点，在这一点上可以读到至少一个另外的词(语篇)。"(Kristeva, 1986: 37)水平互文性指的是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他话语之间的具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能使人们注意到话语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回应此前的话语并期待自己得到此后话语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语篇中的词既属于写作主体又属于受话人"。(同上: 36)水平互文性典型的例子是会话中相互回应的话轮或往来的信函。垂直互文性指构成某一语篇较直接或间接的那些语境，即从历史的或当代的角度看它以各种方式和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例如麦尔维尔(Melville)在《大白鲸》(*Moby Dick*)的开头节录了80段他人的与鲸鱼相关的话语；这些话语与小说本身构成互文关系，形成它的语境。正如克丽丝蒂娃(1986: 37)所承认的那样，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上述两种互

文性从来也没有得到真正清楚的区分。在我们看来，上面所说的语篇的水平轴和垂直轴与索绪尔所提出的词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事实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水平互文性强调的是发话人如何根据别人的话语来组织自己的话语以便更好地与别人展开对话，而垂直互文性强调的是一个语篇“充满了其他语篇的片断”（Fairclough，1992：84），人们在试图理解该语篇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关于这些其他语篇的知识。

在克丽丝蒂娃之后许多人曾尝试给互文性进行分类。詹妮（Jenny）区分“强势”（strong）互文性和“弱势”（weak）互文性：前者指一个语篇中包含明显与其他语篇相关的话语，如引言、抄袭等，后者指语篇中存在在语义上能引起对其他语篇联想的东西，诸如类似的观点、主题思想等。（Jenny，1982：40）一种对互文性更为普遍的分类是区分“显著”（manifest）互文性和“构成”（constitutive）互文性。与詹妮的强势互文性一样，显著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中标明的与其他语篇的互文关系：“在显著互文性中，其他语篇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层特征，如引号，所明确标示或暗示。”（Fairclough，1992：104）构成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各种体裁或话语类型规范（conventions）的那些复杂关系，它“是语篇生成中涉及的那些话语规范的组合（configuration）。”（同上）显著互文性和构成互文性显然不包括语篇中没有被标明的但却是属于别人的那些话语，即詹妮称之为“抄袭”的那些话语，而这类互文性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尤其在新闻语篇中。（Bell，1991）另外，这两种互文性常常是一对孪生体，难以分开。例如，如果一个语篇引用某人的几行诗（显著互文性），那么它也同时引起了读者对诗歌体裁规范（构成互文性）的联想。我们认为更明确可行的一种方法是从读者或分析者的角度把语篇的互文性分为“具体的”（specific）和“体裁的”（generic）。具体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包含可以找到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语，这类互文性能够涵盖上述的强势互文性和显著互文性以及不加标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我们在第八和第九章里讨论的转述引语和语篇的对话性可以被看作主要是具体互文性的例子。体裁互文性是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文体（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

裁(genre)的混合交融；巴赫金(1981)将其称为“杂体语言”(heteroglossia)。它们所涉及的不是个体主体(individual subject)，而是集合主体(collective subject)，例如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Frow，1986：157—159)体裁互文性成了很多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Thornborrow & Wareing，2000：172，176)

9.2 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语篇的理解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从某一语篇与其他语篇的相互关系来分析和评价该语篇的结构成分的功能以及整个语篇的意义和价值。例如，里法特尔(Riffaterre，1978)认为对诗歌的理解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首先，建构语篇的所指连贯性(referential coherence)，他称之为“摹拟”(the mimesis)；与此同时记录下那些使这种建构产生问题的异常的和不一致的现象。然后，回过头来赋予在第一个层次上矛盾的现象以连贯的意义，里法特尔将此称为“指号过程”(the semiosis)。建构语篇连贯性的第二个层次涉及语义材料的转换(transformation)，主要有两种：1. 语篇内的(intratextual)，即语篇对一个语义核心的扩展；2. 互文的(intertextual)，即语篇相对于其他语篇的扩展。不过，弗罗(Frow，1986)指出，里法特尔的理论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其必然的结果是存在一种‘正确’释义的可能性，它首先取决于识别出惟一可能的相关语篇(intertext)”。“换言之，语篇变成了一个‘谜’，而阅读则受到了有限数量的‘谜底’的限制，尤其受到语篇有限的互文关系数量的限制。”(Frow，1986：154—155)读者“在填补空白和寻找谜底时受到严格的指导和控制。”(Riffaterre，1978：165)但是，正像人们今天认识的那样，语篇的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不可否认，对一个语篇互文关系的一种建构可能会比另一种更可信和/或可行，但是任何这种类型的建构都产生于某种阅读目的或兴趣。这意味着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

里法特尔理论中存在的问题部分地反映了互文性研究所面临的困难。根据克丽斯蒂娃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Frow，1986：155)"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vist)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克丽丝蒂娃对互文性的理解。在谈到语篇时我们通常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单位；例如它一般有标题、有作者、有开头和结尾、有具体的内容和连贯性等等；在语篇之外是生活、历史和现实世界。然而，在解构主义者那里所有这一切全都改变了，语篇的任何边界都不复存在，它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互文关系构成的无限的网络；语篇性(textuality)变成了互文性。(Leitch，1983；Seldon，1985)从而，"每个语篇，由于它自身是另一语篇的互文本，都是互文的。"(Barthes，1979：77)"每个语篇都被表明是以一种最难以捉摸的同化方式包含着其他语篇；这种同化作用既是心理分析也是纯修辞批评研究的课题。任何我们认为属于能与语篇的字母相分离的精神的或意义的东西都仍存在于互文的范围之内。"(Hartman，1979. In Bloom et al：viii)

这种意义上的互文性使对它的分析研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正如卡勒尔(Culler)指出的那样，它"因其所表示的语篇空间广大而不明确，所以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1]，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出。"(1981：109)在卡勒尔看来"这个概念不应被缩小到只表示作为语料来源的一个先前的行为"，而是应该涵盖"一个开放的既是可以识别的(identifiable)而又是不再为人所知的(lost)行为系列。这些行为共同构成一种类似于语言的东西：可能的话语、常规体系、陈词滥调和描写体系。"(同上：110)但是，卡勒尔指出，这种做法又与评注(exegesis)的实际要求相抵触。总之，互文性这个概念，唯其具有具体清楚的所指才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缩小它的所指范围也就削弱了其描写整个语篇的互文关系网络的能力。

---

[1] 这种研究正是互文性所要超越的。

詹妮（1982）认为体裁互文性引起的问题是它会“把属于语码（code）的结构与实现规则的结构混为一谈，令人难以应付。”（p.42）事实上，詹妮认为，在规则和语篇之间做任何严格的区分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怎样抽象，体裁原型依然构成语篇的结构”（同上）；互文语篇的材料“不仅仅是词，也包括已经说过的、组织过的语篇片断。”（同上）弗罗（1986）支持詹妮的观点，指出“提及另一语篇就会含蓄地触及一个体裁的规则中包含的全部的潜在意义。”（p.157）因此，他认为，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于该语篇的释义而言，“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canonical structure）。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p.157）弗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语篇互文性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体系”或者一个“客观的语篇序列”，“它只能是对建构某种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例如其效果、带来的快乐、产生的说教或政治兴趣）的一种评价。”（同上）在这个意义上，语篇的互文性分析必须有别于语源研究，前者强调阅读的过程，而不是对具体相关语篇的辨认；这种辨认既不是互文分析的出发点也不是其目的。互文材料很少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

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领域，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Fowler，1991；Fairclough，1992，1995）。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闻语篇等非文学语篇，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我们在第八章里已经看到，新闻报道是具体互文性的典型例子，其中通常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来源未加任何说明的他人的话语，这些引语和“抄袭”来自各种渠道，代表着不同人或群体（通常是有权者）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从而报道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对它们进行取舍和安排，使之在语篇中形成各种对话关系或者具体互文关系。在这一章和第十一和十二章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与体裁互文

性相关的一些问题。

9.3　体裁

"体裁"(genre)原本是一个文学术语，*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把它定义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类型或种类"。但是，在语篇分析中这个词几乎可以用来指任何具有显著特征的文学或非文学的、口头或书面的语类(discourse type)。A. 福勒(Alastair Fowler[①])认为体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由一组特征来定义并为定义文学体裁提出了十五个特征，其中包括表述方面、外部结构、韵律结构、篇幅、主体位置、人物、使用价值等等。斯威尔茨(Swales, 1990) 把体裁看作具有相同目的的一组交际事件："体裁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交际手段"(p.46)；"一组交际事件构成一种体裁的主要标志是具有共同的交际目的"。(p.53)奥比比(O'Beebee, 1994)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强调体裁的"使用价值"(use-value)："我是根据使用价值定义和分类体裁的。因此，我认为体裁的区别是建立在话语的使用价值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话语的内容、形式特征或其生成规则上。"(p.7)

巴赫金很早就对言语体裁做过认真的探讨。他把体裁与人类的活动领域相联系，指出语言的使用是在人类某一活动领域中参与者单个而具体的表述形式(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话语)中实现的。这些表述不仅以自身的主题内容和语言风格，即对词语、句子和语法结构等语言手段的选择，而且首先以自身的谋篇布局或组织结构来反映每一个活动领域的特殊条件和目的。每一体裁与其相应活动领域的关系是后者决定前者："所有这三个因素——话题内容、风格和布局结构——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表述的整体中，并且都同样地为该交际领域的特点所决定。每一单个的表述，无疑是个人的，但使用语言的

---

① 此前我们多次提到批评语言学家 Roger Fowler，在这一章里我们又要经常提到文论家 Alastair Fowler，我们将在"福勒"之前加上"A"或者"R"以示区别。

每一领域却锤炼出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我们称之为言语体裁。"（巴赫金，1998a：140）

克莱斯（1985）关于体裁的看法与巴赫金如出一辙。他把体裁与规约性的（conventional）社会情景类型相联系；说这些社会情景是规约性的，是因为人们进行交际的时机和场合、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交际的结构和方式都是随不同的情景类型而约定俗成的。例如，高度形式化或仪式化的庭审、婚礼、会议等和远没有那么正式的家庭早餐、朋友闲聊等都有其不同程度的规约性。不同规约性社会情景的形式结构表明其参加者的不同的目的和角色，它们一起决定着在其中产生的语篇的形式特征："这些功能和目标规约和仪式影响着在这样的场合产生的语篇，并导致了语篇的约定俗成的形式……。"克莱斯把语篇的这些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叫做体裁："体裁拥有产生于具体社会场合以及表达这种场合的功能、目的和意义的特定形式和意义。因此体裁提供了一个共同体在特定时间的相关的社会场合的精确索引和目录。"（1985：19）克莱斯列举了下面这些作为体裁的例子：访谈（interview）、散文（essay）、会话（conversation）、销售（sale）、辅导（tutorial）、体育解说（sports commentary）、诱惑（seduction）、官方备忘录（office memo）、小说（novel）、政治演讲（political speech）、社论（editorial）、布道（sermon）、玩笑（joke）、指示（instruction）。

上面这些学者对体裁的论述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体裁的目的性和结构性，即都认为一种体裁最重要的标志是它的目的或使用价值和它的结构特征。韩礼德和哈桑（Hasan，1985）指出，不同的体裁规定不同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或者参与者类型并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他们把这叫做"体裁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简称 GSP）。体裁结构潜势可以由两种成分构成："强制性的"（obligatory）和"非强制性的"（optional）。例如，在商店"购物"这类交际活动主要涉及的是"顾客"和"店员"两种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一系列交流行为。典型结构是：顾客进入店内、店员招呼并探询预购之物、顾客提出购物要求、店员取（称、包装等）货给顾客、顾客致谢、店员报价、顾客付款、店员找零和致谢、顾客致谢和告别、店

员回说再见。上述这些步骤基本上都是在商店"购物"这一体裁所要求的，即都属于强制性的结构成分。当然，在它们中间也可以而且经常出现非强制性的步骤或成分，例如顾客在"提出购物要求"之前或许会先询问欲购之物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它的价格、质量、种类、产地等等。

9.4　体裁互文性

我们在前文中把体裁互文性定义为语篇中不同风格、语域或体裁特征的混合交融。几乎任何语篇，不论是文学的抑或非文学的，都具有体裁互文性。例如，有人把广告称作"寄生语篇"，因为它们一方面往往是多种体裁的组合，另一方面又常常被插入总体上属于其他体裁的语篇中。新闻语篇也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往往只是撰稿人把来自各种渠道的相关话语临时糅合或拼凑在一起的结果，其内容和形式难免带有各类语篇或体裁的痕迹。例如在第七章里我们提到，范戴克(1988)在分析荷兰报纸的一些新闻报道时从中确认出 12 种消息来源，包括各种机构组织的报告、国内外新闻机构的电讯、新闻发布会、官方文件、会议讲稿、采访记录等等；贝尔(1991)通过事后分析也发现自己写的一篇新闻报道所使用的材料来自各种渠道和各种体裁的他人的语篇。

我们给体裁互文性下的定义表明，不仅是体裁，不同风格和/或语域在同一语篇中的共现或混合也被视为体裁互文性。这是因为它们和体裁往往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的体裁要求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风格标示不同的体裁，两者的关系正如福勒给体裁下的定义暗示的那样：体裁是"指与一些共同交际情景相关的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显著相似形的一组语篇。"(1991b:227) 巴赫金对体裁和风格的紧密联系也有明确的论述："任何风格都与表述不可分地联系着，与表述的典型形式即言语体裁不可分地联系着。""风格(语体)与体裁之间有机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语言风格或功能语体上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从本质上说，语言风格或功能语体正是人类活动和交际

的特定领域中的体裁风格。每一领域都拥有和使用该领域特殊条件的体裁，为了与这些题材相适应，于是就产生了特定的风格。一定的功能（如科学的、技术的、政论的、公务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与每一领域特有的言语交际的特定条件相互作用，产生了特定的体裁，也就是特定的、相对稳定的有着不同题材、布局和修辞的表述类型。"（巴赫金，1998a：144—145）巴赫金事实上把当时修辞学遭遇的许多困难和失败归咎于它把风格和体裁相互割裂："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语言风格（语体）的体裁本质缺乏透彻理解的直接结果……风格（语体）与体裁的脱节，对一系列历史问题的研究影响特别严重。语言风格（语体）的历史嬗变与言语体裁的演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A. 福勒认为风格与体裁的匹配至少有两种方式：1）某些体裁拥有自己的词汇选择范围；2）风格和体裁的匹配也可以体现在各种修辞格之间使用比例的变化上。（1982：71）

上述关于体裁互文性的定义也意味着一个社会或领域中并存的各种体裁往往会相互渗透、影响并因此而发生变化。这一观点曾经历过很长时间和争论才被人们所接受。德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曾宣称"没有区分就没有创作，而创作是艺术的精髓……最重要的是明确的目的和分类，艺术作品通过它们获得形式和自身的完善。诗人的想像力不应该花费在没有秩序的泛泛的诗歌上，每一首作品都应该具有完全明确的形式和体裁特征。"（引自 O'Beebee，1994：1）施莱格尔这里强调的是，语篇应该保持体裁界限清楚。西塞罗（Cicero）和霍勒斯（Horace）等人也曾坚持认为，体裁的纯洁性和清晰的分界对文学创作是必要的。马里诺（Marino，1978：50）将这种传统思想总结为五点：1）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法则、思想、美点，不容混合；喜剧和悲剧要素的混合不予考虑；2）体裁的严格界限迫使每一位诗人把自己严格限制在所用体裁的规范之内；3）从而，每一体裁都保持着自己的"纯洁性"和格调的"统一性"；体裁要么界限分明，要么不存在；4）遵守每一体裁内在的和形式上的惯例就会取得创作成就，否则就不可能；5）体裁有等级之分（包括高雅的和低俗的，重要的和次要的），这种等级对于文学价值的衡量必不可少。

这种传统的观点在现代依然时有所见。例如，萨克斯(Sacks)把散文故事分为三种体裁：讽刺、寓言和小说，并声称："一个人无法创作既是小说又是讽刺文的作品，就像他无法用英语写一个又是主动态又是被动态的句子一样。"(1964:46)克莱斯也曾写到："正像存在数量小而固定的句型一样，在任何写作传统中也存在少量固定的体裁。个人不能创造新的句型，他同样也不能创造新的体裁。"(1982:98)不过克莱斯后来的观点似乎有所改变："体裁是动态的，会对社会制度的其他部分的动态变化做出反应。所以体裁有历史的变化；所以体裁随着时间而出现；所以在一个层面上似乎是同样的体裁形式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也会具有显著不同的形式。"(1987:42)这后一段话更能代表现代人对体裁的认识。

巴赫金很早就相当关注体裁互文性，对不同体裁的这种相互融入和相互包容进行过认真的探索。他认为体裁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种体裁总是与以往相同又不同，总是同时是旧的又是新的。它在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和在特定体裁的每一具体作品中都得到更新，获得新生。这构成了体裁的生命。"(1984:106)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中把体裁分为两类：简单类型(第一类)和复杂类型(第二类)。第一类包括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语类型，如日常对话和私人信件等。第二类指的是在比较复杂的和相对发达而有组织的文化交际(主要是书面交际)条件下产生的话语类型，例如长篇小说、戏剧、各种科学著述、大型政论体裁等等："它们在自身构建过程中，把在直接言语交际条件下形成的各种第一类(简单)体裁吸收过来并加以改造。这些第一类体裁进入复杂体裁，在那里发生了形变，获得了特殊的性质：同真正的现实和真实的他人表述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巴赫金，1998a:143)巴赫金举的例子是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或者书信等，它们在进入小说中之后，只是在小说内容的层面上还保留着自己的形式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只能是通过整部小说才进入到真正的现实中去，即作为文学艺术现实的事件，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事件。

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是故意把不同领域的体裁混杂使用的最典型的例子。在谈到小说的典型风格特征时，他指出："小说可以被

定义为社会话语类型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语言多样性）和个体声音多样性的艺术组合。任何民族语言内部的层次化，分为社会方言、典型的群体行为、行业术语，体裁语言、不同时代和年龄的语言、倾向性语言、权威者的语言、各种领域和短暂时尚的语言、服务于某一天甚至某一刻具体的社会政治目的的语言（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口号，自己的词汇、自己的重点）——这种内部的层次化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历史的每一刻，是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小说通过话语类型的社会多样性和在此条件下活跃的各种个体声音把它的主题和所描述表达的全部事物和思想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作者的话语、叙述者的话语、插入的体裁、人物的话语只是帮助异体语言进入小说的一些基本构成单位，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容许大量的社会声音和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关系存在（这些联系和关系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对话性）。各种话语和语言之间的这些独特的联系和关系，主题的这种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类型的发展、向社会异体语言各细枝末节的扩散它的对话性——这是小说风格的基本特征。"（1981：264）这段话表达了巴赫金一生坚持的一种观点，即虽然人们习惯于从某一种"语言"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但是各种语言和话语的竞争，甚至是在同一语篇中，为他们提供了从另一种语言或者从他人的眼中观察现实的可能性，从而在不同的世界观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对话的杂体语言"（dialogized heteroglossia）。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对体裁的性质和功能以及体裁互文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例如 A. 福勒（1982）批评了文学理论中的一种流行观点，即想当然地认定体裁具有明确的定义而且相互排斥、认为各种体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语篇可以属于一种体裁而同时又带有其他体裁的特征："文学作品正像颜色一样相互重叠：在色泽浓重时它们很容易区别；但是它们有如此多的变化和如此多的不同形式，以至于我们无法弄清何处是一种的结束另一种的开始。"（Kames，摘自 A. Fowler，1982：37）这样，将某一作品归于某一体裁并不意味它与该体裁中的所有其他作品具有完全一样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一种体裁中的每一部新作品都可能为它增添新的特征。各

种体裁正是以这种方式随着时间而发展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难以用一组组固定的特征来定义它们。A. 福勒认为体裁的作用不是定义和分类作品，而是帮助理解作品，即我们之所以需要体裁这个概念是因为识别出一部作品的体裁归属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因此"体裁理论主要与理解有关。它关注重建、理解和(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意义的那些原则而不太关心分类。"(1982:38)

福勒(1982)把一个语篇涉及的不同体裁分为"类"(kind)和"式"(mode)。前者指通常意义上的体裁，可由一组特定的意义和形式特征来定义。类总是用名词表示，在英语里，"This work is a Z"这样的命题中的"Z"通常表示类。式与类有对应关系，但它们只具有对应类的部分特征。式总是用形容词来表示，例如在英语里，"narration/narrative, poetry/poetic, drama/dramatic"等这些成对词中，前者表示类，后者表示式。"a comic play"几乎相当于"a comedy"，但是"comic"这个式也常常用于修饰其他的类。例如，当把 Jane Austin 的小说 *Emma* 称为"a comic novel"时，我们的意思是，这部书属于喜剧式和小说类。福勒对类与式的区分表明，整体上属于某一个体裁的语篇可以(而且往往)具有其他体裁的特征[①]。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体裁互文性。以《白鲸》(*Moby Dick*)为例，麦尔维尔(Melville)在写这部小说时似乎就意识到了其互文性。他在第 130 页写到"Something of the salt sea yet lingered in old Bildad's language, heterogeneously mixed with Scriptural and domestic phrases"。这部小说涉及的体裁非常广泛，贝姆(Baym, 1979:918)罗列出道德说教；短篇小说；应景、科学、政治和伦理散文；讽刺文；词典；百科全书；戏剧；戏剧性独白；指南；旅行见闻记录；人物素描；难以置信的故事；和预言书。我们或许还可以把其中的戏剧成分再详细分为悲剧的和喜剧的；在第 47 章作者就通过叙述者 Ishmael 大谈悲剧理论。

语篇的体裁互文性也可以被视为不同声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① 王一川(1994:254)以相同的观点讨论了"诗"(poetry)和"诗意"(the poetic)。

系，但这些声音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属于不同的群体。每一种体裁或式都有自己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群体的立场观点或意识形态。作者或读者在创作或阅读任何语篇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这种语义潜势并从中做出选择。因此我们认为，体裁互文性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考察语篇中各种类和式的混合交融表达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体裁或式的混合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作者达到其交际意图或目的的。请看下面这个广告语篇：

(1)　**警惕——病毒性心肌炎!!!**
诊治——到北京朝阳中医院

> 北京朝阳区中医院心肌炎专科门诊由副主任医师坐诊，采用97年国家新药玉丹荣心丸（97国卫药准字Z-099号）专门治疗儿童和成人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病是指病毒感染引起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和间质细胞侵润及纤维渗出，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心血管疾病中常见病之一。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轻者数周或数月治疗后痊愈，重者发展为心肌病或留有后遗症而贻患终生。病毒性心肌炎是小儿和中青年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误诊率、漏诊率较高，危害很大，在临床常见因病程短而急导致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及严重心律紊乱猝死者。* 为使更多的人了解病毒性心肌炎，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准确的治疗，欢迎全国各地患者与下列医院联系就诊。……

广告被认为是一种寄生语篇（Cook，1992），因为它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各种体裁的特征，形式灵活多变。例(1)中的广告是一个典型的费尔克劳（1992）称之为"信息—宣传"（information-publicity）或者"告诉—销售"（telling-selling）的语篇。就整个语篇的交际目的而言，它是一则广告，旨在推销一种产品和服务；但是中间的斜体部分在体裁上又属于"信息报告"（information report；McCarthy & Carter，1994：33）。这种报告体裁在各类广告中司空见惯，它往往以专家或权威的口气提供表面上是为了消费者利益的，实则是为了推销相关产品的信息。广告一般要提及所推销产品的名称和性能以及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联系地址；但除此之外，许多广告为了加强其说服力或感染力还经常提示或暗示潜在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益处和/或拒绝购买所可能遭受的损失。例(1)中的报告部分的主要功

能便在于此：它所传递的一些有关病毒性心肌炎的信息，其实际效果是给这种疾病的患者施加了心理上的压力并可能促使他们尽快接受该产品和服务。不同的体裁容许不同的主体地位，从而一个语篇中不同体裁的交叉混合往往使作者处于矛盾的地位。在例(2)的斜体部分中，作者是报告人，是信息的提供者，因而与读者(信息的接受者)相比他处于权力地位。在其余部分，作者是做广告的人、是推销者，而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里，消费者对于推销者而言处于权力地位。写作主体的这种矛盾地位表现在这两部分不同的语言风格上。例如，与其余部分不同，斜体部分使用的基本上不是大众语言，而是通常以非人格化(impersonalization)为特征的科技语言。专业/科技语言是表示权威的一种方式。

9.5 结语

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讨论表明，互文性是一切语篇的基本特征，它可以被视为不同语篇或不同体裁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还将看到，体裁互文性归根结底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结果，它也是新体裁产生的根源："体裁从何而来？嗨，很简单，从其他体裁演变而来。一种新的体裁总是把一个或几个旧的体裁转换的结果：通过颠倒、置换、合并。"(Todorov，1976：161)

第十章

主体位置、阅读位置和体裁互文性

几乎所有的语篇都会呈现多种体裁的特征。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和主体位置；语篇的互文性意味着发话人在实现不同体裁的意义潜势时需要相应地变换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并建构相应的阅读位置（reading position）以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

10.1 阅读位置和主体位置

体裁的分类与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分类密切相关。某一群体或阶层使用或垄断一种（些）体裁，另一群体使用或垄断另一种（些）体裁。其结果正像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意义潜势，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修辞方式、使用规则和惯例等；它们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和机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义潜势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会通过语篇和体裁建构的阅读位置和主体位置表达或体现出来："话语为语篇的读者建构阅读位置和主体位置。体裁同样建构阅读位置…… 每一种体裁都建构使用该体裁的参加者占据的位置或角色。"（Kress，1985：37）语篇的阅读位置就是其阅读角度，只有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语篇才显得自然、才具有了连贯性、才可以自圆其说、而读者才可以顺利地理解语篇的结构和意义。阅读位置不仅为读者提供解读语篇的角度，指导他们在阅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应该采取的立场，它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将读者塑造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告诉他们谁、什么和以何种方

式参与特定的社会情景、社会场合和社会交往。因此，阅读位置与主体位置密切相关，语篇在建构阅读位置的同时也在帮助所属体裁建构和强化主体位置，即为使用该体裁的个人主体描述和规定行为范畴、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中，每一种体裁都赋予其主体位置以特定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具体语篇的说话主体都要受到所用体裁的已经形成或存在的体现该体裁的意义潜势的主体位置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主体"也可以被理解为"属员"或者"臣民"[①]，因为所谓的"主体"在生成或解读任何语篇时通常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依赖体裁的意义潜势并从中做出选择，以获得某种交际效果或达到某种交际目的。"许多精通语言的人，往往在某些交际场合觉得自己手足无措，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实际掌握这些领域的体裁形式。"（巴赫金，1998a：163—164）现在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1) The area round a town in which its urban functions exert a strong influence can be described as a *functional region*. In highly urbanized countries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useful way of division of large areas into smaller units for study. We need to remember, however, that the boundary of a region can be defined precisely only in terms of one factor, and then only if that factor can be expressed as a quantity. We can talk of part of northern New South Wales as within the region of 50 per cent or more commercial orientation to Brisbane; we can also talk of that part where 50 per cent or more of the people take in Brisbane daily newspapers; the boundaries are different, but they both mean something precise. To speak of the 'Brisbane region' without any indication of the way it is defined is vague indeed. In Chapter 2 the boundary of a population density region is defined from statistics in a precise way.

We have seen too that functional regions overlap and nest one within another. The fringe zones of the four New Zealand towns in Fig. 5.8 would overlap one another if plotted on one map. If the criteria used had been comparison rather than convenience goods, it is probable that all four towns would have come within the functional region of Hamilton, a much larger town. Hamilton, in turn, in other fields could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functional region of Auckland, the largest city in New Zealand.

(D. D. Harris & I. R. Stehbens,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Processes*, 1981, p. 157)

---

① 在英语中"subject"这个词恰好兼有"主体"和"臣子"或"臣民"两种意思。

这段文字摘自一本中学教科书，其中的一些语言成分的语用功能显然是引导学生来占据这个语篇所建构的阅读位置并使他们习惯或接受这种体裁所特有的主体位置，最终学会使用这一体裁。首先，有一些结构的逻辑主语位置空缺，例如"to speak of, most useful way of division, units for study, can be described, can be defined, can be expressed, it is defined, was defined from the statistics, the criteria used, if plotted, could be considered"等。发话人留下这些施事空缺的用意之一或许是邀请或鼓励学生以科学家或者未来地理学家的身份来填补这些空缺并以这样的身份来观察和思考问题。通篇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we"具有类似的作用，发话人以这种方式引导或要求读者认同这个语篇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的观点和准则。其次，文中使用的一些衔接成分，例如"We need to *remember*, *In chapter 2* the boundary, We have seen *too*"等，其作用是确认共享的背景知识，把读者纳入与发话人同样的群体和位置。最后，还有一些其他成分，其主要功能也是塑造这种体裁的阅读主体和使用主体的。例如'To speak of the "Brisbane region" ... is vague indeed'中的"indeed"在表达作者对所述过程不赞成的同时也邀请学生读者从缜密科学家的立场上认同作者的观点。在"it is probable that all four towns would have come within the functional region of Hamilton, a much larger town. Hamilton, in turn, in other fields could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functional region of Auckland, the largest city in New Zealand"中，使用"probable"和"could be considered"的作用在于邀请学生以科学家的身份或态度来参与评价一种假设。另外，语篇中严谨的定义和详细的解释，例如"the boundary of a region can be defined precisely only in terms of one factor, and then only if that factor can be expressed as a quantity"，也都在设定阅读位置的同时强化了体裁的主体位置，即它们一方面指导读者从什么样的角度阅读和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告诉读者谁、什么和以什么方式使用和参与这一体裁和它所代表的社会情景和社会交往。"总之，表述的诉诸性、针对性，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离开这一特征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表述。各种典型

的诉诸受话人的形式、对受话人的各种典型的见解，是各种言语体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特征……说话者对一切语言手段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受到受话人及预见中应答的影响。"(巴赫金，1998a：186)

在每一个时代里，在每一个社会圈子里，在人所成长和生活的家庭、朋友、熟人、同志的每一个小天地里，总是存在着一些权威的、定调子的表述，艺术的、科学的、政论的作品，人们信赖它、引用它、摘录它、仿效它、追随它。在每一个时代里、在生活和活动的所有领域里，都存在着用语言表现和流传下来的一定的传统，如通过作品、表述、格言等等。总是存在该时代"主宰心灵"的某些表现为语言的主导思想、某些基本的任务、口号等等。更不必说学校里读的范文了，它们是孩子们学习母语的第一资料，当然这些范文总是表现情态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的个人言语经验，都是在与其他个人表述的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掌握(或多或少是创造性的掌握)他人话语(而不是语言之词)的过程。我们的言语，即我们的全部表述(包括创作的作品)，充斥着他人的话语；只是这些他人话语的他性程度深浅、我们掌握程度的深浅、我们意识到和区分出来的程度深浅有所不同罢了。(巴赫金，1998a：174—175)

10.2　体裁互文性与主体位置的转换

既然不同体裁具有不同的意义潜势并规定和建构不同的主体位置，那么，语篇的体裁互文性就意味着在一个语篇中发话人在采用不同体裁的同时也在变换自己的主体位置并建构不同的阅读位置。请看下面的例子：

(2) **(Teasing)**
Doctor：That's my light.
Child：/This goes up there./
Doctor：It goes up there. That's right.
(Reporting)
Now while we're examining her head we're feeling for lymph nodes in her neck ... or for any masses ... okay ... also you palpate the midline

for thyroid, for goiter ... if there's any.
(Teasing)
Now let us look in your mouth. Okay? With my light. Can you open up real big? ... Oh, bigger ... Oh bigger ... bigger.

(Tannen, 1993:65)

在例(2)中医生所使用的语言显然属于两种风格和两种体裁，我们将它们叫做“引逗”（teasing）和“报告”（reporting）。从前者的主体位置出发，发话人的语气夸张风趣，目的是引逗儿童患者高兴以便于诊断。“报告”中使用的是针对成年人的结构比较完整复杂的正式语言，其中包含不少医学词汇，目的是让患者的母亲准确了解病情。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发话人在同一语篇中变换体裁和主体位置往往是为了通过(部分)实现这些体裁的意义潜势来完成某些阶段性交际任务，并借此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在例(2)中使用“引逗”体裁是为了换取患者的轻松与合作，以便医生能顺利进行诊断并向患者的母亲“报告”病情。

下面要分析的这个语篇是1996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寄给即将入学的新生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3) **Introducing a tool to make lif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asier, more convenient, and more productive.**

From the desk of:
Shirley A. Nordstrom, U Card Office
May 1, 1996

Dear New Student,

The start of each quarter always brings new faces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our office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with their University ID — the U Card.

I am sending you this package for two reasons:

1) To acquaint you with the **U Card**, your "key to campus".
2) To tell you about **U Card Express**,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your U Card at orientation.

**THE U CARD:
MORE THAN JUST AN ID**

Her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he **U Card** makes everyday life on campus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 You'll use the **U Card** as your student ID to access a variety of University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eat meals in the residence halls, check out library materials, and much more.

* You can choose to use the **U Card** to manage your personal finances. For example, through TCF Bank you can open a U Card checking account, which allows you to use your U Card as a cash card! With a U Card checking account, you can use the card to buy books at U of M bookstores, and your financial aid credit balance can be deposited automatically into your U Card account!

* The U Card can be your link both to home and to friends at other schools because it also works as an AT&T phone card. The U Card's phone rates save you money and its calling limit helps you manage how much you spend on long-distance calls!

Both the TCF checking account and AT&T calling services are optional. However, we've worked hard with our U Card partners to make these services very competitive, and we think you'll find them to be exceptional deals. Please read the enclosed brochure for complete descriptions of these tremendous values.

The **U Card** has been a great team effor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TCF, and AT&T. In fact, we're so confident in the quality of the TCF and AT&T services that we're offering several **FREE GIFTS** to encourage you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utstanding programs ...

* *

**GET A FREE U of M SWEATSHIRT
AND $ 5.00 IN FREE PHONE CALLS!!**

* *

If you choose the U Card checking account, TCF Bank will give you a **FREE U of M sweatshirt**! This high-quality sweatshirt with a bold "M" across the front is great to wear on campus. You'll see lots of your fellow

students wearing these sweatshirts, so don't be left out!

PLUS, if you choose the U Card calling services, AT&T will give you $5.00 in **FREE phone calls!** Make your first call home to Mom and Dad ON US! Or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back home or at other colleges!

Again, these **FREE GIFTS** are being offered to everyone who signs up for the TCF and AT&T **U Card** services. It's a great deal! **Plus**, here's a way to make getting your U Card faster,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

U CARD EXPRESS:
THE EASY WAY TO "GET OUT OF LINE"

Each person receiving a **U Card** will be given information at the time of issuance on **U Card** services. But we know that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during your first days at the University is spend time in a long line.

Here's our solution. If you've already decided to take advantage of both the TCF and AT&T **U Card** services, simply fill out the enclosed **TCF packet by June 14 and return them to us with your photo in the enclosed self-addressed envelope**. Your bank account will be opened for you through the mail — before you even get to campus. Then, just bring a photo ID with you to orientation and you'll be able to pick up your pre-printed U Card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you? No filling out forms in line, no last-minute decisions, and **less time in line to get your U Card.** And all it takes is a few minutes before you come to campus for orientation. IT'S THAT EASY!

THE U CARD:
YOUR ALL-IN-ONE "KEY TO CAMPUS"

Using the **U Card** and its services means that you'll need only **ONE CARD** for **ID**, financial, and telephone uses. Plus, you can avoid many of the hassles of setting up campus checking accounts and long-distance services. In fact, we've even done your comparison shopping for you — see the enclosed brochure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he U Card services stack up to other checking and telephone packages.

We hope you decid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utstanding **U Card** service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us at **612-626-**

9900. Thanks for your time in reading this letter, and from all of us here at the U Card office. **WEL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incerely,
(the addresser's signature)
Shirley A. Nordstrom
Senior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U Card Office
P. S. Remember to complete and return your TCF packet prior to June 14, 1996!

这个语篇的篇幅比较长,它所表现出的体裁互文关系要比例(2)复杂得多,我们从中可以更好地领略发话人如何通过体裁互文性和主体位置的转换来增强交际效果,达到交际目的。总体来看这是一封官方信件,具有书信的主要特征,目的在于通知和指导新生如何领取学生身份证,即U卡。这一交际目的在信的开头就被明确地表达了出来:'I am sending you this package for two reasons: 1) To acquaint you with the **U Card**, your "key to campus". 2) To tell you about **U Card Express**,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your U Card at orientation'。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这个语篇在书信的框架内表现出其他体裁的特征,它更像某家银行写给顾客的一种带有广告性质的金融商务语篇,目的在于提供金融信息的同时推销自己的一种产品和服务。语篇具有广告的所有主要特征: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名称和内容、解释为消费者所能带来的利益并暗示拒绝这种产品和服务可能导致的损失等。

如前所述,不同体裁在这个语篇中的混合意味着它的作者需要不断变换主体位置。首先,作者从学校的官方立场说话。例如信件的第一句话:"The start of each quarter always brings new faces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our office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with their University ID, the U Card",和最后一句话:"Wel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在这个特定的交际场合"our office"一词最有可能指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部门,它在代表学校向新生表示欢迎。然而,语篇的其

他部分表明"our office"代表的很可能是独立于大学的某家银行。请看下面这句话："The U Card has been a great team effor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TCF, and AT&T"。此处，"TCF"（TCF Bank Minnesota fsb）显然与"the university"和"AT&T"（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并列，具有相互独立又合作的地位。因此，这封信的作者实际上在代表一家金融机构说话，为新生提供一些金融信息。最后，作者以广告者的身份在为她所代表的银行推销产品和服务。在前两个主体位置上，无论是代表学校还是代表银行，作者都是以信息提供者的权威身份说话，然而在第三个主体位置上，她是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推销者的身份出现，相对于消费者已不再具有权威或权力。综上所述，这个语篇的互文性迫使作者在语篇中建构不同的主体位置和阅读位置，它们不可避免地将作者和读者置于矛盾的境地，使之在权力者和无权力者之间不断变换位置。作者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和行为的指导者处于权威地位，而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推销者在通常具有买方市场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中又只能处于无权力的地位。另一方面，学生读者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或受指导者（尤其是相对于学校）处于无权力地位，但是一旦被视为潜在的消费者，他们便处于权力者的地位。

整个语篇中语言形式的选择充分反映了作者和读者这种在不同体裁的主体位置和阅读位置之间的相互转换和双方各自身份的矛盾性。我们已经提到，在语篇的第一个句子中作者代表学校，处于权力者的位置。其他的例子还有"Please read the enclosed brochure for complete descriptions of these tremendous values"，"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us at 612 - 626 - 9900"和"Remember to complete and return your TCF packet prior to June 14, 1996!"等。在这些话语中作者均从信息提供者或指导者的立场出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知情者的身份说话，使用的语言比较正式且都是祈使句。另一方面，语篇中的许多地方又体现出广告这种体裁的意义潜势和使用惯例。例如语篇作出了许多有关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的承诺并不断许诺它们将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语篇的题目是对这些承诺和利益的概括："Introducing a tool to make lif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asier, more convenient, and more productive"。其他的例子包括"It's a great deal!","However, we've worked hard with our U Card partners to make these services very competitive, and we think you'll find them to be exceptional deals!","In fact, we're so confident in the quality of the TCF and AT&T services that we're offering several FREE GIFTS to encourage you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utstanding programs ..."。广告常常暗示消费者拒绝接受某种产品或服务可能将遭受的损失,这个语篇也不例外。其实,强调接受某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好处也就是在暗示如果消费者拒绝它们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例如前文提到的该语篇的题目显然是在暗示"如果没有这个工具,你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生活就会困难,就会不那么方便和有所建树"。另外再请看语篇中的下面这段话:

(4) If you choose the U Card checking account, TCF Bank will give you a **FREE U of M sweatshirt!** This high-quality sweatshirt with a bold "M" across the front is great to wear on campus. You'll see lots of your fellow students wearing these sweatshirts, so don't be left out! PLUS, if you choose the U Card calling services, AT&T will give you $5.00 in **FREE phone calls!** Make your first call home to Mom and Dad ON US! Or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back home or at other colleges!

这段话向消费者许诺了一些接受这项服务所能带来的附加好处。作者当然也是在告诉读者如果拒绝它就会失去这种好处并蒙受不利的后果,即拒绝者就会在同伴中显得不合群,就不能享受免费向父母打第一个电话的快乐等。除了这些广告式的对产品的介绍、宣传与承诺,语篇中的许多地方使用的语言也有明显的广告色彩。例如使用缩写(U Card,TCF,AT&T)、加强语气的副词(so,more, even)、评价性词语(great,exceptional,outstanding,high-quality)、省略句等。直接使用"you"来称呼读者也是广告惯用的手法(Fairclough, 1992:115),它有助于增强语言的口语化,拉近产品推销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在语篇的某些部分作者对自己和读者的位置显得有些犹豫不定,或者故意模糊不清。例如:

(5) Each person receiving a **U Card** will be given information at the time of issuance on U Card services. But we know that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during your first days at the University is spend time in a long line.

(6) Here's our solution. If you've already decided to take advantage of both the TCF and AT&T **U Card** services, simply fill out the enclosed **TCF packet by June 14 and return them to us with your photo in the enclosed self-addressed envelope**. Your bank account will be opened for you through the mail before you even get to campus. Then, just bring a photo ID with you to orientation and you'll be able to pick up your pre-printed U Card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7)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you? No filling out forms in line, no last-minute decisions, and **less time in line to get your U Card**. And all it takes is a few minutes before you come to campus for orientation. IT'S THAT EASY!

上面这三个段落构成语篇中的一个完整部分，小标题叫做 U CARD EXPRESS：THE EASY WAY TO "GET OUT OF LINE"。在这一部分的第一段直到第二段的第一句话，作者显然是把自己定位为信息的提供者和问题的解决者，而把读者设定为需要信息和帮助的人。但是在第二段的其余部分和整个第三段，作者又似乎采用了广告的体裁，从而双方的地位也随着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即作者的身份有所降低，而读者的身份有所提高。例如在第二段的第二和第四句话里作者使用的是祈使句，要求读者做某事，但她同时分别使用了"simply"和"just"两个词；另外，她还在第三段的第三句话里使用了"all"。这三个词经常出现在广告中，作用是缓和语气，削弱发话人的权威，从而提高受话人的地位。在我们分析的这个例子中这些词强调的是接受文中所提的产品和服务的程序有多么简单省事，正如作者所说："IT'S THAT EASY!"言外之意是推销者要求消费者做这么一点点事情实在不过分；考虑到这种产品和服务所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方便与好处就更是如此了。

10.3 结语

本章的分析表明，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潜势，这种意义潜势在话语的生成过程中通过所建构的主体位置和阅读位置体现在具体的语篇中。语篇的互文性意味着发话人通常需要在同一语篇中经常变换其主体位置以便实现不同体裁的意义潜势。语篇中的互文关系和与之伴随的主体位置转换最终都可以从实现交际意图或达到交际目的等语用方面加以考察和解释。

第十一章
“话语殖民”、“话语霸权”和体裁互文性

在批评语言学里人们经常使用“话语殖民”(discourse colonization)和“话语霸权”(discourse hegemony)这两个词来比喻不同体裁或“语类”(discourse type)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以及某一体裁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强势地位。这种影响与渗透表现在语篇中就是“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即不同体裁、语域或风格特征在同一语篇中的混合和相互作用。本章首先通过对具体语篇的分析展示体裁互文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及其与体裁互文性的关系，最后谈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侵入和由此引起的体裁互文性。

11.1 社会意识形态与体裁互文性

体裁互文性有时也被称作“结构互文性”(interdiscursivity)(Fairclough，1992)，这第二个名称可能来自柏瑟(Pêcheux)的“互文话语”(interdiscourse)。柏瑟(1982)认为每一种“话语形态”(discursive formation)都处在相互关联的话语形态场中，他把这种场叫做“互文话语”。在一个互文话语里，一种话语形态所包含的那些具体意义由它与其他话语形态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而特定时期的某一特定互文话语的状态，即它包括哪些话语形态以及这些话语形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则取决于当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状况。柏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体裁互文性与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下面让我们通过

分析两个医学语篇来看看这种联系。第一个来自弥施勒尔(Mishler,1984),其中的省略号表示沉默,冒号表示音节的拉长,大方括号表示话语被打断或重叠处,圆括号表示其中的话语不清楚。整段话分为九个部分,每一部分大体相当于辛克莱(Sinclair)和库塔德(Coulthard)体系(Coulthard,1992:1—35)中的"回合"(exchange)。第二个语篇来自坦尼恩(Tannen)和华莱特(Wallat,1993:71),省略号和大方括号表示的意义与第一个中的相同,斜线表示它们之间的文字不一定准确,符号"#"表示话语被打断处。

(1) I. D: Hm hm ... Now what do you mean by a sour stomach?
P: ... What's a sour stomach? A heartburn like a heartburn
or someth⌈ing
II. D: ⌊Does it burn over there?
P: Yeah
It li- I think- I think it like- If you take a needle and stick
⌈ya right⌈... there's a pain right here⌈...
D: ⌊Hm hm ⌊Hm hm ⌊Hm hm
P: and and then it goes from here on this side to this side.
III. D: Hm hm Does it⌈go into the back?
P: ⌊It's a:ll up here. No. It's all right
⌈up here in the front.
IV. D: ⌊Yeah And when do you get that?
...
P: ... Wel:l when I eat something wrong.
V. D: How- How
soon after you eat it?
P: ... Wel:l
... probably an hour ... maybe⌈less
D: ⌊About an hour?
P: Maybe less ... I've cheated and I've been drinking which
I shouldn't have done.
D: ...
VI. D: ⌈Does drinking make it worse?
P: ⌊(...) Ho ho uh ooh Yes ...
... Especially the carbonation and the alcohol.
VII. D: ... Hm hm ... How much do you drink?
P: ...
... I don't know ... Enough to make me go to sleep at
night ... and that's quite a bit.

D：One or two drinks a day?
P：　　　　　　　　　O：h no no no humph it's
(more like) ten. ⌈... at night.
D：　　　　　　　⌊How many drinks- a night.
P：　　　　　　　　　　　　　　　At night.
D：　　　　　...
VIII.　... Whaddya ta- What type of drinks? ... I⌈(...)
P：　　　　　　　　　　　　　　　　　　⌊Oh vodka
... yeah vodka and ginger ale.
D：　　　　　...
IX.　... How long have you been drinking that heavily?
P：... Since I've been married.
D：... How long is that?
P：　　　　(giggle ...) Four years. (giggle)

(2) D：Jody? ... I want to look in your ears. ... Jody?
M：This problem that she has, ... is not ... interfering with her breathing, is it?
C：/Hello/ [spoken into ophthalmoscope]
D：No.
M：It just appears that way?
D：Yes. It's very ... it's ... really ... it's like floppy you know and that's why it sounds the way it is.
M：She worries me at night.
D：Yes.
M：Because uh ... when she's asleep I keep checking on her so she doesn't
D：　　　　　　　♯As you know the important
M：　　　　　　　　　　　　　　　　♯I keep
thinking she's not breathing properly. [spoken while chuckling]
D：As you know,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she does have difficulty with the use of her muscles.
M：　　　　　　　　　　　　　　mhm
D：So she has difficulty with the use of her muscles, ... as far as the muscles of her chest, that are used with breathing. Y'know as well as the drooling, the muscles with swallowing, and all that⌈so all her muscles
M：　　　　　　　⌊Is there some exercise
/to strengthen or help that/.

例(1)是一个标准的传统诊断语篇(medical interview),医生 D 在交际中占主导地位,控制着话题和话轮(turn-taking)。每一个回合由医生开始和结束,他根据诊断的需要放弃和收回话轮,几个回合的基本结构是:医生提问——患者回答——医生对回答做出某种反应。医生通过提问引入话题,一旦认为获得了足够的相关信息便立即改变话题,患者 P 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例如在第 21 至 24 行,患者承认自己饮酒过量是错误的,但医生打断了她的话并改变了话题;在 29 至 30 行以及 42 行,患者显然试图讲述一些相关的事情或个人问题,但医生并不理睬,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控制着话语的内容。总之整个语篇给我们的印象是,医生为患者诊断时似乎有一套常规程序,他一步一步地按程序行事,只要认为获得了足够的相关信息,他就不会轻易让患者继续自己的话轮。

在例(2)中医生 D 边为一名儿童患者 C 诊断边向其母亲 M 讲述病情并回答她提出的各种问题。这虽然也是一个诊断语篇,但它在形式上似乎介于传统诊断语篇和协商语篇(counselling)之间,是两者的混合。它具有"小组疗法"(group therapy)的会话特征,医生通常并不着意控制话题和话轮,而是给患者充分的说话机会并通过对其话语做出同情的反应来鼓励他们倾诉病痛和烦恼。从例(2)可以看出,话题与话轮主要由患者的母亲控制,她提出问题,医生做答;在第 14 和 23 行她甚至不理睬并打断医生的话语,继续自己的话题。医生几乎完全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受话人位置,而且还在第 10 行用"yes"来鼓励对方讲下去。当然,例(2)也保留着传统诊断语篇的一些特征。例如在第 1、5 和 13 行医生试图行使控制权;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使用"I want to"和"as you know"这样的短语来缓和语气,削弱自己话语的权威性。

我们对例(1)和(2)的分析表明,在当今医学语篇中存在着一种新型的诊断语篇,它兼有传统诊断语篇和协商语篇的部分特征。它的出现和存在跟标准的传统诊断语篇一样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现状和变化相关。例(1)代表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和他在患者面前的言行上,例如对话题和话轮的控制、语气和眼神、诊断时摆出的姿势、与患者的距离以及触摸的部位和方式

等。按照这种科学精神，患者通常只被看作一个病例，而不是活生生的人(Emerson,1970)。例(2)体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按照这种价值观，医生把患者视为一个人而不是病例，并鼓励他在诊断和治疗中积极配合与合作。医生不再高高在上、令人敬畏，而是显得和蔼可亲，像一位普通的会话者一样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例(2)代表的诊断体裁尊重个人的价值，符合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11.2 "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

"霸权"本来是一个政治术语，指在经济上取得决定性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把其影响和控制扩张到整个公民社会或国家，并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过程。(Gramsci,1971)霸权也叫"盟主权"，其实质是建立同盟，是通过做出让步或采取意识形态手段来谋取从属阶级对支配和控制的认可。格兰姆西认为取得权力和控制的途径有两种：通过武力"压制"(coercion)和通过意识形态手段谋取"认可"(consent)。虽然他承认前者在许多情况下的有效性，但特别强调由话语传播的意识形态对维护权力的作用，认为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只靠暴力来持久地维持支配地位。霸权需要把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群体和派别整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集团并将一种道德价值体系推广到整个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去，从而使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反映的是全社会的意志。这种推广主要通过话语实现。

克莱斯(1985)指出，"话语"(discourse)①具有扩张性，它们不仅

① 克莱斯的"话语"基本与"话语类型"(discourse type)或"体裁"(genre)同义，指的是表达某一社会制度或机构的一组系统性的陈述："机构和社会群体拥有具体的意义和价值观，它们以系统的方式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我把这些有系统的说话方式叫做话语。"(1985:6)"一种话语提供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一组可能的陈述，组织和安排谈论具体话题、事物和过程的方式，为社会和个人行为作出描述、规则、许可和禁止。"(1985:7)

试图解释一种社会机构直接关注的领域，而且也试图不断扩展其解释领域："我用来解释话语作用的一个比喻就是一支军事力量，它以占领相邻地带来对边界冲突做出反应。随着冲突的持续，更多的区域被占领，然后被定居和殖民。从一个机构的角度看，一种话语就像帝国主义一样对社会领域进行殖民。"(p.7)体裁的分类与社会群体或机构的分类密切相关。某一群体或机构垄断一种(些)体裁的使用，另一群体垄断另一(些)体裁。其结果是，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修辞方式、使用规则和惯例等；它们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社会群体或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殖民和话语霸权指的是一种话语的体裁特征向其他体裁或语类的渗透，从而使属于后者的语篇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前者的体裁特征。这种殖民和霸权通常反映当时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发展变化趋势。请看下面的例子：

(3) The vocational preparation *product* is usually a programme. It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re therefore central parts of the *marketing* process, and should start from the needs of potential *customers* and *clients* and the benefits for which they are looking.

(*Further Educational Unit*, 1987: 51)

这是一个教育语篇(educational discourse)，但却点缀着一些经常出现在商业语篇中的词汇，例如，作者用"product"代替"course"，用"customers"和"clients"代替"earners"。韩礼德(1978)把这种现象叫做"重新词化"(relexicalization)。上面例子中的重新词化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教育的商品化。商业语篇的各种特征不仅出现在教育语篇里，在其他非商业语篇中也相当普遍：

(4) These are comical anecdotes: comical precisely because such incongruous instances of mistaken reference and force are rare. And indeed in most of our daily transactional uses of language we are also contracted into the schematic conventions which define them that we can fairly confidently count on an unproblematic convergence of in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t is hard to see how social life would be possible otherwise.

(Widdowson, 1995a: 165)

这是一部语言学著作中的一段话；像“transaction”或者“transactional”这样的原本属于商业领域的词汇经常出现在当今讨论言语交际的语篇中。这种现象反映了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语篇的“霸权”地位(Gramsci,1971;Fairclough,1992,1995)和对其他语篇类型的“殖民”趋势。(Habermas,1984;Kress,1985)这正如巴赫金指出的那样，“言语体裁能比较直接地、敏锐地、灵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表述及其类型即言语体裁，是社会历史到语言历史的传送带。”(巴赫金，1998a:147)商业语篇在社会的话语秩序中取得的这种主导地位也会反过来强化商业思想和促进商业活动。上面的两个例子表明，这种霸权和殖民往往导致不同体裁的典型特征在同一语篇中的混合或交叉使用，即导致语篇的体裁互文性。

11.3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话语殖民”这个概念可能最早起源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现代社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公共领域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有不断扩大加强的趋势。哈贝马斯(1984)把这种趋势表述为国家和经济“制度”(system)对“生活领域”(life world)的殖民化。生活领域指的是言语交流的语境，它“处在每一位参与交流的人的背后并支撑理解过程。”(p.70—71)“共享的生活领域提供一个不受质疑的文化习俗的仓库，交流的参与者借助共同接受的释义模式来理解话语。”(Habermas,1990:135)制度与生活领域相对应。社会制度，尤其是像经济和政府这样的子系统，是正式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其中的社会关系分别主要通过金钱和权力来调节和控制。

生活领域和制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方面，就物质生产(经济)和组织结构(政府)而言，生活领域依赖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行政管理制度都根植于生活领域，依赖其中的个人技能和动机以及公众对制度的信赖和忠诚。在生活领域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中会出现某些对

社会理性化过程(rationalization)的干扰,哈贝马斯最关注的是制度对生活领域的侵人:“各种形式的经济和行政理性化渗透进那些抵制金钱和权力控制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专门从事文化的传播、社会的统一和谐以及儿童的教育培养,它们始终依赖相互理解作为协调行为的机制。”(1984:330) 制度对生活领域的侵人是“对传统生活形式的破坏,对生活领域交往的基础结构的攻击,对日常实践的僵化片面的理性化。”(1982:281) 作为证据,哈贝马斯考察了德国社会法律对以言语交流为基本特征的那些行为领域(如家庭和教育)的渗透,指出法律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具体地干预着人们的生活。

费尔克劳(1992)称之为“话语技术”(discourse technology)的现象也是制度侵人生活领域的典型例子。他列举的话语技术包括会见(interview)、教学、咨询和广告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话语技术越来越由指定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机构的环境中实施。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例如调查研究其效率的人员、根据调查结果和不断变化的要求来制定改进措施的设计人员以及负责传授技术的培训人员。“话语的技术化”(technologization of discourse)构成福柯称之为“生物权力”(biopower)的一种形式:“人体进人了一种探索它、分解它和重组它的机器……这种机器确定一个人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躯体以便使这些躯体不仅按照控制者的意愿而且还能根据其确定的技术、速度和效率来行事。因此,通过训练能生产出服从和熟练的躯体,‘驯顺’的躯体。”(Foucault,1979:143)话语的技术化是现代社会追求理性化这一普遍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单个要素都日益被修理得适合其整体,个体越来越被纳人这样一个社会整体,它不接受任何承认个性的传统思想。个人是如此地依赖于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秩序以至于他们的能动性、自主性和独特性或者受到压制或者被完全泯灭了。文化行业和传播媒体通过不断肯定现存秩序为社会的这种理性化和一体化推波助澜。

哈贝马斯(1984/1989)对生活领域和制度做了重新区分,把它们叫做“私人领域”(the private sphere)和“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前者主要以家庭、消费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化为核心，后者主要围绕着大众文化媒体。克莱斯(1986)指出，私人领域"存在于(更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外，是个人的领域，是社会之外的领域，是超越社会偶然性的个人自由的领域，是允许个人情感表达的领域。那么，公共领域就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活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扮演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来行动的。所以，在这一区分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即私人领域超越(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p.400)克莱斯认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权力。把某一事件归于私人领域就是要从私人而不是社会的角度来对它作出解释，就是要表明这件事与权力无关，个人要承担全部责任。把某一事件归于公共领域意味着它超越个人的责任，属于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的范围。克莱斯还将口语风格和书面语风格分别与这两个领域相联系，认为口语主要是私人领域的表达形式，在这里存在着共享的意义和价值观体系，但却没有悬殊的权力差异。书面语则主要用于存在显著权力差异、缺乏共同意义和价值观体系的场合，它是公共领域的典型表达形式。

11.4 公共语篇、私人话语和体裁互文性

随着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和干预，现代社会的私人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原本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事情往往被媒体纳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语篇的话题，从而产生许多不同话语体裁和语言风格特征在同一语篇中混合的例子。例如：

(5) "I WANT A QUICK DIVORCE. I DON'T WANT TO BE QUEEN. I WON'T FIGHT FOR MY BOYS"

(*News of the World*, January 10, 1993)

这是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I"指的是英国前王妃戴安娜。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大众媒体是如何把社会生活中的公与私的界限给模糊了。从报道者的立场看，王妃的婚姻状况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理

应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是如果站到王妃的立场上，这却主要是关系到她个人自由与幸福的私事。语篇使用的语言反映了这一事件的两重性。一方面，文章的标题模仿王妃在非正式场合说的话，具有口头语言的典型特征，如遣词造句非常简短、使用缩略形式等。在这篇报道的前一页上还以整个版面登载着戴安娜王妃的另外两句话：

(6) "MY SONS ARE THE ONLY MEN IN MY LIFE WHO HAVEN'T LET ME DOWN" "I WANT OUT OF THIS MARRIAGE ONCE AND FOR ALL, SO I CAN GET ON WITH THE REST OF MY LIFE"

报道称这两句话是王妃私下对朋友说的。例(6)的语言风格和例(5)如出一辙。另一方面，从整体看，报道的正文具有英语新闻体裁的典型结构特征，语言风格基本属于书面语。请看文章的开头几段：

(7) The agonizing decision, said to have been made after weeks of torment, will at last allow her freedom away from the control of Buckingham Palace.

The move — which follows the official separation in November — ends speculation that the Royal couple could ever reign as king and queen.

For despite Premier John Major's assurance that Diana could still sit on the throne, the Princess herself has accepted there is no longer any future for her at the Palace.

She is understood to be pushing hard for a divorce and has not rule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life abroad.

与例(5)和(6)相比，(7)中的语言要正式得多，例如句子比较长且结构复杂，使用了许多抽象名词短语(如"the agonizing decision"，"the official separation"，"Premier John Major's assurance"，"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life abroad")。这些短语是通过口语中少见的复杂的结构转换(即"名物化"(nominalization))生成的。

语言风格与体裁具有密切的联系，不同体裁往往要求不同的语言风格特征，因此当一个语篇呈现多种语言风格时会引发读者对不同体裁意义潜势的联想，这构成体裁互文性的一种重要语用功能。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8) **Dads' kilty secret**

MEN can stop themselves becoming sterile by wearing kilts, experts claim.

Infertility has risen in Scotland since blokes switched from traditional Highland wear to tight jeans and y-fronts which restrict circulation.

More than one in six couples there have trouble conceiving. One expert said: "The kilt's demise led to an almost parallel increase in male infertility."

Mary McGhee, a Glasgow infertility counselor, added: "The warning against tight jeans isn't an old wives' tale. Kilts are healthier."

(*News of the World*, January 10, 1993)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可以辨别出数种语言风格和体裁。从内容看，本文的主题(即"what people should wear")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但这里却被当作了一个公共话题。从语言风格看，标题中使用的"dads"和"kilty"两个词模仿的是儿童说话的语气，"secret"这里所指的事物显然属于私人领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正文中引用的话语全部出自那些有社会地位扮演重要社会角色的人物之口，他们不是作为生物个体而是作为行业或公共领域的代表或专家被引入交际过程的。除标题之外，全文的语言兼有新闻语篇和科学语篇的风格，语气严肃庄重，使用了不少专业词汇(如"demise"，"sterile"，"infertility"，"conceiving")。

例(8)表明了新闻媒体如何把私人领域的话题纳入公共领域，用公共领域的体裁加以处理。当然，话语殖民不只是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后者的各种体裁也可能被用来谈论公共领域的事物。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属于私人领域的会话式语言风格和惯例[①]正在不断向公共领域渗透。费尔克劳(1992)把会话体裁向公共领域的扩张叫做公共语篇的"会话式非正式化"(conversationalization)："不断增强的非正式化的一种主要表现是会话式话语已经并正在从它属于的个人交往的私人领域投射到公共领域。会话正在侵入媒体、各种各样的专业/公共话语、教育等等；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它们的语篇越来越具有会话特征。这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重大的边界调整的一部分。"(p. 204)今天，几乎没有哪一个公共领域的语篇不受到会话风格的影响或渗透，我们只要留心一下今天各种政府机构与公民

① 克莱斯(1986)把"会话"看作一种"确确实实的私人体裁"(p. 415)。

之间、企事业和商业机构与委托人、顾客和广大消费者之间交流方式的逐渐而微妙的变化，就不难发现会话体裁在公共领域和制度化语篇中不断扩大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出社会权力机构或权力者希望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最大限度获得他们的拥护与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民主化趋势。

会话式语言突出交流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不拘礼节，它是私人间而非社会角色间的交谈方式。克莱斯指出，会话“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平等的权力关系，使用的是最典型的口语”。(1986:415) 会话体裁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暗示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和一种共享的不需验证的主观现实；在会话交流中经验世界被分类成共识性的范畴，这些范畴又反过来变成了不会引起任何争议的会话背景知识。这就是会话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将表现现实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所代表的那些范畴“自然化”(naturalization)。伯杰(Berger)和卢克曼对会话体裁的社会功能有这样的论述：“维持现实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会话。人们可以把个人的日常生活看作一个会话机制的运作，它不间断地维持、修改和调整他们的主观现实……一般说来，这个会话机制通过谈论各种构成经验的成分并在现实世界给它们安排确定的位置来维持现实……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是如何物化世界、把杂乱无章的经验转化为一种连贯的秩序的。在建立这一秩序中语言在理解和生成话语的双重意义上建构了一个世界。会话在个人存在的面对面的情景中使语言的这种建构功效得以实现。在会话中被语言物化了的东西变成了个体意识中的客体。”(Luckmann，1966：172—173) 因此，如果说语言通过会话物化世界、维持或改变社会，那么公共语篇的会话式非正式化就不仅是社会关系民主化的反映而且也是其推动力量，并会逐渐在人们的主观现实中使这种关系自然化。

11.5 结语

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在言语交际领域得到反映并可能引起话

语秩序的重新安排和各种体裁或语类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一些体裁会暂时处于优势或霸权地位，对其他体裁进行殖民扩张，而这种扩张又会反过来强化这些体裁所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促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例如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增强，商业语篇已经取得霸权地位，并不断侵入其他体裁。而这种侵入又帮助增强整个社会的商业意识，促进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业语篇进一步获得霸权。托德络夫(Todorov)对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秩序的辩证关系有这样的论述："一个社会选择和编码最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那些言语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体裁在一个社会中的存在和在另一社会中的不存在表明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并使我们能够相当肯定地确定它。史诗能够存在于一个时代，而小说存在于另一个时代(后者中的个体英雄与前者中的群体英雄形成对照)并不是偶然的；每一种这样的选择都取决于它所处的意识形态结构。"(1976：164)既然一种体裁的有与无或兴与衰取决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对体裁互文性的分析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种体裁在特定历史阶段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之间的联系。

第十二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批评语言学和此后的批评性语篇分析(CDA)把传统上主要以文学语篇为对象的文体学分析技巧广泛应用于对非文学语篇的分析中，特别重视语言/语篇和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作为语篇分析的一种方法，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其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它的局限性已经有所认识。例如福勒就指出，批评语言学依然存在着一些主要问题，如示范性的分析往往零散不完整、对语境上下文和分析方法注意得不够等。(1996:8—12)对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批评更多来自这个圈子之外，这些批评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似乎比较苛刻，反映了批评者对它们过高的期望。在这一章里我们以斯塔布斯(Stubbs,1998)针对CDA提出的11个问题作为主要线索，结合威窦森(Widdowson,1995a,1995b,1996,1998,2000)在有关问题上的观点，谈谈自己对这些批评的看法。下文的第1小节讨论的是11个问题中的头2个，而第3、第8、第10和第11个问题则被直接用作第2至第5小节的标题。最后我们对剩下的其他几个问题也作了简单的说明。

12.1 语篇分析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解释的权威性来自何处？

斯塔布斯提出的头两个问题的原话是"CDA以什么作为评价语篇分析的标准?"和"CDA的解释权威性来自何处?"。显然这是两个

一般性问题，它们几乎涵盖了后面 9 个问题的大部分内容，包括人们普遍关心的批评性分析的"明晰性"（explicitness）、"客观性"（objectivity）、"可靠性"（reliability）和"可验证性"（testability）等问题。

在 Q1 之下斯塔布斯问道："CDA 如何经得起这样一些标准的评价？例如潜在假设的明晰性和可验证性、分析方法的可重复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语料的全面性和代表性。"（1998：103）他指出，CDA 从未说明语篇的形式特征与对它们的解释（interpretation）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费尔克劳和福勒一方面列出一些可能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结构并在实际的分析中作为参照，另一方面又声称"在语篇结构和其社会意义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后者取决于前者出现的语境和运用它的目的。"（1991：90）斯塔布斯评论道，"如果不能从语篇直接读出意识形态，那就是分析者根据自己拥有的未加说明的知识把这种意义塞进对语篇的理解中的"。（1998：103）这就导致了 Q2：CDA 的解释权威性来自何处？斯塔布斯指出，"CDA 告诫我们，没有纯粹的事实和不偏不倚的语篇，并强调历史和个人观点的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不偏不倚的语篇，那就意味着 CDA 自身不会是例外，它做出的解释也体现着利益。"（1998：104）威窦森也多次对 CDA 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提出挑战，例如："但是我已经表明，对某一特定立场的坚持和对特定阐释的优先考虑实际上损害了 CDA 作为一种分析的有效性。"（1995a：170）

斯塔布斯在 Q1 和 Q2 中提到的这些问题以及威窦森对 CDA 客观性的质疑是任何语篇分析都要认真对待的，其中有些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我们想说的是，CDA 特别重视语篇及其生成者的历史背景，并在其理论中强调读/听者自身历史性在理解和解释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没有错。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分析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自己的立场观点。语篇分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语篇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而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问题可以说是哲学和阐释学乃至一切人文科学中一个永恒的问题。

西方传统解释学将人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要克服读者的偏见和误解，以便

越过"现在"的障碍，去把握作者的原意。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对待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认为理解并非一个复制过程，理解总是以读者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历史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作者还是读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他们根本无法消除自己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这一历史性。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唯有偏见才能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the fuison of horizons)，即通过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理解对象的过去视域相融合，从而拓宽并超越二者各自的视域，达到一种新的视域。可见，客观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任何分析者都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来理解和解释语篇。

福勒关于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某一语言结构孤立来看或许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出现于特定的语境中，或者由于在一个语篇中的使用频率过高，或者与其他结构发生联系，便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说，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取决于语言形式出现的上下文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批评性语篇分析必须将语篇及其描述的事情与它们出现的社会生活场景相联系，才能真正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12.2　关于混合型语篇(mixed texts)的描写有什么主张？

费尔克劳认为当代语篇往往是不同体裁特征混合的结果，CDA应重视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分析："语篇传统和话语秩序的飞速变化和重组是当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表明互文性应该是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焦点。"(1992:102)但是斯塔布斯(1998)指出，"费尔克劳在这个领域没有做出精确的分析。他指出了一个基本是可以量化的现象，但却没有提供对具体语篇的定量分析，没有不同

语篇或者语篇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定量的历时研究来表明语篇的异质性增加了，也没有测算语篇异质性的方法。"(1998:104)

姑且不论斯塔布斯的指责是否属实，文论家很早以前就开始质疑对互文性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虽然对某个语篇中互文关系的一种建构可能会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是任何这种建构都产生于某种阅读目的或兴趣。这意味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其次，根据克丽丝蒂娃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Frow，1986:155)因而库勒指出，互文性分析处于两难的境地：它"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语篇空间，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时，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出。"(Culler，1982:109)

弗罗指出，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并不那么重要，"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1986:157)弗罗的意思是，互文性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体系或者语篇序列，"它只能是对建构某种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例如其效果、带来的快乐、产生的说教或政治兴趣)的一种评价。"(同上)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这种分析并不一定必须是定量的，定性分析也许更有意义。

12.3　语篇、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费尔克劳一再强调对语篇生成和接受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的重要

性，但是斯塔布斯指出，“分析读者的接受情况在媒体研究中很常见，但在 CDA 中却不常见。另外，解释权威性的两个可能来源，即语篇和读者的问题，没有得到 CDA 的处理和解决。”(1998:106)我们不完全清楚斯塔布斯第二句话的意思，因为虽然 CDA 对读者及其对语篇的接受情况的分析的确做得不够，但对语篇本身的分析却不少。威窦森对 CDA 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但他的一些观点有时令我们困惑不解。例如费尔克劳在分析一个语篇片段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传递过去的是能消除孕妇疑虑的保证，即产前护理期间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92:171—172)威窦森对此作了如下评价："费尔克劳怎么知道这个语篇的读者(消费者)就会因此消除疑虑？……'保证'(reassurance)是一种'言后效果'，要弄清是否真的达到了这种效果的惟一途径就是问一问这个语篇针对的读者，即那些孕妇们。人们甚至还可以问一问作者，这是否就是他意欲达到的效果。”(1996:63)

在对语篇进行理解和解释时尽可能尊重其生成者的用意和原始读者的反应是应该的，但是威窦森的上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应该受到质疑。首先，对语篇的生成或接受过程的分析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析者必须找到语篇的生成者或者其原始读者来核实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其次，就算有条件对读者的反应进行调查，其结果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同一语篇的理解和解释几乎不可能完全相同。语篇分析者通常受过良好的训练，具备相当的语言学和语用学知识，他们要比普通读者对语言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因而能从语篇中读出更多更深的含义，尤其是那些常人不太注意却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意义。

威窦森觉得没有必要对语篇进行深入细致的批评性分析，例如他在评论费尔克劳(1992)时有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都太吹毛求疵了。把语篇分析得如此支离破碎是不公平的，因为读者通常不会这样做。读者通常寻求合作，而不会如此刨根问底地去阅读语篇。他们往往注意的是语篇的要点，而不会留意这些细枝末节，更不会从中推导出这种论证上的前后不一和疏漏不当之处。”(1995b:512)这恐

怕不会是威窦森的一贯思想，因为众所周知，虽然人们的日常阅读活动往往的确是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的，但是当语篇分析者对某个语篇进行有系统的分析，以便支持或反对某个理论或观点，或者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时，他们却不应该只满足于像一般读者那样来对待他们所分析的语篇。

12.4 语料是如何筛选的？是否具有代表性？

斯塔布斯觉得 CDA 的语料分析在数量上远远不够："简而言之，这里的批评是，分析的材料不多。一般说来，几乎没有讨论过局限于短短的语料片断的分析是否充分，语料应该如何筛选，选择的语料是否有代表性。对语料片断的分析没有任何关于其代表性的说明。"(1998:107)威窦森也对语料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这是从特定视点做的有偏颇的阐释。说它偏颇有两层意思：首先，它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有偏见；其次，它选择分析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爱的解释的那些特征。"(1995a:169)

对于斯塔布斯和威窦森的质疑我们有三点评论。首先，CDA 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分析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事实上，CDA 从一开始就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客观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更不会有不偏不倚的语篇分析："分析不是，也不会是，'中性的'。其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意义正在于采取一种立场。"(van Dijk, 2001:307)彭尼库克(Pennycook)在评论"应用批评语言学"(applied critical linguistics)的性质时认为，与其把它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种替代方法不如将其视为"带有倾向性的应用语言学。"(2001:176—177)同样，我们也可以把 CDA 看作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语篇分析方法。其次，在 CDA 中很可能正如威窦森批评的那样，存在"有选择地运用语篇的语言特征来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选择语料不带先人之见是不可能的，正如莱昂斯(Lyons)指出的，"资料的选择通常取决于科学家想要验证的某个假设，无论这个假设是如何获得的。"(1981:43)

最后，斯塔布斯和威窦森都认为 CDA 的语篇分析往往零散、不全面、不完整，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如果把分析理解为在一个综合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描写，那么这些论证仅仅是解释，而不是分析。这些论证既带有偏见又支离破碎。”(1995b:513)关于理论框架问题，CDA 的确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采取了拿来主义。福勒、费尔克劳和克莱斯等 CDA 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认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适合于 CDA，应该作为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源。至于它在 CDA 中被应用得如何，那就因人而异了。至于“零散、不完整、不全面”的问题，我们只想说，对任何语篇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都是不现实的，分析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论假设和交际意图来有选择地对语篇的形式特征做出分析。有斯塔布斯和威窦森本人的分析为例。威窦森(1982)对 Philip Larkin 创作的 *Mr. Bleaney* 这首诗进行了分析。尽管全诗总共只有 28 行，但分析者也没有试图进行任何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分析，而是一开始就宣布：“我的观点是，对这首诗的欣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某些语法特征的独特之处的理解。这些独特之处与人称、时态和条件句有关。”(1982:19)这里威窦森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又阐明了选择的分析范围，对后者的分析显然是为了说明或支持前者。斯塔布斯(1998)在列出了 CDA 存在的 11 个问题之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改进建议，并通过对具体语篇的分析来例示这些建议。遗憾的是，他的分析也不得不对语篇的形式特征进行非常有限的选择性分析。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在一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对语篇和语料做详细的分析。然而，我可以表明论证的形式，提供可以参考的文献，并概括它们的联系。”(1998:111)问题是，被他批评的 CDA 学者可以有同样的理由采取同样的做法。

12.5 与其他语言和认知的建构理论有何关联？

斯塔布斯对 Q11 的讨论占用的篇幅是所有问题中最长的，从中我们或许能窥见 CDA 时而遭到过于严厉的批评的原因。斯塔布斯指出，CDA 借用了许多其他语言和认知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包括文

学批评、文体学、社会学、语言相对论、后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等等，然而“这样一大批理论在 CDA 中大多都未提及。其他的一些理论只是被简单提及，对它们与 CDA 的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评价。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整个‘批评理论’传统只是偶尔被提及。”(1998:109—110)在下面这段话中，威窦森似乎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斯塔布斯对 CDA 的这种“傲慢”态度的批评：“但是，在 CDA 中对此没有提及。很少提到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往往会发现这样的暗示，即对语篇事实的分析仅仅支持这一种解释。”(1995a:169)斯塔布斯因此声言，他对 CDA 的主要批评是“CDA 所论证的立场了无新意”，(1998:110)而威窦森则担心 CDA 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因为“它所施加的话语控制正是它试图揭露的存在于其他语言运用中的那种”。(1996:57)

以上我们对斯塔布斯提出的 11 个问题中的 6 个进行了简单的评论。余下的 5 个问题是(保留原来的序号)：

Q4. CDA 宣称的语用和认知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Q5. 语用对习惯性思维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

Q6. 使用频率与自然化(naturalization)有何关系？

Q7. CDA 能够摆脱语言—认知循环论证吗？

Q9. 比较研究如何设计？

斯塔布斯认为 CDA 对 Q4、Q5、Q6、和 Q9 没有清楚的答案；至于 Q7，他认为 CDA 的“大多数分析都是循环论证的，分析者从一开始就完全清楚会发现什么样的政治立场”。(1998:106)

12.6　结语

在这一章里我们以斯塔布斯和威窦森为例简述了目前对 CDA 的一些批评意见。这些批评中许多具有合理性，值得 CDA 学者认真思考。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CDA 是一种语篇分析方法，其过程就是对语篇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是整个解释学一直面临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CDA 的批评者提出

这些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 CDA 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在解释学领域乃至全部人文科学中根深蒂固。近现代的人文学者接受了一种自然科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意识，认为“只有在主体方面，人采取一种中立的观察者姿态，在客体方面，把对象看作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领域，那种被理解为历史性学科的人文科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者被要求以无偏见的头脑来思考无边的历史领域，以寻找客观的事实。”（布尔，引自何卫平，2001：56）

批评语言学家一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客观主义倾向，认为理解和解释完全排除解释者自身的历史性是难以想像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CDA 已经或者将会走向德里达式的极端相对主义。迄今，虽然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实践和成果良莠不齐，但是这个领域中的绝大多数学者会接受下述观点：第一，没有丰富的语言和语用知识，分析者就不可能充分合理地解释对话语的直觉性理解；第二，分析者掌握的语言和语用知识越多，他对语篇产生的交际效果洞察的就越清楚，越深刻；第三，对语篇中一种语言结构或层面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需要得到对其他相关结构或层面的分析结果的支持或者验证；第四，分析者解读和阐释的依据以及做出结论的途径必须清晰透明，以便他人能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核实；第五，分析者必须明白，自己的分析结果或结论，其有效性是开放的和可变的，而不是绝对的，即这种有效性可能随语境的改变或信息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主要参考文献

Adamson, D. L. 1991. *Class, Ideology and the Natio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Ahearn, E. J. 1989. "A Mutual, Joint-Stock World", in *Marx and Modern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lthusser, L. 1969.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Althusser, L. 1970.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Altieri, C. 1978. "The Hermeneutics of Literary Indeterminacy: A Dissent from the New Orthodoxy", *New Literary History*, 10(1): 71-99.

Anderson, D. A. & Itule, B. D. 1984. *Contemporary News Report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Aristotle 1909. *The Rhetoric of Aristotle*. Cambridge: CUP.

Asher, R. E. & Simpson, J. M. Y. (eds.) 1994.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4 & 7.

Bakhtin, M. 1968. *Rabelais and His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M. Holquist, trans. C. Emerson & M. Holquist. Austin/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khtin,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C. Emer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nfield, A. 1982. *Unspeakable Sentences: Nar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language of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arthes, R. 1957. *Mythologies*,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Barthes, R. 1973.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Barthes, R. 1975. *S/Z*,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Barthes, R. (ed.), 1977. *Images,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arthes, R. 1979. *From Work to Text*, excerpts in J. V. Harari (ed.).

Barthes, R. 1981. "Theory of the text", in R. Young (ed.), I. Mcleod trans.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Baym, N. 1979. "Melville's Quarrel with Fiction", *PMLA 94*.

Baynham, M. 1996. "Direct speech: What's it doing in non-narrative 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5: 61 - 81.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OUP.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Beverley, J. & Zimmerman, M. 1990.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Revolutio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irch, D. & O'Toole, M. (eds.), 1988. *Functions of Style*. London/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Blakemore, D. 1987.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lakemore, D.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Bloom, H. et al 1979.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Bolinger, D. 1980. *Language: The loaded weapon*. London/New York: Longman.

Bransford, J. D. & Johnson, M. K. 1972. "Contextual prerequisites for understanding: Some investigations of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1.

Brown, R. and Gilman, A. 1972.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P. Giglioli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78.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UP.

Brown, G. &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UP.

Burger, P. 1984.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i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 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ta Press.

Butler, J. 1997.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London: Routledge.

Cameron, D. 1985.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Carlean, E. 1990. *War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Campbell, C. P. 1995. *Race, Myth and the New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Caputo, J. & Yount, M. (eds.), 1993. *Foucault and the Critique of Institu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arter, R. 1982.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Reader in Stylis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Chambers, R. 1984. *Story and Situation: Narrative Seduction and the Power of Fi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hambers, R. 1991. *Ideology*. New York: Verso.

Chibnall, S. 1977. *Law-and-Order News*. London: Tavistock.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Clark, H. & Gerrig, R. J. 1990.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Language* 66(4): 764 – 805.

Clews, H. 1985. *The Only Teller: Readings in the Monologue Novel*.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Sono Nis Press.

Cohen, S. & Young, J. (eds.), 1973.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Constable.

Cook, G. 1992. *The Discourse of Advertising*.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Cook, G. 1994.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Oxford: OUP.

Cooper, R. L. & Spolsky, B. (eds.), 1991.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Culture and Thought*.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Coulmas, F. 1985.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General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Japa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41 – 63.

Coulthard, M. 1977.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New York: Longman.

Coulthard, M. (ed.), 1992. *Advances in Spoken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Cousins, M. & Hussain, A. 1984. *Michel Foucault*. Houndmills: Macmillan.

Couture, B. 1986. "Effective ideation in written text: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larity and exigence", in B. Couture (e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Writ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Norwood, NJ: Ablex.

Cros, E. 1988.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o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rowley, T. 1990. "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 a science of language", in J. E. Joseph & T. J. Taylor (eds.).

Crystal, D. & Davy, D. 1969.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 London: Longman.

Culler, J. 1982.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Cutting, G. (ed.), 1994. *Foucault*. Cambridge: CUP.

Davis, R. C. & Schleifer, R. 1991. *Criticism and Culture: the Role of Critique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London/New York: Longman.

de Beaugrande, R. & Dressler, W.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New York: Longman.

Derrida, J. 1968. "Difference",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Dillon, G. 1992. "Insider reading and linguistic form: Contextual knowledge and the reading of linguistic discourse", in M. Toolan (ed.).

Dor, J. 1993. "Dialogical reading and the Biblical-creed narrative prayers in Chaucer's Man of Law's Tale'", in R. Clark & P. Boitani (eds.), *English Studies in Transi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Dressler, W. U. (ed.), 1977. *Current Trends in Textlinguistics*.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Eagleton, T. 1976.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Easthope, A. & McGowan, K. (eds.), 1992.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 Toronto/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Eco, U. 1979.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London: Hutchinson.

Eco, U. 1990.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delman, M. 1974. "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Politics and Society* 4: 295 – 310.

Edelman, M. 1977. *Language and Poli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dmondson, W. 1981. *Spoken Discourse: A model for analysis*. New York: Longman.

Eggins, S & Martin, J. R. 1997. "Genres and registers of discourse", in T. A. van Dijk (ed.).

Ehrlich, S. 1990. *Point of View: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Literary Styl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Elliott, G. (ed.), 1994. *Althusser: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Ellis, J. 1980. *Ideology and subjectivity*. In S. Hall et al (eds.).

Ellis, J. M. 1989. *Agqinst Deconstruction*. 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merson, J. 1970. "Behaviour in private places: Sustaining definitions of reality in gynaecological examinations", in H. P. Dreizel (ed.), *Recent Sociology* No. 2,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Eschholz, P., Rosa, A. & Clark, V. (eds.), 1982. *Language Awaren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New York: Longman.

Fairclough, N. 1992a.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ed.), 1992b. *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Fairclough, N. 1995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Fairclough, N. 1995b. *Media Discourse*. London/New York: Edward Arnold.

Fawcett, R. P. & Young, D. 1988.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

cations.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extracts in A. Easthope and K. McGowan (eds.), 1992.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Foucault, M. 1979. "What Is an Author?", in J. V. Harari (ed.).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ed.), C. Gordon, trans. C. Gordon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Fowler, A. 1982.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owler, R. 1971. *The Languages of Literature*. London/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Fowler, R. 1985. "Power" in T. A. van Dijk (ed.).

Fowler, R. 1986. *Linguistic Criticism*. Oxford/New York: OUP.

Fowler, R. 1987. "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 Steele & T. Threadgold (eds.), *Language Topics: 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Hallida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Fowler, R. 1991a.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Malmkjaer, K. (ed.), *The Linguistics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Fowler, R. 1991b.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Fowler, R. & Kress, G. 1979.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Fowler et al (eds.).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 Trew, T.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reeman, D.C. (ed.), 1970.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Froman, C. 1992. *Language and Power*, Books I & II. New Jersey/London: Humanities Press.

Fromm, E. 1980.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New York.

Frow, J. 1986. *Mar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ye, N. 1957.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lan, F. W. 1979. *The Prague School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1928–1948.

Galtung, J. & Ruge, M. 1973. "Structuring and selecting news", in S. Cohen & J. Young (ed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y: Prentice Hall.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 trans. Q. Hoare & G. N.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Gregory, M. & Carroll, S. 1978.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reen, K. & le Bihan, J. 1996. *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ursebook*.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Geis, M. L. 1987.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Geuss, R. 1981.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Groden, M. & Kreiswirth, M. (eds.), 1994.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Baltimore/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uerin, W. L. et al 1992.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Oxford: OUP.

Gumperz, J.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UP.

Grundy, P. 1995. *Doing Pragmatics*. London: Edward Arnold.

Guy, G. R. 1988. "Language and social class", in F. J. Newmeyer (ed.).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Habermas, J.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Habermas, J. 1982.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 B. Thompson & 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84.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trans. T. McCarthy. London: Macmillan.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 Burger & F.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90.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C. Lenhardt & S. W. Nicholse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k, T. & Helsloot, N. (eds.), 1995. *Michel Pêcheux: Automatic Discourse Analysis*. Amsterdam: Atlanta.

Hall, S. 1973. "A world at one with itself", in S. Cohen & J. Young (eds.).

Hall, S. 1980.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 a critical note", in S. Hall et al (eds.).

Hall, S. 1988.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Macmillan Education.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Hobson, D., Lowe, A. & Willis, P.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lliday, M. A. K. 1970.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in J. Lyons (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95. "Language and the reshaping of human experience", in B. Dendrinos (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University of Athens.

Halliday, M. A. K., McIntosh, A. & Strevens, P. 1964.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Halloran, J., Elliott, P. & Murdock, G. 1970.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Harari, J. V. (ed.), 1979.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Harnish, R. M. (ed.), 1994. *Basic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Grice, H. P. 1957. "Meaning", in R. M. Harnish (ed.), 1994.

Harri, P., Augstein, S., Smith, M. & Thomas, L. 1982. *Reading to Learn*. London/New York: Methuen.

Harris, S. 1995. "Pragmatics and Power", *Journal of Pragmatics*, 23.

Hartley, J. 1982. *Understanding News*. London: Methuen.

Hawthorn, J. 1984.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Hawthorn, J. 1992.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New York: Edward Arnold.

Heck, M. C. 1980.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media messages", in S. Hall et al (eds.).

Herbert, T. 1966. "Reflexions sur la situation theorique des sciences sociales et, specialement, de la psychologie sociale", *Cahiers pour l'analyse* 2: 141－167.

Herbert, T. 1968. "Remarques pour une theorie generale des ideologies", *Cahiers pour l'analyse* 9: 74－92.

Hernadi, P. 1978. "Order without borders: Recent genre theor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in J. P. Strelka (ed.).

Hill, J. H. 1988. "Language, culture and world view", in F. J. Newmeyer (ed.).

Hinch, M. J. & Munger, M. C. 1994. *Ideology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hoice*.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irsch, E. D. 1965.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rst, P. 1979. *On Law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Hodge, R. & Kress, G. 1988. *Social semio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odge, B. 1979. "Newspapers and Communities", in R. Fowler et al (eds).

Huddleston, R. (1984), *Introduction to the Grammar of English*, Cambridge: CUP.

Hudson, R. A. 1980.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UP.

Irwin, J. W. 1986. *Tea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ser, W.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ser, W. 1980.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in J. Tompkins (e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ohn-Steiner, V. 1991. "Cognitive pluralism: A Whorfian analysis", in R. L. Cooper & B. Spolsky (eds.).

James, C. & Garrett, P. 1991. *Language Awareness in the Classroo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Jameson, F.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s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ameson, F. 1988.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The Syntax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Jefferson, A. 1982.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A. Jefferson & D. Robey (ed.),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towa: Barnes and Noble.

Jenny, L. 1982. "The strategy of form", in T. Todorov (ed.), R. Carter trans. *French Literary Theory Today*. Cambridge: CUP.

Joseph, J. E. 1990. "Ideologizing Saussure: Bloomfield's and Chomsky's readings of th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in J. E. Joseph & T. J. Taylor (eds.).

Joseph, J. E. & Taylor, T. J. 1990. *Ideologies of Languag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Kempson, R. 1977. *Semantics Theory*. Cambridge: CUP.

Kennedy, G. 1963.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Kramarae, C., Schulz, M. & O'Barr, W. M. (eds.), 1984. *Language and Power*. Beverle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Kress, G. 1982. *Learning to Wri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ress, G. 1985. *Linguistic Processe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 Oxford: OUP.

Kress, G. 1986. *Language in the medi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ai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8, 395－419.

Kress, G. 1987a. "Educating Readers: Language in Advertising", in J. Hawthorn (ed.), Propaganda, *Persuasion and Polemic*. London: Edward Arnold.

Kress, G. 1987b. "Genre in a social theory of language: a reply to John Dixon", in I. Reid (ed.), *The Place of Genre in Learning: Current Debates*.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Kress, G. & Hodge, R. 1979. *Languag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risteva, J.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Oxford: Blackwell.

Kristeva, J.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Kurzweil, E. 1980.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Levi-Strauss to Foucaul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bov, W. 1982. "Objectivity and commitment in linguistic science: The case of the Ann Arbor trial", *Language and Society* 1982: 165－201.

Lacan, J. 1977. *Ecrits — A Selection*, trans. A.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angford, D. 1994. *Analysing Talk*. London: Macmillan.

Lee, D. 1992. *Competing Discourses: Perspective and Ideology in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Lecercle, J. J. 1999. *Interpretation as Pragmatics*. London: Macmillan.

Leech, G. 1974. *Seman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eech, G. N. & Short, M. H. 1981. *Style in Fiction*. London: Longman.

Leitch, V. B. 1983.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nin, V. L. 1969.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UP.

Lodge, D. 1987. "After Bakhtin", in N. Fabb et al (eds.), *The Linguistics of Writing: Arguments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Methuen.

Lukacs, G. 1971. *History and Consciousness*. Massachussettes: The MIT Press.

Lukacs, G. 1984.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Darmstadt.

Lyons, J. 1968.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UP.

Macnamara, J. 1991. "Linguistic relativity revisited", in R. L. Cooper & B. Spolsky (eds.).

Marcuse, H.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M]. Massachussettes: The Bacon Press.

Margolis, J. 1993. "Redeeming Foucault", in J. Caputo & M. Yount (eds.).

Marino, A. 1978. "Toward a definition of literary genres", in J. P. Strelka

(ed.).

Martin, J. R. 1985. *Factual Writing: Exploring and Challenging Social Reality*. Geelong,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 Engels, F. 1976.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cCarthy, M. 1991. *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CUP.

McCarthy, M. & Carter, R. (eds.), 1994. *Language as Discours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Menz, F. 1989. "Manipulation strategies in newspapers: A program for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 Wodak (ed.),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Merquior, J. G. 1985. *Foucault*. London: Fontana Press.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Mishler, E. 1984. *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 Dialectics of medical interviews*.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mpany.

Mitchell, W. J. (ed.), 1982.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hanty, J. 1993. "Foucault as a philosopher", in J. Caputo & M. Yount (eds.).

Morley, D. 1980. "Texts, readers, subjects", in S. Hall et al (eds.).

Mueler, C. 1973.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OUP.

Newmeyer, F. J. (ed.), 1988.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IV. Cambridge: CUP.

Newton, K. M. (ed.), 1992. *Theory into Practice: A Reader in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acMilan.

Ng, Sik Hung. & Bradac, J. J. 1993. *Power in Languag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O'Beebee, T. 1994. *The Ideology of Genr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Generic Instabilit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rwell, G. 1946.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吴景荣、丁往道&钱

青 (eds.), 1980。

Outhwaite, W. 1994. *Haberma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UP.

Patterson, D. 1988. *Literature and Spirit: Essays on Bakhti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Payne, M. 1996.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êcheux, M. 1982.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trans. H. Nagpal. London: Macmillan.

Poulantzas, N.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by T. O'Hagan.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 Sheed and Ward.

Pulman, S. G. 1983. *Word Meaning and Belief*. London/Canberra: Croom Helm.

Radway, J.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ichert, J. 1978.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The limits of genre theory", in J. P. Strelka (ed.).

Reis, C. 1993. *Towards a Semiotics of Ideolog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Renkema, J. 1993. *Discourse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Ricoeur, P. 1994. "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y" in G. Elliott (ed.).

Riffaterre, M. 1978. *Semiotics of Poetry*. London: Methuen.

Roderick, R. 1986. *Haberma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Rosmarin, A. 1985. *The Power of Genre*.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acks, S. 1964. *Fiction and the Shape of Belie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id, E. W. 1976. "Interview", *Diacritics* 3 (6).

Said, E. W. 1979. "The Text, the World, the Critic", in J. V. Harari (ed.).

Sandig, B. & Selting, M. 1997. "Discourse styles", in T. A. van Dijk (ed.).

Sapir, E. 1921.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de Saussure, F.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Duckworth.

Schlesinger, I. M. 1991. "The wax and wane of Whorfian views", in R. L. Cooper & B. Spolsky (eds.).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Selden, R. 1985.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Seyler, D. U. & Boltz, C. J. 1982. *Language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Schiffrin, D. 1994.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Oxford: OUP.

Scholes, R. E. 1974.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Haven & London.

Simpson, P. 1993. *Language, 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lobin, D. I. 1979. *Psycholinguistics*.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Spencer-Oatey, H. 1996. "Reconsidering power and distanc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 1-24.

Sperber, D. & Wilson, D. 1986. *Relevance*. Oxford: Blackwell.

Strelka, J. P. (ed.), 1978. *Theories of Literary Genr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tubbs, M. W. 1998.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Ryan & A. Wray (eds.): *Evolving Models of Language*. British Studi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2. Clevedon: BAAL/Multilingual Matters.

Sumner, W. G. 1906. *Folkway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Swales, J. M.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Settings*. Cambridge: CUP.

Tannen, D. (ed.), 1993. *Framing in Discourse*. Oxford: OUP.

Tannen, D. & Wallat, C. 1993. "Interactive Frames and Knowledge Schemas in Interaction: Examples from a Medical Examination/Interview", in Tannen, D. (ed.).

Taylor, T. J. 1990. "Which is to be maste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in J. E. Joseph & T. J. Taylor (eds.).

Tejera, V. 1995.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 Theory of Sign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en Have, P. 1989. "The consultation as a genre", in B. Torode (ed.), *Text and Talk as Social Practice*. Dordrecht-Holland: Foris Publications.

Thomas, B. 1982. *James Joyce's Ulysses: A Book of Many Happy Returns*. Baton Rouge/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J. A. 1985. "The language of Power",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765 – 783.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hornborrow, J. & Wareing, S. 2000. *Patterns in Language: Stylistics for Student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odorov, T. 1976. *The Origin of Genres*. New Literary History 8: 159 – 170.

Toolan, M. (ed.), 1992. *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Trew, T. (1979), "Theory and Ideology at Work", in R. Fowler et al (eds.).

Trew, T. (1979), " 'What the papers sa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 in R. Fowler et al (eds.).

Trudgill, P. 1983.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van Dijk, T. A. 1977.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London/New York.

van Dijk, T. A. 1985.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van Dijk, T. A. (ed.), 1985.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Vol. IV,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ety. London: Academic Press.

van Dijk, T.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van Dijk, T. A. (ed.), 1997.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1.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Veron, E. 1969. "The semanticiz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E. Veron et al (eds.), *Lenguaje y Communicacion Social*. Buenos Aires: Nueva Vision.

Veron, E. 1971. "Ide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emiotica*, Vol. 3, No. 1.

Volos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L. Matejka & I. R. Ti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Wales, K. 1992. *The Language of James Joy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Wartenburg, T. 1990. *The Forms of Power: From Dormination to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Weedon, C., Tolson, A. & Mort, F. 1980.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subjectivity", in S. Hall et al (eds.).

Werlich, E. 1982. *A Text Grammar of English*. Heidelberg: Quelle and Meyer.

Wesling, D. & Slawek, T. 1995. *Literary Voice*. Albany: Se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hitaker, B. 1981. *News Limited: Why You Can't Read All About It*. London: Minority Press Group.

Whorf, B. L. 1964.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Widdowson, H. G. 1978.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UP.

Widdowson, H. G. 1979.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 Oxford: OUP.

Widdowson, H. G. 1984.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2). Oxford: OUP.

Widdowson, H. G. 1995a.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3) 157 - 172.

Widdowson, H. G. 1995b.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16, No. 4.

Widdowson, H. G. 1996. "Reply to Faircla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6, 5 (1) 57 - 69.

Widdowson, H. G. 1998.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pplied Linguistics* 19/1: 136 - 151.

Widdowson, H. G. 2000. "On the limitations of linguistics applied", *Applied Linguistics* 21/1: 3 - 25.

Willis, P. 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Westmead, Farnborough, Hants: Saxon House.

Wiseman, M. B. 1989. *The Ecstasies of Roland Barth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Wodak, R. (ed.), 1989.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Woollacott, J. 1982. "Messages and Meanings", in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阿尔杜塞,1984,《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

巴赫金,1988,《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

巴赫金,1998a,《文本、对话与人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赫金,1998b,《诗学与访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尔特,1988,"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

董小英,1994,《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三联书店。

哈贝马斯,2001,"认识与旨趣"[A],载洪汉鼎,《理解与解释》。北京:东方出版社。

胡壮麟,1994,《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系统功能语法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霍克斯,1987,《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伽达默尔,1992,《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杰姆逊,1986,《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

李幼蒸,1999,《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素,1998,《权力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斯诺,1998,《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塞德曼,2001,吴世雄等译,《后现代转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宋惠昌,1993,《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王海远等编,2000,《东渐之西潮》。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一川,1994,《语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吴景荣、丁往道、钱青,1980,《当代英文散文选读》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盛桓,2002,常规关系与认知化——再论常规关系,《外国语》第一期。

俞金吾,1993,《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颂杰,2002,《西方哲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Literary Texts

Carroll, Lewis, 1993.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ewis Carroll*. London: Magpie Books.

Fitzgerald, F. Scott, 1926. *The Great Gatsby*. London: Heinemann.

Joyce, James, 1986. *Ulyss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ao Testung, 1976. *Mao Testung Poem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elville, Herman, 1930. *Moby Dick*.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Woolf, Virginia, 1976. *Mrs. Dalloway*. London: Granada Publishing.

汉英、英汉术语对照表

汉英术语对照表

巴赫金学派	the Bakhtin School
被动化	passivization
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标准结构	canonical structure
标准语	standard language
表情成分	expressive element
阐释	interpretation
常识	common sense
称呼语	terms of address
传言者	animator
纯理功能	metafunction
独白	monologue
对话	dialogue
对话的杂体语言	dialogized heteroglossia
对话性	dialogism
多音调	multi-accentuality
反讽	irony
反叙实谓词	counterfactive predicate
非强制性的	optional
非人格化的	impersonal
非叙实谓词	non-factive predicate

分类	classification
符号学分析	semiotic analysis
复调	polyphony
复合个性	composite personality
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
概念意义	ideational meaning/conceptual meaning
工具语言学	instrumental linguistics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公众语篇	public discourse
共时语言学	synchronic linguistics
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关联	relevance
轨道	trajectory
过分词化	overlexicalization
含蓄谓词	implicative predicate
合法化	legitimation
合意	consensus
互文本	intertext
互文话语	interdiscourse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话语	utterance
话语技术	discourse technology
话语技术化	technologization of discourse
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话语形态	discursive formation
话语殖民	discourse colonization
话语秩序	order of discourse
回合	exchange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会话式非正式化	conversationalization
激活	activated

及物性	transitivity
技术兴趣	technical interest
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
交际领域	fields of interaction
脚本	script
解放兴趣	emancipatory interest
解构主义者	deconstructivist
经验科学	empirical science
经验意识形态	empirical ideology
镜像阶段	the Mirror Stage
句法分析	syntactic analysis
句子	sentence
可能意义	possible meaning
可预见性	predictability
类	kind
理论主义	theoretism
理想读者	ideal reader
历时语言学	diachronic linguistics
连贯	coherence
论证分析	argumentative analysis
媒介	mediator
民族方法论者	ethnomethodologist
名物化	nominalization
内部语言学	internal linguistics
能指	signifier
批评性语篇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批评语言学	critical linguistics
起始语	starter
强制性的	obligatory
情态	modality
去政治化	depoliticization

人格化	personalization
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人际意义	interpersonal meaning
认识论决裂	epistemological break
任意意识形态	arbitrary ideology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设问	interpellation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社会机构	social institution
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社会联盟	social alignment
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生活领域	life world
生物权力	biopower
声音	voice
省略句	elliptical sentence
施事者	agent
时空场合	spatio-temporal setting
时态	tense
实践的兴趣	practical interest
式	mode
视觉盈余	surplus of vision
受话者	addressee
书写主体	writing subject
熟语	familiar phrase
私人领域	private sphere
思辨意识形态	speculative ideology
所指	signified
所指对象	referent
体	aspect
体裁	genre

体裁互文性	generic intertextuality
体裁结构潜势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停顿填充语	pause filler
同中心主义	homocentrism
图式	schema
外部语篇	exterior text
外部语言学	external linguistics
完备语码	elaborated code
文化近似性	cultural proximity
文体	style
物化	objectification
习惯化	habitualization
衔接	cohesion
显性的	explicit
现实的社会性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限制性语码	restricted code
想像界	the Imaginary
象征界	the Symbolic
消息来源	news source
新闻价值	newsworthiness
形式化	formality
叙实谓词	factive predicate
叙事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
叙事结构	narrative structure
叙述性转述	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
压制性国家机器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言外之力	illocutionary force
言语	*parole*
研究模式	instantiation model
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意识形态意义	ideological meaning
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引述者话语	reporting speech
引文	citation
隐性的	implicit
有机意识形态	organic ideology
语调	intonation
语境	context
语类	discourse type
语码	code
语篇	text
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
语篇性	textuality
语气	mood
语文学	philology
语言	*langue*
语言变体	language variety
语言决定论	linguistic determinism
语言系统	linguistic system
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语言意识	language awareness
语言游戏	language game
语域	register
语源研究	source study
预设	presupposition
预先调整的直接话语	preset direct discourse
预制语	pre-constructeds
阅读位置	reading position
杂体语言	heteroglossia
再阐释	re-interpretation
招呼	hailing

直接引语	direct speech
中性化	neutralization
重新词化	relexicalization
主题化	thematization
主体、下属	subject
主体位置	subject position
转换	transformation
转述句	reporting clause
转述语境	reporting context
资本	capital
自然化	naturalization
自由间接引语	free indirect speech
作者	author

英汉术语对照表

activated	激活
addressee	受话者
agent	施事者
animator	传言者
arbitrary ideology	任意意识形态
argumentative analysis	论证分析
aspect	体
author	作者
Bakhtin School	巴赫金学派
Biopower	生物权力
canonical structure	标准结构
capital	资本
citation	引文
classification	分类

code	语码
coherence	连贯
cohesion	衔接
common sense	常识
composite personality	复合个性
conceptual meaning	概念意义
consensus	合意
context	语境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alization	会话式非正式化
counterfactive predicate	反叙实谓词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批评性语篇分析
critical linguistics	批评语言学
cultural proximity	文化近似性
deconstructivist	解构主义者
depoliticization	非政治化
diachronic linguistics	历时语言学
dialogism	对话性
dialogized heteroglossia	对话的杂体语言
dialogue	对话
direct speech	直接引语
discourse colonization	话语殖民
discourse technology	话语技术
discourse type	语类
discursive formation	话语形态
discursive practice	话语实践
elaborated code	完备语码
elliptical sentence	省略句
emancipatory interest	解放兴趣
empirical ideology	经验意识形态
empirical science	经验科学

epistemological break	认识论决裂
ethnomethodologist	民族方法论者
exchange	回合
explicit	显性的
expressive element	表情成分
exterior text	外部语篇
external linguistics	外部语言学
factive predicate	叙实谓词
familiar phrase	熟语
fields of interaction	交际领域
formality	形式化
free indirect speech	自由间接引语
generic intertextuality	体裁互文性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体裁结构潜势
genre	体裁
habitualization	习惯化
hailing	招呼
heteroglossia	杂体语言
homocentrism	同中心主义
ideal reader	理想读者
ideational function	概念功能
ideational meaning	概念意义
ideological meaning	意识形态意义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y	意识形态
illocutionary force	言外之力
the Imaginary	想像界
impersonal	非人格化的
implicative predicate	含蓄谓词
implicit	隐性的
indirect speech	间接引语

instantiation model	研究模式
instrumental linguistics	工具语言学
interdiscourse	互文话语
interpersonal function	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meaning	人际意义
internal linguistics	内部语言学
interpellation	设问
interpretation	阐释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intertext	互文本
intonation	语调
irony	反讽
kind	类
language awareness	语言意识
language game	语言游戏
language variety	语言变体
langue	语言
legitimation	合法化
life world	生活领域
linguistic determinism	语言决定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system	语言系统
meaning potential	意义潜势
mediator	媒介
metafunction	纯理功能
the Mirror Stage	镜像阶段
modality	情态
mode	式
monologue	独白
mood	语气
multi-accentuality	多音调

narrative analysis	叙事分析
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	叙述性转述
narrative structure	叙事结构
naturalization	自然化
neutralization	中性化
news source	消息来源
newsworthiness	新闻价值
nominalization	名物化
non-factive predicate	非叙实谓词
objectification	物化
obligatory	强制性的
official language	官方语言
optional	非强制性的
order of discourse	话语秩序
organic ideology	有机意识形态
overlexicalization	过分词化
parole	言语
passivization	被动化
pause filler	停顿填充语
personalization	人格化
philology	语文学
polyphony	复调
possible meaning	可能意义
practical interest	实践的兴趣
pre-constructeds	预制语
predictability	可预见性
preset direct discourse	预先调整的直接话语
presupposition	预设
private sphere	私人领域
public discourse	公众语篇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

reading position	阅读位置
referent	所指对象
register	语域
re-interpretation	再阐释
relevance	关联
relexicalization	重新词化
reporting clause	转述句
reporting context	转述语境
reporting speech	引述者话语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压制性国家机器
restricted code	限制性语码
Sapir-Whorf hypothesis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chema	图式
script	脚本
semiotic analysis	符号学分析
sentence	句子
signified	所指
signifier	能指
social alignment	社会联盟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现实的社会性建构
social institution	社会机构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source study	语源研究
spatio-temporal setting	时空场合
speculative ideology	思辨意识形态
standard language	标准语
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
starter	起始语
style	文体

subject position	主体位置
subject	主体、下属
surplus of vision	视觉盈余
the Symbolic	象征界
synchronic linguistics	共时语言学
syntactic analysis	句法分析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
technical interest	技术兴趣
technologization of discourse	话语技术化
tense	时态
terms of address	称呼语
textual function	语篇功能
textuality	语篇性
text	语篇
thematization	主题化
theoretism	理论主义
trajectory	轨道
transformation	转换
transitivity	及物性
utterance	话语
voice	声音
writing subject	书写主体